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3,000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000

书号 17001·63 定价 0.54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1  
(一九二六年)
- 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 .....68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 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70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 党的机会主义史 .....72  
(一九二七年九月)
- 北方工作决议案 .....111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
- 致中央的信 .....120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128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时的发言 .....145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
-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职工运动问题时的发言 .....148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 关于顺直问题的口头报告 .....150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

对顺直问题的书面报告 .....160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的发言 .....167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编 后 记 .....169

#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

(一九二六年)

### 绪 言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各位致敬意！并接受你们的欢迎。但我应先向同志们道歉的就是这个报告中很少正确的统计的实际材料，而是只凭我记忆所及而作的。

我们到此已三周余了，Биро早邀我到此与同志们谈一谈，代表团也很愿意早向同志们报告国内的实际情形，不过我们所要知道的，固然是政治经济和国民运动，不仅大家愿意听，我亦愿意报告，但是比此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题目，同志们离国久了，有的几年，有的几个月，在政治经济方面，尚有报纸或党团刊物，知道个大概，但是关于党及党的内部情形，一定很少知道的，最重要的原因有二：第一，党报少按期出版；第二，此地与中国离隔太远。同志们对于党的生活及其争斗的经验想知道而不能知道，故应先做这个报告。

一，报告的意义。大家一定很明白的，大家在此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但是同时我们又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吾党虽只有五年短的历史，而仍在幼稚的时代。可是就在五年中间已能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由经济的争斗走到政治的争斗，由日常生活

的争斗，又走到一般的争斗了。俄国共产党不过二十余年的历史，西欧工人阶级的政党已有百年或数十年，但在我们五年历史过程中，已超过了他们长期的历史了。故我党虽仍青年，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的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了。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

同志们一定要问究竟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大家都应想一想！但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故我先报告党的历史。

今日报告的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这个题目如详细说来，至少也需要许多的时间，但是今天无长的时间，故只能尽可能的缩短报告的时间。但是虽然如是，而这个报告，也仍须有相当的时间。现在我就开始往下说了。

## **二、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

(一)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近年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渐渐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了，并图谋反共产党的举动了。他们以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陈独秀几个野心家的意志所塑造的，或者以为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这些军阀的走狗及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和污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党员对于党的产生的背景统统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深刻的了解的。兹简单的分五项说明之：

1，中国产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他是工人

阶级的党，他主要组成分子是产业无产阶级，所以在我们一想到共产党产生的时候，就会想到无产阶级有了相当的发展。吾党何以不在一九一四年欧战中产生呢？而要在战后产生呢？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土著产业方面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是战前所没有的。大战以来各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的土著工业均有相当的发展，我们就单说纺织业及棉纱，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不过两个工厂而已，据日本人统计报告说，在一九〇三年纺纱厂不过两个，锭子六千五百个，数目是何等小呢？到了一九一六年大战中有四十二个纱厂，锭子数目亦增至十七万以上，到现在一九二五年工厂的数目为八十三个，锭子的数目已增加至二百万个，并且还有一百万个预备开工的，由此可知，大战期中工业发展之速，我们无正确的统计，不能知道，在战前时全国到底有了若干工厂，但据日本人不正确的统计看来，战前工厂总数目为五百五十八个，而战后为一千四百个工厂。至于工人阶级之发展，亦无正确的统计，据日本人推测，战前为八十——一百万左右，战后产业工人之数则为二百——二百五十万左右，工人的数目差不多超过一倍半，至少在一倍以上。这些数目虽不是很正确的，但由此可知工业与无产阶级发展之大概。以前工人数目很少，现在却多起来了，若是与全国人口比较看来，仍是很少的，可是在工人发展史上，这个数目已是很大了。因为有了新的工人阶级的发展，于是就接着发生第二种的现象，即是有自然的罢工运动。

2，自然的罢工运动。党的产生背景的第二种现象：自然的罢工运动。中国的罢工运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呢？自然（编者注：原件下缺七个字）但就记忆知道的，则为辛亥年间湖北曾有一次大罢工，结果失败了。至一九一四年安源亦曾有一次大罢工，参加人数在一万以上，但是结果失败了，并且首领亦被枪毙了。在这个时期

内罢工运动虽然有了，但多半是失败的，且亦未引起各阶级的注意。至于真正对于政治、经济有影响，并引起社会上出来注意的，则自一九一四年起。香港、广州、上海、湖北自动罢工的很多，有胜利的，亦有失败的。一九二〇年自动的罢工的范围更十分扩大了。据日本的统计：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罢工共四十七次，参加人数共七万六千人，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罢工共三十七次，参加人数共四万四千人，但这些罢工即是自动的、普遍的。而在此自动罢工期中，工人阶级已形成工人初步的组织，一九一九年广东有二十六个工会，到一九二一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胜利之后，使南部工人尤其是广州工人受了很大的刺激，由二十六个工会增加到一百个工会了，但不过是幼稚的职业组合罢了。由以上数目字及事实看来，可见本党未产生以前的工人状况，已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了有行动，而且是很激烈、很勇敢的行动了。这个现象就是本党产生背景中主要的现象。

3，“五四”运动与上海的罢工。“五四”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在政治的意义上是很重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自有此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的政治斗争遂开新纪元，故此次运动对于各方面是很有关系的，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统统是很有关系的。“五四”运动在普通人看来，说是当作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对于去年的中国工人在此运动中所占的地位如何，他是否参加这个运动，是否是觉悟参加的，那就不注意了。“五四”运动为学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是上海的码头工人和日本纱厂工人是参加了的，他们是做为政治罢工，是正式参加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不过此时参加因为没有自己的党的领导和指导，所以不象现时“五卅”运动有意义、有力量。工人此次的参加是一时的爱国热忱而罢工的。他们一方面憎恨压迫侵略；一方面又被学生、政客利用而参加了，是“政客的青红



帮或一小部分工人首领接近而造成的”，故在客观上这个罢工是有意义的。但在主观上是无阶级的意识和政党的指导。可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路上来了，在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史上及对于党的产生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工人阶级自动的走到政治的斗争即必须有政党的领导。此吾党产生的第三个现象。

4，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形成。我们有了以上三个原因，可见此时不但有了二十万以上的产业工人阶级运动的普遍的行动，不但有经济的行动，又有政治的行动了。党的客观背景已有三个原因了，但此三个是否可以产生中国共产党呢？不能的！缺一主观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先进分子。同志们已研究过列宁论党，就明白了先进分子与党的产生及其阶级的关系了。故中国工人阶级虽有三个客观条件，但无主观条件，政党不会产生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列宁主义者，不是少数派、经济派或空想派，故坚决地承认要有主观条件。虽有主观条件，若再进一步研究，中国为农业经济社会，半殖民地，何以能产生共产党呢？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这是有其原因的，即十月革命的影响。兹看一看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知识阶级的影响和他们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如何呢？帝国主义以前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势力完全为美国的势力，即美国资本主义势力所统治，换言之，民主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实验主义的势力所统治，此时为民众起来之前履，而代表人物则为胡适之。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出版物、教科书的内容，学生的倾向，即可知民主主义、实验主义影响之大及对“五四”运动的关系了。“五四”运动虽不是绝对的完全受美国的影响，但成份是很多的。这个影响正有力的时候，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都是很大的，是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可是 rtesoailben 和会中威尔逊的十四条完全是一种骗局，于是幻想才渐渐打破了，新的影响亦来了，即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影响何以到这样迟呢？到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才有呢？因为以前远东为反革命的白党分子所占据，因此把十月革命的影响中断了。但是总是堵不住的，是要到中国的。当十月革命的影响来到中国时，小资产阶级是很害怕的，是受帝国主义者宣传毒的。但是不久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幻想都打破了，于是才由嘲骂、害怕而相信了。初则不接受，现因他各方面之失望而渐接受了。故“五四”运动中即有大批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形成的理由，固然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但仅有此影响还是不够的，还受有内部的影响才能成的。内部的影响原因是如何呢？第一，知识阶级目睹中国的状况，觉着他们以前的方法都不得着出路了，尤其是对于以前的政党如进步党、研究系、国民党（以前知识阶级一部分倾向进步党的梁启超，一部分倾向国民党）都失望了。“五四”运动是与国民党无关系的，此时国民党只知养兵护法，令人失望了，进步党亦令人失望了，所以民主主义和实验主义亦令人失望了。结果都找不着出路了；第二，一般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见了学生会的势力，于是又积极做学生会运动，如两湖的学生会，上海、广东及各地的学生会。并且起初的时候，他们都相信学生会的势力是很大的，对民主主义的希望亦很大的，但后来亦无结果，于是才渐渐觉得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便有一部分消极的青年不问政治，而却设法读书去了，另一部分积极分子想找到另一势力别一出路了。尤其是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力量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来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有

了以上的条件，知识分子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渐渐办报纸，组织小团体，实行和工人阶级接触而作工人运动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有地位了。胡适之代表美国思想而提出“研究问题，不谈主义”的口号，对学生界是有影响的，落后的群众是跟着他走的。但是不久，学生青年偏偏不谈问题而谈主义，尤其是《星期评论》、《新青年》，大学青年学生的欢迎表现十分厉害。这也是因为胡适之完全不明白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形成之方式了。

5，党的形成及其初步的工作。我们要看先进分子之形成，第一要谈青年社，每个同志都知道《新青年》主笔仲甫同志，但是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则为：民主和科学。而这两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亦是有的。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即新青年起分化，胡适之退出），新青年社变为“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的团结机关了。星期评论社，此社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他们以前都是我们的同志，但现在完全反对我们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首领或反革命派了。应工人阶级之兴起，社会主义思想传来，戴等受此影响而宣传社会主义，办了《星期评论》刊，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的欢迎，并结合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如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以前亦为我们的同志，但不久退出了）、施存统、吴明等。当时主要的为这两个组织，但后来即渐渐影响到一些小组织，如：

（1）少年中国学会，是一混合的组织（世炎、仁静、中夏等都在内），现在已起分化了，一部分有社会主义倾向，接近或走入《新青

F>社或《星期评论》社方面来了。

(2)新民学会,一部分中等学生所组织,李启汉同志很努力宣传学生的结果,他们第一注重新青年,并努力社会运动,此会二、三十人。

(3)天津觉悟社(如马骏、于方舟),受社会主义的影响而组织的这个觉悟社。

(4)新生社,新国魂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均加入吾党了,如韩麟符、于方舟等。

(5)共存社,为代英同志所组织,团结了湖北、四川数十青年,现大部分加入了我们的团体了。

(6)留法一部分积极分子到法国三圣门组织工学业社<sup>①</sup>及和森在蒙达尼组织工学世界社,这些虽不都是纯粹共产主义组织,但都是一步一步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此时尚无全国组织,但已在萌芽时代了。他们作些什么工作呢?他们对于宣传工作都很努力:

第一,继《新青年》、《星期评论》外,在上海、广东、北京又有劳动刊物,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上海的《劳动界》,都是一九二〇年。中国第一个“五一”节宣传很大,《新青年》发行数目字达一万份,所以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并且已普遍全国了。其他先进分子所发行的刊物亦很多。

第二,实际组织工作,不但宣传了,又进一步与工人接近了。第一步是北京数同志如张国焘、罗章龙到长辛店组织工人补习学校,开始实际工作,并找工人的先进分子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个学校十分可以纪念的,在吾党历史上,在劳动运动史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二步陈独秀同志由北京到上海在小沙渡设立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宣传形式与长辛店大概相同,这就是吾党职工运

<sup>①</sup> 疑原记录有误。

动的开始——组织俱乐部。国焘同志之到长辛店非个人行动，在当时是有计划的。仲甫同志到上海亦然。仲甫到申，原不一定到小沙渡，及至他看见了小沙渡及码头工人之罢工，已形成了工人的组织，如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所以就注意去调查他们的内容。可是这两个组织到底如何呢？中华总工会为国民党右派陈××的骗局机关，工业协会虽有五千——一万人但为大政客黄个民拉拢之工头以及其他活动的学生所鼓动，故日本纱厂工人与码头工人于六月三日罢工一次，情形亦尚好，并开过会，及到仲甫到时在茶馆集会也只有百余人到会了。故到小沙渡办学校。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一九二〇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总的说，吾党是一个什么产物呢？这小孩为什么会产生的呢？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的责任。同志们我继续上次报告，上次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的使命。这次报告共分做两段，第一他的产生背景与条件；第二他的政治责任。上次已把第一段报告完了，兹报告第二段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但未报告这段以前即先将中国的政治环境和阶级的势力分析一下：

1，中国政治的环境。每个政党必有政治的责任，如世界的共产党的责任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中、法、英、印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共同的。但各个政治环境是不同的，如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均已经过长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德莫克拉西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独立的而且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故在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即要领导工人阶级直接

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但东方各国就不同了，这些国家仍停留在农业经济里面，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旧的生产已经崩坏，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附属帝国主义，土著资本主义不能发展而变帝国主义的市场或采取原料的场所，但多半未经德莫克拉西的革命，新的军队或无产阶级尚未十分壮大，而旧的小手工业和农民又逐渐流为土匪了。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是什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

2，各阶级力量的分析。要明白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不仅明白其政治的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各阶级，在旧的社会中旧的统治阶级为地主与封建阶级，而农民则为被统治阶级。但在帝国主义侵入后，则旧阶级之上产生了新阶级，而新阶级之第一即为买办阶级，大都是在沿海商埠，对外贸易发达，故产生买办阶级，而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萌芽，由买办阶级渐渐形成商业资产阶级，到了最近产生工业资产阶级。这可说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发展资产阶级的三个阶段。帝国主义未侵入前是没有这阶级的，而现已成为中国经济一部的主人翁了。在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土著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尤其帝国主义在华开设工厂，故中国无产阶级亦产生了。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阶级的变化是旧的阶级而外产生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变化而来的，而且对于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无新的阶级之发生，则中国政治的变化仍不过是中国过去历史上政治变动而已。因政治的动力不同了，旧的统治的阶级于帝国主义侵入后而渐成为革命的阶级了，经济破产，统治地位摇动了。

### 3,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 中国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状况及一般的革命运动:

(1) 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状况, 鸦片战争以前, 满清政府的信用权力是很大的, 但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鸦片战争以后, 尤其是甲午之战以后, 则旧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信用已衰落无余了。在以前代表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士大夫对清廷是何等的歌功颂德, 以前的小手工业者及农民对统治阶级——自皇帝至秀才——的信用是何等的尊崇信服。秀才何以有如此的势力, 因其可以步步高升而成为当权的人, 亦就是统治阶级在野的代理人了。封建阶级统治的方法是何等的万能呢! ——圣谕圣旨。可是到了鸦片战争后的时代大不相同了, 因信用完全丧失了。但是何以如此呢?

① 自鸦片输入中国后, 中国现银日渐减少, 而中国感受现银之缺乏;

② 因为鸦片战争以后, 人民赋税增加了——帝国主义侵入后既渐渐破产而赋税则反而加重, 故对清廷反感怀恨日重;

③ 自鸦片战争以后, 清廷贿赂公行。以前官吏之所以有信用并被人民认为是清官, 即因其且有封建社会经济条件, 所反映的道德观念, 如不受贿, 矩规严等, 如今广东的官吏无不纳贿, 以包庇私售鸦片。由于子手以至清廷大臣无不纳贿, 于是官规变为奸规了, 故人民对之鄙之、恨之, 而清廷之信用以堕。另一方面, 在政治的威权又如何呢? 中国每一朝代的兴盛除对于农民必须先做些改良事业外, 尚须在外交上得到胜利, 以开拓版图或使其他民族朝贡称臣而附属于中国, 如此方可以得到人民之称颂。即以清廷而论, 在清初时亦曾在外交上得到相当的胜利, 如尼布楚条约就是一个例子。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 清廷的外交无处不在失败, 丧权割地几于无地无之, 故使中国人民对清廷认为是一卖国政府, 不能保国卫民

的政府，故反对清廷的思想很大。总而言之，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旧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威权日渐丧失了，农民经济逐渐破产了，故这两个阶级的激烈争斗遂起。

(2) 旧阶段中之一般的革命运动：

① 太平之役——这运动起于南京条约以后约十年，洪秀全就是太平军的一个首领。此次运动完全是破产的农民的革命运动，但此运动是失败了，因为帝国主义者是站在清廷方面的。

② 义和团之役——此役之背景是农民的破产和旧统治阶级的压迫而起来的，但此运动被旧统治阶级利用了，故亦归失败。这个运动之失败完全证明了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但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中国以前是可以成功的，但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则已不可能了，自己不能够领导革命成功了。新起的力量又如何呢？最近几十年中，第一，幼稚的资产阶级，在太平天国时有很少的买办阶级——在中国的买办阶级在广东的比较多，即所谓十三行，其次就是上海——于太平军进攻上海时（广东的买办阶级此时尚看不出他们的态度），他们向外国领事要求保护，并且他们向外国领事要求把上海划为中立地域。由此可知买办阶级不仅现在是反革命的，而在数十年前他们初生的时候已是反革命的了。在义和团之役，全国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现在虽无很多材料可证，但就资产阶级对义和团之批评论调看来，已可见他们不但不表同情于是役，且完全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与之取同一的批评意见。第二，无产阶级如何呢？当太平之役时，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可以说是未产生的（由于当时尚无很多工厂），但他的前辈父兄都是太平之役的主人翁了——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义和团之役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成份，不仅是破产的农民，而且小手工业者俱占极重要的位置，但因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参加，故此运动因无真正的领导，终



手失败了。由上两役可以看出各阶级的关系。

第一，买办阶级是反动的。

第二，农民虽有自动的起来，但缺领导的势力，故结果失败了。

③ 辛亥革命中新旧各阶级的表现，辛亥革命之役推翻的为满清的封建阶级，而革命阶级则为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谁是领导者呢？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是参加了的，如华侨的捐款助国民党，铁路风潮涌起，粤汉铁路、沪杭路等的风潮，收回国权的运动，都是表示资产阶级在客观上是倾向革命的，但无他们的政党领导此革命。当时唯有梁启超进步党等，但不领导此革命，故领导此革命的为国民党。而国民党的政纲是有许多缺点的，仅仅做点军事的运动，没有做大量宣传政治运动，采用军事策略，并没有推动资产阶级，仅让农民群众到革命路线上，故在客观上各阶级都有走上革命路线之可能。而在事实上到武昌一役，只能成功上层革命。军事革命与民众遂没有发生什么关系，民众并不知道此次革命。因此国民党趋于妥协而将政权遂让于封建余孽——北洋军阀之手。而民众认为国民党为破坏党，而反去相信袁氏，帝国主义以及进步党在民众中反对国民党而赞成封建余孽，亦是有很大作用的。故此革命失败了，此次革命失败证明：

第一，资产阶级力量很小，虽在客观上参加了革命，但不能领导这革命。

第二，此次革命在客观上农民应是很大的势力，只是没有首领，国民党亦没有抓住他们，推动他们。

第三，无产阶级虽参加了，但不是自觉的指导者。

第四，领导革命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但国民党没有认清他的群众和敌人，即不明此次革命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

太温和了。不知如何去取得群众，所以说小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革命的。故我们的结论是：辛亥革命也是因为缺乏领导阶级，故失败了。由中国的政治经济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是在做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革命，彻底成功直到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从各阶级的势力分析来看，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亦即是缺乏有很好组织、很好政策的阶级势力，而只有无产阶级可领导这革命。前二役是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虽稍有组织，但仍是无力，故革命延长下去了。以上中国革命为旧的阶段。

(3)新阶段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独立运动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运动是否停止了昵？没有！不仅没有终止，反在经过八年之后，中国革命运动更发展一新的阶段了。何以谓新的阶段呢？举例来说在一九一九年新发生了“五四”运动，他的意义呢？至少有三个：第一，他是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第二，他是由倾向于美国而转倾向于俄国的；第三，脱离了国民党。他是一新的表现。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不是始于“五四”，在鸦片战争以前即有了（如广东的平英团）。义和团亦是一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但与“五四”是不相同的。前两次为广大的破产农民运动，而知识阶级是落后的。可是“五四”运动则为学生运动，而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故“五四”运动不仅得到一般民众的同情，即大资产阶级、纱厂资本家聂云台，南洋大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亦表同情，因为这个运动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益的。他们“大资产阶级”不仅赞成，还在事后给以物质的帮助，如简照南之派送“五四”运动之活动学生赴美留学。此次运动的方法与以前亦已不相同了，以前为迷信式的，原始式的，现已开始采用宣传煽动组织群众的方法，以便各阶级反帝国主义了。“五四”运动的开始是倾向于美国的，但结果倾向于俄国了。“五四”运动的背后指挥力量，如北京美国公

使以及各地的美国牧师，故此次运动的方式是美国式的，含有日、美冲突的缩影的。当时思想上、精神上的趋向亦为美国式的，如同 Democratism 民主主义与科学，实验主义。但是结果如何呢？威尔逊的十四条到凡尔塞和会而破产了。中国民众所希望要求的是美国帮助中国人取消二十一条与退还山东的主权，但结果在和会中帝国主义者反相互承认日本在华所得的利益是合法的，于是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见俄国十月革命，一面推倒了沙皇专制，一面推翻了帝国主义干涉，建立了工人国家，以前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现在转而倾向俄国了。故知识阶级中起了一个分化，已有一部分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了。“五四”运动的产生是无政党的指导，国民党站在以外不闻不问，而真正的指导人则为美国公使和牧师、留学生以及受美国思想毒的知识阶级分子。北京、上海学生虽然派代表见过国民党，而孙中山竟以无力为由拒绝参加。于是他们又找孙洪伊（即小孙，此时他们退出进步党而加入国民党），结果这个革命的高潮竟脱离了过去指导过革命的政党，这是何等的有意义啊！这个趋势很可以证明国民党又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并超过其注意力了。中山此时注意的仅为护法，是使革命运动愈走愈狭隘，而只注意军事及广东了，对宣传组织民众往往是不注意的。一个革命的政党在革命的高潮中完全不能领导，可见他快要死亡了，故此次运动中的一些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而有利于新的政党的产生，中国革命需要组织各派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引导革命的党了。

###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1，国民党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比较。这新党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国民党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相比，在马克思主

义未输入、工人阶级未发生以前，指导俄国革命的为民粹派，但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民粹派指导革命的方法就不行了，即采用的为恐怖手段，其团结的势力为个人主义的英雄（知识阶级），而不相信群众，所以在客观上已要求有新党用新方法（科学方法）以团结各种群众力量了，即是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工党）因此而产生了。换言之，就是要求无产阶级的政党以指导革命。中国在“五四”时亦然，国民党老了，快要死了，其方法、政纲与社会革命党差不多。而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亦与社会革命党的相同。在客观上已需要无产阶级的政党来指导革命。当马克思主义开始输入俄国时，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关于俄国是否要经过资本主义的过程的问题曾有很激烈的争辩，民粹派以为俄国已经很适合于实行俄国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小资产阶级之理想。而马克思主义派则坚决的反对这种错误思想。中山亦是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想用平均地权的方法而阻止之，但这也是完全的空想。这两个口号——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首领拉拢工农手段，而在事实上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两个政党所采取的方法如何呢？俄国社会革命党为恐怖手段，而国民党亦然，中山虽已看清民众，而主张利用会党、土匪军队，但同时亦主张暗杀，对农民工人参加革命的力量以前是看不清的。汪精卫就是一个恐怖者，张继时对中国问题亦主张青年去实行暗杀，对工农力量是丝毫不相信的。他们只知黄花冈之役，只称赞温生才一个刺客的行动（诚然他们有可以称颂的地方，但这种手段方法是不行的），而不知有群众。我们现在奸滑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压迫的方法手段一天天的进步，我们如何能用旧的方法以应付他们呢？迫切要求有一明白历史的发展客观的环境和今后的倾向的党了——即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欲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不仅要明白八十余年前的客观环境各阶级势力的关系,并应明白“五四”以后的倾向——新的力量都起来了,如罢课运动、自治运动,湖南驱张(敬尧)、安徽驱马运动,各地农民的暴动,反对苛税以及小官僚部员的索薪运动,不仅和平要求,而且竟然罢工,简言之,这些群众的力量都革命化了。军队如何呢?差不多此时亦常常的发生兵变,而因生活困难都革命化了。土匪是无处不起事。连落后的女学生也参加运动了。不仅是大产业工人罢工,而小手工业者都起来了,这是些什么现象?这都是证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各种势力都革命化了,要求革命的政党的指导了。我们由此事实,由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分析,客观主观都要求一强固的阶级做中国革命领导的势力,尤其是在“五四”以后,证明过去指导革命的党是不行了,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把上面所说的话总结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

第一, 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

第二, 小资产阶级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证明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第三, 农民未有起来;

第四, 无产阶级尚未有占在领导地位,无产阶级应是各种势力之组织者、领导者,他应该领导中国革命到底,并去完成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

#### (四)党的政治生活与劳动运动之进展

1, 工作方面,整个的报告大致是偏重政治方面的,因为劳动运动李立三已报告过了,但是政治方面是不能离开经济事业的,故

非说一说职工运动不可：

党的初期工作，因为党成立至二次大会时间约一年多，在此时间中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是非常复杂的，同志们容易发生误会，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做无产阶级事情，其实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想真正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当然我们的工作是可以简单的，如其他各国社会党一样，只做经济改良争斗就够了（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做工人运动，使无产阶级不推翻资本制度，不去取得解放。所以我们要看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是领导工人阶级到解放之路，就要看我们的工作范围如何？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组成工会作经济争斗，并且要组织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商人而领导他们革命。中国共产党开始的工作范围就是无限的，不仅领导工人运动，而且领导学生以及其他被压迫的民族革命的争斗，这是非常对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是应该夺取政权，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方能够实现的，若仅仅要求改良待遇则奴隶地位永久是一样的。如欧美的贵族工人虽生活较好，但仍是帝国主义的奴隶，而且工人一时罢工所得的胜利，只保障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不断的进攻。故无产阶级之解放则即是革命，但如何革命？革命靠本身的力量，但这是不够的，因为除本身力量而外，必须准备一统治的势力，而且要想革命仅仅靠无产阶级派作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之压迫，我们不仅是本身而且常常要抓住利用其他势力，如国家机关、社会阶级的势力。如：第一，农民，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无农民的参加是不会成功的。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如无农民的同盟亦是不会成功的；第二，知识阶级；第三，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的数目是很少的（全人口比较起来），但何以能

统治大多数无产阶级呢？即是他能得到各种势力而可以维持。我们无产阶级唯有组织势力，由资产阶级底下把农民拉过来，方能推倒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而成为统治的势力。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即在没有抓住他的同盟军。“二七”失败亦然。“五卅”运动先所以胜利，即在各势力是集中在我们影响之下的，故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范围是很复杂的（不过不是以量取胜）。兹先以初步工作述之于下：第一，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二，成立青年团；第三，上海机器工会；第四，开始反对基督教运动；第五，发行《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等刊物；第六，人民出版社；第七，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第八，各地工作。

现分述之如下：

（1）劳动组合书记部，指挥全国劳动运动，总部设在上海，湖南、广东、湖北其他地方均有支部。自成立后，即发行《工人周刊》，在北京、上海、广东各地均有很大的影响，并实际指挥全国劳动运动，而为一中心机关，为我党职工运动中心机关，故此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职工运动历史上都算最有力量、最有意义的组织，尤其是对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前途上有很大的关系。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曾在长辛店、唐山各处组织工会，但工人完全是被他们利用了，他们亦没有教育训练工人阶级使其觉悟，广东工人尤其是海员工人，虽亦曾跟着中山跑过，但为中山所利用，而中山并没有给他们实际的利益，他们也没有阶级的觉悟，无政府党在广东亦曾组织工会，但他不仅没有使工人阶级觉悟，而且反对阶级争斗，他们不愿灌输工人以革命的理论，反提倡互助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故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2）党的第一次大会后不久，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都成立了青年团，而成为本党青年运动的机关，亦在革命的学生群众中

积极工作了。

(3) 机器工会, 当时在上海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但现在已不存在了。

(4) 反基督教运动的开始, S.Y. 出版反基督教的刊物很多, 并在上海、北京、广东各地开反基督教大会, 这时基督教正在北京清华大学开大会, S.Y. 的机关报《先驱》出反基督教的特刊。反基督教的小册子, 当时发行亦很多。

(5) 党的出版物, 除《新青年》外, 还有《共产党》月刊及《工人周刊》等, 销数很广, 宣传亦很有力量。

(6) 人民出版社, 设在广东为我党言论机关, 出版了很多书籍, 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7)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我党根据全国劳动运动情势而开第一次劳动大会, 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 计有代表六十人, 二百个工会代表三十万有组织的工人, 议决政治的要求十七条, 大会为全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形成的第一步, 大会并委托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在此大会后作了不少的全国宣传和提出工人阶级的具体要求。吾党经验少, 能力薄弱而作的工作这样多, 是不是应该的呢? 是应该的, 如不这样即非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了。此外在本时期中还领导了思想、文化的争斗, 新思想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并使中国知识阶级起了一大分化。由它的工作看来完全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奋斗的党了。

## 2. 精神方面:

(1) 思想理论方面。党在初期形成时其内部生活如何呢? 状况如何呢? 发生了一些什么现象呢? 理论是否统一的呢? 政治观点是否正确的呢? 对主义的了解是不是深刻的呢? 真正的革命党, 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 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



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但党的理论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短时期可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形成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样，是要经过很长期的奋斗才能形成的。列宁主义的形成就是由于同投机主义、改良主义争斗中得来的，开始与修正派（伯恩斯坦），以后与俄国经济派、少数派、第二国际的投机派、考斯基派做政治的争斗，故形成了列宁主义。所以党的开始成立时，其思想趋向是不会一致的。故中国共产党此时虽已发起组织了，而我说它的内部思想趋向统一，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形成时，其内部精神状况如何呢？内部思想和趋向是不是一致的，如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经济派，对于政治的争斗是离开了的，以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目前的责任，即在领导无产阶级改善生活，至于对于推翻俄皇的革命，则以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该由自由派去担负的，而与无产阶级无相关的，故他的口号是“给经济争斗的本身以政治性质”。换言之，即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可以向资本家请愿，改良工人生活和待遇，可以向政府提议劳动立法、工人保险等，而做些议会运动，口号好似很左，“工人只作工人本身事情”。其实是大错而特错的。同时他们这些投机改良的人们限制党的工作范围，他们说工人阶级的党只应作工人阶级本身的工作。因此，他们对于革命集中的政党组织也是很反对的。他们以为党与工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党尤其是不应该由革命的职业家所组成，以为党内应该是一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宣传煽动，出版报纸，以使工人很狭隘的作经济争斗，作局部争斗。而列

宁主义者首先就反对经济派主张的观点，以为他们是英国劳动组合的政治观点，而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换言之，即非俄国当时社会民主工党的观点。由以上看来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

(2)党的内部精神状况。我党初形成时，内部有些什么倾向呢？团结一些什么分子呢？我们知道党开始形成时，分子当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同质的先进分子，纯粹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政党能够成为同质的先进分子，非有长时期的争斗以训练不可。马克思、恩格斯在初期组织第一国际时候是否只能团结了一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派和新社会主义派呢？从开始是团结了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派。在德国开始形成社会民主党的，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派，同时尚有勒塞列派的。故一政党在开始时不会就团结了一些同质的先进分子。其他如法国社会党开始是五派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八九八年形成时亦非马克思一派所组成的，而有合法的马克思派(经济派)之存在，后来经济派以及少数派都渐渐走到反革命，走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样看来政党的形成，即须要做政治争斗的，而在开始时须找政治的同盟者。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组织第一国际时，无政府主义派即为同盟军，而德国之勒塞列派、俄国之经济派都为真正马克思派的同盟者，不过都是暂时的罢了。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谁是他们的同盟者呢？有两派人是他的“暂时的”同盟者。

第一，无政府主义派。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与我们同盟的如何呢？我党开始形成时，去那里找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呢？真正能够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的人呢？且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

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当时曾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相信了无政府主义。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故在上海仲甫同志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九(沈玄庐、李汉俊等的朋友与“五四”运动颇有关系)也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仍占多数;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化,并在共产党的机关组织他们的党团;在北京他们霸占宣传机关,叫守常做庶务,国焘去跑路。故在北京、广东组织上往往发生冲突,开会时他们总是暗自先开个会讨论问题,不是从共产主义ABC起,而是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讨论起,阶级斗争对不对,集权制对不对?无产阶级专政应不应该?故党内此时即无一致的思想,且简直闹得不成样子。在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较弱,在吾党成立不久,沈仲九即以主义根本不同,不能合作,而不斗争的消极退出去了。在广东、北京每一次开会均有争论,并且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得十分冲突。但在北京我们同志既占少数,所以守常很为踌躇,而国焘则主张与之决裂,后来结果把他们赶出去了。广东S.Y.有二、三百人,但完全在无政府党人的手中,故我们将他们解散了,而从此由我们组织S.Y.。广东无政府主义的首领区声白,比较是进步一点,在理论上后来对我们让步,承认阶级斗争,而始终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故结果亦退出了。此种斗争经过了相当的期间,在形式上是决裂了,其实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是在斗争的,尤其是在湖南和广东的理发工会,都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的

(无政府主义输入城市的结果)。不过现在他无统一的组织和宣传物了(工人中组织很小的一部分斗争)。无政府主义党对我们直到现在还是仇视的。并且有无数个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我们的同志了,或者抛弃无政府主义了。至于他们的首领如区声白让步了,黄凌霜(现在美国)到俄国给仲甫信,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了。由这点看来,开始时是与他们合作了。这一短时期的合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意义实在是很大的,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急进分子是容易相信的,所以我们与之合作,并经过一时期的辩论后,他们这些先进分子都被马克思主义化了,而成为我们的同志了。

第二,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当初才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以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派,但是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派,而是中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我们对于他们的争斗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他们的理论虽然没有怎样的有系统,但实际上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经济派的背景。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办《星期评论》时,其研究宣传的题目如何呢?他一面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面也读过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终是学生<sup>①</sup>的态度与怀疑的。我曾记得有一篇论文,最后的言论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怀疑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当意义的。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怀疑的。李汉俊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程度似乎高一些,他的著作多些。戴季陶对于经济学的了解是不很好的,多少是跟中山跑的,有许多是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党初形成时期中,李、戴有些什么不同的意见呢?党内大的倾向的不同,不是开始就有很大的倾向,而是由小

<sup>①</sup> 原记录有误。

的不清楚、不明显的渐渐的扩大了。李汉俊在党内第一注意是宣传，尤其是学生中的宣传，当初我们认为也是错的。“五四”后学生起来革命化了，是需要新思想的，戴季陶、陈仲甫都是很重视的，但后来就不同了，李汉俊渐渐开始主张专门办学校，看书籍了，起初虽亦有相当的理，但他这种“专门”是错的倾向，他主张我党团结、组织先进分子（当然是知识阶级）是应该的，但当成“专门”就错了。他所以接着反对做劳动运动，而渐渐形成政治上的逻辑了。他认为我们应办学校，看书籍，宣传学生，而不应作组织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俱乐部在汉俊看来都是多事了。他认为我们应当先组织学生，其次在政治上取得势力，然后组织工人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归纳他的政治主张则有以下几点：第一，专门宣传学生；第二，反对作劳动运动；第三，认为学生是党的基本势力；第四，反对政治运动和宣传；第五，反对有政治机关报；第六，反对中央集权制；第七，怕工人入党；第八，反对加入国民党；第九，反对领薪水。

兹再解释之，因为他们政治观点错了，所以他主张先组织学生，反对团体的组织，他以为我们的势力很小，是不应该就作政治宣传的，这些政治工作让其他党去作好了。汉俊、望道都反对党的宣传和传单，他们是对于这种工作很害怕的，不高兴的，而且认为能够损害他们地位的。所以他们说我党势力小，如被捕就完了。并且他们以为宣传政治是很可笑的，因此他们只注意本身。他们对政治机关报是很漠视的，而他们对组织根本反对集权，他们以为我们第一，只作些文章去宣传学生，何必要中央集权呢？第二，他们是由旧观点出发，以为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的。因此他们对列宁在俄国的行动也是很怀疑的。其实他们似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有天然无政府的倾向，且在主要观点上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存统过去赞成汉俊，就是

根据他天然无政府主义和主要观点上的无政府主义。汉俊第三反对铁的纪律,以为这就是专政。在第二次党的大会时,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汉俊的,望道、存统只赞成一部分。这是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大会时,汉俊写一意见书,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说: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他反对加入国民党,是以为我们这样幼稚的组织而与别党合作完全是空话。对党的组织,他主张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为原则,合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中国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故中国共产党无集权制的必要,且目前亦无集中组织之必要。例如,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即要设中央也不要三、五委员,只有一人坐在中央。各地方政策不宜相同而应由各地方自己去决定,中央大会是不能定的,反对有一致。这意见书到后(他自己并没有来,这一本意见书是托振法同志从河南带至大会),仲甫同志当时曾致电叫他,但他始终没有到会。由此可见,他已形成一致的思想了。他对党的工作限制,对一般的观点都错了,自成为汉俊主义了。他的主张是有他的背景的。而戴季陶在党内没有很长的时期(加入党不久就退出了),他退出的理由,是因为对不起中山(他以为对中山的关系太深),从道德、心理都过不去,所以他不是因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为避免国民党攻击起见,只站在党外帮忙来合作,他在党内至第二次大会时已不来了。好象有许多事实不可说。其实他在未入党以前已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了,而且退出的原因,是因为同孙中山的关系太深,同时他平时的主张又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而主张阶级合作的。他的具体主张是反对阶级斗争的,是根据民主主义来的,他以为如果搞阶级斗争是妨碍国民革命的,是会把国民革命阵线冲破的,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两党信仰既不相同(中国共产

党信仰阶级斗争，而国民党则信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如信仰共产主义对国民革命是有妨害的，如信仰民主主义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但这不过是表面上的，而在实际上是完全想把劳动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工具，使中国劳动运动隶属于资产阶级，这就是戴季陶主义真正的最后的精神。简单地说我们是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变为劳动运动的一种工具，也就是无产阶级要利用民族革命以达到阶级解放的一种工具的。这两种精神的背景如何呢？这完全是代表两个阶级的对抗。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所以我们对戴季陶主义是斗争的。斗争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俄国当时亦如此，在欧洲各国亦都如此。在革命潮流高潮时，在工人阶级势力膨大时，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看见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危险，于是在主观上或假意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在客观上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何以把戴季陶列在一起呢？因为他怕工人（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加入我们团体的代表），在客观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了，戴季陶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李汉俊不主张我党作政治运动而将政治工作责任给国民党，给予资产阶级的党去了。近来戴季陶主义很明显的反对C.P.的存在，外面的宣传则说：我主张C.P.脱离国民党，是于共产党独立。其实他以为在中国急需的就是国民革命，而三民主义适合各阶级的，故现在中国无须乎有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有妨害的，所以他主张是要把工农运动抓在国民党手中，从根本上拆散中国共产党。××独立派，想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民主义化，这种野心是何等大的啊！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是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啊！他已是我们的叛徒了。他是与我们对垒斗争的，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继续的与他斗争。另外李汉俊的主张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他反对吃革命饭、领薪水（根本不

了解职业革命家的意义,以为每个党员应另有职业)。他现在已开始反动了,俨然与人家共同组织新社会民主党,自以为是一半采法第二国际,一半是采法第三国际,而实际上他的主张反对苏俄联络日本,并办大学校以专门吸收我们党开除的同志,所以他现在完全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了。由不自觉的反动而趋于自觉的反动了。这些思想虽然在吾党的历史上是很短的,但对我党有很大关系,例如现在戴季陶主义在中国政治上已发生影响了,他们在我们党内存在的时间很短,他们的势力又小,我们对他们又没有很长的很激烈的争斗,也是因为这个倾向在党内没有大发现,所以没有与他大争斗,故在党内亦没有公开出来。他们现在虽没有打入工人群众,但现在国民党中或国民党外部积极的鼓动小资产阶级并从事劳动运动以破坏我们的劳动运动。故我们与他们的争斗是很激烈了。我们与戴季陶合作这一短时期是有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很快的,因为他们都有社会地位,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了,互相争斗起来了,我们做民族运动,现在领导地位,而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发展越厉害,他们也愈害怕,故渐渐形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反对我们,并在组织上破坏我们。由争斗又看出我们是对的,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总之,他们限制党的工作,使党成经济派、改良派,限制党的工作给予国民党去作,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短期中,虽有资产阶级急进代表加入,利用工人运动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党已制胜他们了,他们已退出去了,与我们公开的争斗起来了。我们是应该继续同他们争斗的。中国、俄国经济主义者和俄国无产阶级叛徒与中国无产阶级叛徒是一样的,俄国经济派的口号是“走入工人群众中去,而不作政治工作”;李汉俊的口号是“走入学生中去,不作政治工作”,这些都是很笑话的。经济派口号出来时,列宁曾说,无产阶级政党



不仅要走入工人阶级群众中去，而应走入社会各阶级中去，以利用他们的力量。故中国共产党不仅作职工运动，而且要作团结各阶级的民众工作，不仅领导工人阶级，还应领导各阶级的民众。只有如此才能证明我党制胜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得到完全的成功。

#### (五)党的第二次大会到第三次大会

第二次大会在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三次大会在一九二三年。在这年中，中国工人运动的潮流兴起来了，广东、湖南、湖北及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均勃兴，广东、湖南各地都得到很大的胜利，只有上海的罢工是失败的，但也不能影响于全国。这些职工运动因“二七”的失败，各地均向工人阶级进攻，以致渐渐消沉下去了，我们现在分以下几个方面来说：第一，职工运动；第二，党的政治生活；第三，党的内部生活。

1，职工运动。这时北方京汉路工人的组织发展起来了，同时唐山已早有工人罢工的发生，在长辛店已有张国焘等设立的工人补习学校，把我们的工人刊物《劳动音》普遍起来了，并举行了“五一”节，北京也举行了纪念日，都有很广大的群众参加，就引起了北京政府注意，被捕了许多工人，但不是我们的同志。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渐渐起来的，不过在香港罢工胜利以后跟着扩大的。此时湖南组织了工团联合会，发生了人力车夫及纱厂大罢工；在安源三万人的大罢工，结果得了胜利；在水口山也组织了很有力量的俱乐部；在湖北工人运动跟着扩大为人力车夫和汉阳铁厂的大罢工。它影响全国都组织起来了，湖北工团联合会并设立了“劳动书记部”，也设立了支部，于是引起了中部的工人运动。而在广东的影响下香港的罢工，他们也组织了一百多个工会，在“五一”节组织了大示威运动，参加者有八万多人。在我们指导之下，这时广东有两个指导机关：一个是总工会；一个是广东工团联合会。而在上海有一纱

厂大罢工，也在我们指导下，也组织了一个工会，不久失败了。这时党的计划要把沪宁铁路组织起来做为上海工人运动之中心，结果也没有成功。

劳动立法运动，这时工人阶级发生了立法运动，我党有下列几个原因也来做立法运动。

第一，引导劳动运动到政治争斗上来；

第二，直系欺骗工人，我们于中揭破其面具；

第三，职工运动的本身，职工会是不能永久存于秘密的状况下，而事实上劳动运动这时已起来了，但政府常用法律来压制，所以为本身计，提出劳动立法；

第四，对付工贼，自职工运动发生，即有工贼发生，如交通系收买工贼，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是使工人流血的，是利用工人残害工人，工人要同交通系合作，利益要大，这影响工人很大，为对付交通系工贼计，可以主张劳动立法；

第五，这时有投机政客（胡鄂公等）借立法运动来欺骗工人，所以我党应先发起这运动。自立法运动的提出后，全国工会互相赞同，虽未成功，但影响甚大。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所提出十七条，使工人有深刻的印象，第二次劳动立法运动，就是共产党第一次引导工人阶级走向争自由的路上来，因此这时就决定在一九二三年“五一”节在汉口成立全国劳动总工会，后因“二七”失败未实现。这时职工运动的政策：第一是极力在北方组织工会；第二是引导劳动运动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这时期党的政治生活如何呢？

## 2，党的政治生活

(1) 各国政治状况：吴佩孚打倒日本的工具段祺瑞之后，新的军阀崛起的时候，在南方陈炯明作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及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完全被消灭，这时国际情况为华盛顿会议后，日美

冲突最厉害的时候，结果日本失败美国胜利了。

(2) 这时党的生活状况：在第一次大会（一九二一年）我们党没有决定什么政策，曾讨论过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但无具体的决议。当时的意见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赞成派的理由很简单，没有说明政治理由，而只主张合作。反对派的理由以为国民党已经消灭了，没有什么作用了，所以主张自己统一势力。这是从国民党本身来反对，而没有从政治上去了解和分析，所以第一次大会时对此问题没有决议，只有宣传和党纲的规定。这证明，只能说是宣传机关，而说不上政党，因为对政治问题没有政策的决议。到第二次大会时党已有政策，开始作政治的宣传，从前完全是鼓吹主义，这时是政治的主张了。

(3) 党的第二次大会，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的，这时我党才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论是：

第一，辛亥革命未完成。我党分析的理由是：

① 帝国主义帮助反革命来压迫革命。

② 政权落于封建军阀手中，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要继续的革命，所以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当时共产党即发表对时局之主张，第一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的势力；第二分析北洋军阀之产生及其存在（是帝国主义帮助的）；第三分析辛亥革命失败之原因，是帝国主义帮助。因此，这次大会提出的口号是继续辛亥革命，联合各阶级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这次大会还讨论联邦制问题，因为这时一派主张武力统一，又有一派主张联省自治，还有一般大学教授主张立法（美国式的），孙中山主张护法。所以此次大会对于这几派的主张都加以分析，并且在宣言中指出其来源及谬点：武力统一是军阀专政，这对帝国主义与军阀都有利益的；联省自治是小军阀瓜分中国，使帝国主义在中国有固定的地

盘和势力。胡适等主张立宪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这完全不了解中国病源是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说能用宪法解决中国问题，是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欺骗人民的口号呢？我们说宪法是革命的结果，没有革命决不能产生真正民意宪法。其次，反对孙中山护法的错误，我们说明现在是革命没有成功的问题，根本不是护法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继续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讲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们主张联合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宣言是党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的政治主张，贡献于全国人民之前。怎样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呢？所以党决定在北京办一《远东日报》（一九二二年八月决定），专是宣传国民革命，而国际代表马林反对，理由如下：第一，本党能力不足；第二，恐不久被封闭；第三，以为当时党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只应办一周刊等。因此一九二二年九月我党机关报为《向导》，发行这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本报的影响及本报未出世以前的思想：

① 封建的政治思想绝对不知道中国的政治乱源如何。复古尊孔，提倡道德，反对民主制，代表此思想的中坚人物为军阀。

② 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为交通系、研究系，他们否认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认为国民革命弄糟了，以为中国主要问题是提高文化。

③ 买办阶级大商人的思想，一方面崇拜帝国主义和军阀，一方面反对国民党而无独立的主张，且禁止谈政治口号，如在商言商，即国民党党员亦变为军阀的走狗，或消极完全不谈政治了。一部分党员（张浦宗、张继），反对驻防军，以为中国之乱由于军阀，但认不清军阀是整个统治阶级，而仅仅反对的是那个人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的最高主张。对帝国主义完全认不清，尤其认不

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且否认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关系。自我党政治报出版后，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当时称我们的主张是海外奇谈的研究系，对我们的言论，谓宣传共产主义是可以的，至于主张与俄联盟、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在第四期，帝国主义者完全将《向导》翻译在《字林西报》登载，四期以后，工部局即严禁出售。

④ 普通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向导》周报在最初出三千份报，而增至四千份，思想界起了大的变化，并对国民党丧失希望，《向导》在上海、长沙、北京都有出版。

⑤ 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以前工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家，但工人能看报的说不上政治，他理解不了整个观念，而且还受军阀的影响，还没有共产党的政治观念，此报发出后，才把同志们地方观念打破，非党观念改变过来，所以《向导》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总起来在第二次大会后党始有政治的策略，并且实际上做了许多成绩，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界上亦有很大的影响。在党的本身说，不仅统一了思想，而且作了组织的工具。

第二，民权运动大同盟，是在“二七”以前发起的，两湖、上海、广东均有此组织，这时在政治上即有政治的主张，但怎样进行，在第二次大会还没有决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原因是：

① 本党只有抽象的理论；

② 国民党未变换态度及孙中山态度不定；

③ 这时的政治情形，如吴佩孚胜利时，在广东虽然孙、陈得广东，但陈马上反孙，另方面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正是兴盛起来的时候，孙中山这时主张四派势力联合，第一西南派，第二奉系张作霖，第三安福系段祺瑞，第四直系吴佩孚，这是孙中山的主张，同时他对外主张联德，代表是朱和中，到美国代表是马素，到日本是廖仲恺。这时我们看得出他有两个幻想，第一是希望军阀

和平；第二是幻想帝国主义帮助。这时对我们敬而远之。这时我们当然不能与国民党发生具体关系。既然如此，我们用什么方法实行我们的主张及政策，因为我们的政策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要组织民众，所以党决定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这时党内曾有讨论，如国民党不与我们合作的问题，C.P.不能公开的问题。因此这时我们决定组织第三党，但在当时不能正式组织党，最初只能组织普通团体，所以我们开始在北京组织了，参加者非常踊跃。但在北京的知识阶级的政治观点很弱，如他们赞成精神很好，对实际上去做觉得害怕，并且不承认打倒帝国主义，结果后来北京教职员也参加了，甚至议员也参加。

第三，一九二二年九月<sup>①</sup>西湖会议。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① 在此次会议以前曾讨论过此问题，一九二二年C.P.第二次全国大会时，国际代表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而有一部分不赞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论上赞成，但关于具体方法，会议的结果要中央解决之，所以我们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致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国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P.的党，故因此未作。

② C.P.第二次大会议决了政治的纲领，内容是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各阶级与国民党合作，这是党未开西湖会议以前的两件事，这时候党员和团员对加入国民党非常不满意，但在另一方面又看不清革命的道路，这些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是：第一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革命方法倾向于军事运动，所以不赞成加入国民党。

③ 西湖会议的经过，结果一方面两党联合，另一方面设法个

<sup>①</sup> 应为一九二二年八月。

人加入国民党，经过数月后才加入（和森、秀松）。此后我们才与国民党发生具体关系，但影响很少。但这时客观的要求不仅如此，我们的政治生活也不仅如此，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全国劳动群众和学生运动非常发达，因此这种的影响很大，反映到北洋军阀派内越分裂，吴佩孚反段、反日本，这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军阀的分化第一次不能不说吴是左派军阀，这事我党是什么态度呢？C.P.对于任何事变必须参加，决不应中立，放过机会，究竟在这时我们对吴态度是怎样呢？反对吴必须赞成国民党与段及张联合攻吴，其次就是作国民党与吴佩孚联合的政策，我们怎样决定政策呢？首先看国际的情势，其次看国内的形势，在国际方面是华盛顿会议，英美竭力要吴统治中国，但关系未固定，而日本与段、张关系比较巩固，同时吴佩孚对群众和国民党态度都比较张作霖好，所以我们赞成国民党与吴联合，如我们赞成国民党与段、张联合就是右倾危险很大，结果使国民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这时竭力破坏国民党与段、张联合，赞成国民党与吴联合。还有一点，孙是揭破吴佩孚的黑幕，如他真能赞成中山，于国民的利益是很大的，这种事实虽未做到，但有三大作用：一使吴与英美帝国主义关系暂时不能密切；二使国民党与张关系破裂；三可以揭破吴佩孚的种种面具。

此时借吴佩孚的势力打倒交通系在京汉铁路的势力，所以此种政策在政治上收相当结果，在劳动运动中打倒交通系在工人中的势力。在另一方面对南方陈炯明的政策，自“五四”运动后，陈不但赞成民主革命，并且日益赞成社会革命，学列宁，因此我们曾与他在短期间发生了关系，但到他反动时，即与他脱离关系，而且坚决的反对，当那时与陈联合时曾办了《闽星》、《群报》，这是对于党有利益的。再其次就是联省自治的政策，原因是，第一是小军阀对付大军阀，第二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之分裂，第三各省政客绅士

想撵地方政权。自吴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有武力统一的趋势，所以小军阀号召联省以抗吴武力统一的口号，这是社会的影响，因民众厌恶战争，希望和平，所以这时复辟的思想复兴起来，这不是偶然的，乃在历史上都是如此，所以表现出复辟思想，这是建筑在社会的背景上（落后的农民）。吴之武力统一是这个传统思想，是建筑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上（纺纱业），所以武力统一的口号得长江流域大资产阶级的同情，尤其是庐山会议、制宪会议，上海资产阶级特别起来响应吴佩孚，赞成武力统一，尤其是赞成反对日本，所以小军阀不得不在政治上找一个口号，但如果中国分裂究竟对帝国主义有什么利益呢？第一不能使中国工业发展，第二可以加强他们对中国的财政的统治，帝国主义可以均衡在英国的势力下瓜分中国，使中国民族不能形成一个整个的民族以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那么联省自治就应做了，但这口号怎样号召呢？原因是第一，一乡一村农民可以自治；第二，知识阶级的投机，产生政客，因此我中央重新提出口号，各省小军阀的主张自治，这联省自治影响一般知识阶级是很大，这是辛亥革命后及“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到“五四”运动已由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开始打破此种思想，中山自上次失败后发表宣言反对英国，所以日本主张亚细亚与条顿民族同盟，反对昂格鲁萨克逊（英、美），这且是战前的思想，这恰与世界的形势相同。自大战发生后，即发生中国参战问题，所以就主张参加协约国（这是段祺瑞的主张），但国民党主张参加同盟国，战后主张中、德、日、俄联盟，所以发生实业借款。

3，党的内部生活。党内的生活都有什么问题呢？第一是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第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态度问题；第三是小组织的问题；第四是广东的党部问题。

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在第一次大会仅汉俊到会，和森、独



秀未到会。因他有许多的错误，及我们对他有许多的批评。这时他对国焘同志有很多不满意，同时对独秀也不满意。因编《向导》周报和组织问题说独秀是专制，这就是因为汉俊、望道他们的意见与独秀的意见根本不同，按党的影响来说，他们是争领袖，结果大会选举第一届委员为独秀、国焘、李达，因此汉俊非常消极而回家去当教员，所以第二次大会召集汉俊他未到，只写一封意见书，内容是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及作劳动运动和领薪水等。玄庐比汉俊煽动力高，而他与戴季陶关系很深，但他与汉俊的消极是一样的，因为在党内也是没有占着地位，所以也不满意独秀。他的生活非常奢侈，后来他到浙江作议员。最初他作过农民运动，而到做议员时，他就联合了一派议员，所以渐渐变成了浙江省宪派，因此他影响一般的群众，所以在政治上的势力日高，渐渐就表示脱离党，不久就请求退出党，理由如下：第一说党内有拆白党；第二说党不注意农民问题，同时反对青年团改组，反对集中制，因此他另组织青年团，势力比我们要大，并且他另出一种刊物，到第三次大会派人请他，结果他不到，而后来中山派蒋介石要到俄，这时他同蒋介石一起来俄到莫斯科，以后才稍稍变更，承认不出党。国民党改组时，我党派他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及浙江省党部的预备员。后来中央减少他的预算案及与同志及生活问题而又引起他对中央不满意。到第四次大会时他发表意见：第一，主张国民党独立，不应由共产党去指导，尤其反对党、团在国民党中的组织；第二，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第三，共产党的组织在各地不要太发展了。他为什么主张国民党独立呢？这就是社会的背景使他只主张作民族革命，否认无产阶级是领导革命的力量，同时又反对阶级斗争，完全是受戴季陶的影响，所以在第四次大会后又渐渐消极下去，而到了第二次国民党扩大会议时，一九二五年五月戴季陶提出

最高的原则，他说国民党唯一原则就是三民主义，就是要使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时玄庐就取反叛党的态度特别明显，所以党决定开除玄庐。望道同志在主张上与汉俊、玄庐等全相同，因个性阴沉，反对集中制和批评，怀疑工人加入共产党，反对大罢工，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如此公开，同时在第二次大会时，旅莫同志回国，以为上海太消沉，多数主张积极活动，但望道非常消极，这时中央显然分两派，所以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问题，结果这次委员为独秀、国焘、君宇、和森、中夏等同志，因此望道对中央更加不满。在西湖会议时，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望道一直消极下去。汉俊、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对党的影响如何呢？大部分同志认为汉俊等退出党是独秀同志专横，使汉俊等消极，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到现在才明了。又有党内同志反对国焘同志批评的态度太严重，第一次大会时国焘批评汉俊等太严格，后来国焘同志由莫回国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处严重批评，而引起全国同志不满意，国焘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的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另一方面国焘太左，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大会未解决，因国焘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所以又发生下面的问题，第二次大会后所发生的小组织问题。因为这两派的见解和行动都有分别，所以第二次大会活动分子被选，自然的党内分了派别的观念，反对“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中央组织发生关系的问题，后来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怎样实行第二次大会决议，只有活动分子全到，这时太雷发觉后即报告中央，因此独秀辞职。不久仲甫同志被捕。以后我党又开西湖会议，此次会议讨论问题是：（1）小组织问题；（2）对国民党的态度。

在西湖会议上解释小组织是偶然在表面上表现，完全没有别

志相信公博太深，其次相信陈炯明反对中山是对的，再其次不相信国焘，以为中央此举为国焘所为。此时广东情形非常不好，他们以为应开除国焘，后来公博去英国，植棠被开除。以至“二七”后中央移广东，广东同志始觉悟他们之错误。以上四个问题，只有一个是态度问题，其余三个问题是根本的政治问题，这种倾向在幼稚的党中是影响很大的，同时他们在党中的地位很高，所以不得不与这种倾向奋斗，这种奋斗故是对的，这并不是什么小的问题，而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国焘问题在表面上是态度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纪律问题，不明白党员与党员的关系和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的关系，根本是反对纪律和集中制，至第四次大会始明了。

小组织问题，发生于第二次大会以后，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因为在党中有两个方法，一是以活动的分子去推动消极的，一是将不革命分子开除，这动机是对的，但方法是错的。此外，广东党部问题，起初他们是不自觉的，后来完全是自觉的作陈炯明的工具。中央解决这问题，广东党部同志不明了，因这问题完全是根本政策问题，故宁肯失掉广东党部，也必须严格向广东党部的叛逆行为争斗，而这时马林主张恢复陈公博的党籍，这是马林的错误。另外，在此时因上面种种原因，多数党员对党是消极的，但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的背景不同，所以反映到党中的政策不一致，发展到党中时，党中央就形成政策的不同，党的组织于是形成消极与积极，而影响到行动上，但到现在的党能成为一个行动的党，真正的党，这就是由于不断的争斗而形成及得来的。

#### (六)“二七”运动与党的第三次大会

##### 1, “二七”事变在党内的影响。在第二次大会与第三次大会

之间，是中国工人运动新兴时期，这时期各地工人都起来组织工会，并影响到知识分子之分化，仅左派来做工人运动，并促成一部分军阀的左倾，高唱优待劳工。总之，在“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在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在这时期所有运动十分之八、九是胜利的，虽然有小部分的失败，但不能影响到全国。但“二七”失败却不同了，马上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失望，特别是京汉路的工人，因此影响到党内思想发生变化，发生悲观，对劳动运动怀疑，这是坏的思想。但还有好的，就是“二七”失败后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且军阀利用民众开会反对京汉路罢工，因此工人阶级应联合各阶级引导群众做自由的解放运动。但坏的影响甚大，如京汉路工人罢工策略问题上（要上工）而善后方法是很困难的。当时有些分子主张马上联合一切反英的势力以打倒吴佩孚（到上海公开登报反吴），这时中央的政策：第一，保存各地工人阶级的势力；第二，在京汉路迅速进行秘密的组织；第三，在政治上极力进行反直系大运动。这些不是一时可以成功的，因此一部分同志（周无为，张子采，郭平伯，郭寄生，陈天甘）发生自由行动，不服从党的命令，自动到奉天国民党等处求援，因他们渐渐不信党而变为反动派了，自此党内的困难问题亦来了，因为受了此次精神上的打击。

2，党的第三次大会争论的内容和倾向。“二七”失败后三个月到一九二三年五月<sup>①</sup>开第三次全国大会。这次争论的问题，如加入国民党问题，此问题在西湖会议上已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守常亦在），在理论上还未确定，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争论的还是这个问题。在“二七”失败后，工人要领导各阶级作民族革

<sup>①</sup> 应为六月。

命的争斗,这点中委同意,但在理论上的解释就发生分歧,马林最初则反对加入,后来受越飞的影响就倾向国民党了(他自己急躁,对党悲观失望,以为党很小,还是俱乐部,仅仅数百人,有时还发生纠纷)。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的,后来第三国际训令来了,对于中国政治分析,以为中国目前是国民革命,领导责任是共产党担负,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但要保住自己的独立的组织,这个训令是对的,当时中央对此是无问题的,不过怎样实行这个训令却有不同意见。马林认为我们职工运动都能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而仲甫在大会报告,观点亦非常之右,说: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少,至于党的发展只有五百余人,工作只能作经济争斗,而不能做政治争斗,并且共产党目前不能在工人中公开宣传共产主义,而在小资产阶级中更甚,至于党更不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当时讨论的问题为:

(1) 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仲甫、秋白、太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国焘、和森、仁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2) 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为二派):

第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

第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3) 是否保持产业工人(亦分两派):

第一,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

第二，以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

由以上看来根本的意见不同，具体的方法亦不同，一派右倾，一派左倾，结果组织一委员会把前面问题修正，对于后一问题又开一大会，始通过不保留产业工人而加入国民党，我们现在的估量以前是右倾的结果。

① 把工人的势力看轻，在马克思主义尚未深入工人群众脑中以前时，工人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心理与色彩是不免的，但不应抹杀工人阶级的势力；

② 把资产阶级看作领导者，并未看清小资产阶级的势力；

③ 共产党没有不要紧，只要国民党工作好时自然可以产生共产党。以上三点如果发展起来有成为少数派的危险。但他们也有好的地方，即是能接近各界群众，而他们也是很积极的，仲甫曾说：不要怕共产党有消灭的危险，我们去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假使是有危险也是历史的危险。但在左的方面是很消极的，其缺点亦有三：

① 怕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之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

② 等孙中山左倾然后再加入，而忘却支配国民党的责任；

③ 不能加入，去促进国民党改组，而站在被动的地位。左派的背景，只看孙中山是对象，而未看清全国国民党的群众，只看见反动势力右派。这背景是没有看清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侵入与侵略后的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总的背景是“二七”失败后党右倾，而看重国民党。在国际的背景是否是帝国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因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均取守势，而认为这左派太过火，这就是三次大会的情形。

3，党的第三次大会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的讨论。前次曾说

过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在当时是极严重的。这时接到第三国际的训令，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指明这是目前重要的工作，但应保存自己独立的组织。在当时工人运动很发展，如南方海员罢工得胜利，可是京汉路罢工是失败了。这次失败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教训就是孤军奋斗。此时在政治上是曹吴及英帝国主义统治之时，故政治的压迫很严重，因此第三次大会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条件。但当时党中曾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二七”事件初失败，工人们心中都感恐，欲用京汉路总工会名义在上海办报，公开反吴。我们知道这种复仇的感情是原始的，在策略上绝不应如此，因为我们的进攻是有策略与有步骤的。另一方面这种倾向在客观上，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有一很正确的政策，即是对国民党之联合政策，因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地位的。此时加入国民党本来已根本不成问题，但如何这会上再发生争论呢？就是由于当时此问题的解释不同。在第三次大会所争论的主要点：第一，是否保留产业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二，国民党是否是中国集中的和唯一的政党。关于第一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去吸收我们的同志，此问题争论甚大，到大会中乃解决。至于第二个问题则在委员会中解决了。加入国民党问题已通过于大会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行这个议决案的问题。第三次大会后，北方曹锟上台，随着临城事件发生，而帝国主义者就借此威吓曹锟与直系军阀，当时舆论为之一变。而在南方则孙中山重新得着政权（这是当时的政治情形）。这时国民党的政策是借临城案来反曹、吴，孙中山曾拍出一通电，但这若以革命观点来看，对于革命是不利的，因为主观上虽是反曹、吴，但在客观上间接帮助了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曾派代表欲与国民党联合宣传反对临城事件。可是孙中山不同意，故结果只得单独发表宣

言。此时大资产阶级多是反对曹、吴的，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曾联合组织了一《民治报》。当时我们的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引起了外报的嘲笑，此时孙中山并未发出号召，以致这口号不能扩大，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一大缺点。此时在政治上虽有鼓动的机会，一般民众都反对，但因国民党只注意广东军事运动，故革命的浪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了。第三次大会后不久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乃召集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改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策一方面是宣传国民大会，另外又主张国民党组织的改组。但在这个时候，正是反曹、吴的时候，可是国民党没有利用此机会出来活动，故不久反曹的空气就消沉下去了。如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治委员会”，不久就瓦解下去。在第三次大会中，于工人运动之决议案多是保守，而实际上因“二七”失败，故不能不保守，但同时也有进攻的。

4，国民党之改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实行改组，因此我们第三次大会对国民党所定的政策有实行的可能了，这证明第三次大会之政策是正确的。虽在当时有左倾的主张，这是不可免的。在七月之前主观上我们的党决定了此政策，而今客观上都已成功。再看国民党改组的意义，第一，国民党以前的态度是犹疑的，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当第三次大会时，我们党中央移广东，公开发表宣言，国民党尚恐怖，简直不愿意我们的党公开发表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广东离香港太近。但改组后就确定了正确的反帝国主义之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自鸦片战争八十年来，也曾经过了许许多多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都没有正确的反帝国主义之政策。孙中山虽有三民主义，可是对帝国主义之态度尚有些暧昧，直到此时才有明确的政纲。一方面这是证明中国八十年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是证明是世界革命的产物，是苏联十月革



命和西方工人运动及第三国际的影响。这次大会确定了革命的目标，即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劳动平民的解放，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又在纲领上具体规定了工农之要求，确定了国民党之政治趋向，又规定了要与世界革命发生关系及联合苏俄，而以前国民党的口号，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国民党之改组又是证明了我们第三次大会之成功。但此时我们党中就发生了不好的趋向，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与组织就忽略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这是由于党尚幼稚的结果。

(七)党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在上海召集党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这时的情形：第一，因国民党改组后已有五个月的努力，我们努力工作亦有五个月的经验；第二，政治的环境在南方，国民党在广东并没有好的成绩，而在北方仍是曹锟执政，同时工人运动尚是保守的，故这次扩大会的责任，就是审查过去的工作，重新决定以后的政策，开会时国际代表已到中国，这次会议的主要问题如下：

- 1, 讨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
- 2, 讨论工人运动新的责任；
- 3, 讨论农民问题；
- 4, 讨论党与团的关系。

在第一个问题中包括了审查第三次大会的决议案。因为第三次大会中曾发生了争论，第三国际亦知道，同时第三国际在土耳其国民革命运动中得着了不少的经验，国际代表以土耳其的经验，故对第三次大会的决议稍有所修改。他主张工人运动保留其独立的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基础，同时工人加入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第二对国民党性质的估量，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故本身

上是不能集中的如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在实际上如国民党的组织太集中了，则工农加入不便。第三对于国民党工作确定了最正确的政策，就是我们唯一的工作是国民革命之宣传组织工作，是很需要的。因为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本身不能集中，同时在五个月的经验中，国民党的组织是过于集中而机械化了，同时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过去偏重于组织，甚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部分都到国民党中去工作，而党的会议停止，有许多问题拿到国民党中去解决，因为有些地方全是我们的同志，在事实上已发生了这个危险。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的产业工人数量上虽少，但在革命运动中是集中的，共产党要把他们集中与组织起来，然后才能领导与推动中国的革命，组织工人是我们唯一的责任。我们的基础应建筑于工人阶级之上，又因当时工人阶级的觉悟需有共产党的指导才会走正确的道路，因此把第三次大会的错误完全纠正了，在关于组织上指明应注意工人基本的组织。第三个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这次扩大会议中讨论农民问题尚有一议决案，但当时的理论很少，唯一决定了许多口号（如组织农民自卫军、反对苛捐杂役、反对预征钱粮、反对土豪劣绅及苛租等）。以后的农民运动都是在这些口号之下去做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党与团的关系问题，在这次会议中何以会发生问题呢？因为在实际上弄不清楚，发生了许多困难，在此次扩大会上，第一确定了青年团的责任，指明了青年团的工作，其次确定了入青年团的年龄，青年团员至少不能超过二十五岁，同时又因青年的分子有很多是成年工人，都在青年团中，故使青年团发生独立的倾向，另外使许多党员及负责同志视青年团为党的预备学校，当青年团在南京开第二次大会时就发生了独立的倾向，议决案写下了青年团的工作，是独立的，不受党的支配，如北京青年团的负责同志，完全不受党的指挥，

故这次党的大会，特加以指明。经过这次决议后，于是就有大批的团员到党中来了，以后团与党的工作及组织渐分化了。这次扩大会议的意义，第一，把第三次大会的错误纠正了，把未解决的问题确定了，同时又把不好的影响洗脱，对于国民党的工作有很正确的答复，即是应以宣传工作为主要，而组织工作次之，但是并不是不作组织工作。一九二四年五月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而一九二五年开第四次大会。在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前就有同志发生一种疑问，就是我们目前工作即是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然则共产党是否可以取消呢？这种错误是由于同志对主义的了解或是对党的理论同志们的观点尚未稳固的原因，这个错误若不纠正，不特对党危险，即对国民党的工作亦危险。但自第三次大会以后，因得了正确的了解，故把同志们的错误完全纠正了。其次，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即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独立起来。再其次，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把以专门做组织工作纠正而转到注意作宣传工作，因为我们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要到国民党中去做政治的鼓动及煽动。另外对于农民运动，当时只有广东作起来了，都有很好的成绩，组织了十几万的农民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其次在工人运动方面，虽然当时还是保守的，但注意了党的组织了，以前不过是工会的组织，在第三次大会以后，就使各地同志明白了工人运动的意义与必要。再者团与党的关系也在第三次大会确定了，这些都是第三次大会后所得的成绩。

(八)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开会。现在我们把关于当时一般政治情形分析一下：

1，南方、广东的政治情形。为什么我们要先说广东的政治情形呢？因为中山回广东后，中国成为两部分势力，一是北方的直系军阀掌握北京的政权，一是国民党恢复广东革命的根据地，所以在

中国革命的前途上有很大的意义。其次，国民党改组到这时共一年，在此一年中间革命高涨，革命的宣传有很大的进步，由南方到中部、北方，并且在实际上对外曾作了许多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和对内运动的争斗，如解散商团和反攻陈炯明的事实。同时，广东农民运动亦从此开始作宣传、组织的工作。这时广东的政治情形完全是新的革命局面，自国民党改组后，中山即收回海关，这就是广东政府与帝国主义宣战的动机，也就是国民党开始实行党的决议，向帝国主义进攻的第一步。因为帝国主义用武力威吓广东政府，此次广东政府虽然实现了收回海关的目的，但这种收回海关自主的意义和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广东政府反帝国主义的态度日益明显了，因此帝国主义对广东政府的恐惧亦日益增加。在八月又发生沙面大罢工，原因是帝国主义公布条例，限制华人出入，特别是对于华工，引起国民政府的帮助，这是国民政府间接反帝国主义第二件事实。故此沙面罢工很激烈，并且时间很久。于是帝国主义看出广东政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日益激烈，因此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分子，图谋推翻广东政府，于是发生了商团事件。商团是广东与香港买办阶级的武装组织，领袖是陈廉伯，商团的组织起初是自动的性质，但到国民党改组后，买办阶级得到香港政府的帮助，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沙面事件发生，帝国主义的计划使商团在内部发动，陈炯明在外部进攻以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阴谋组织一个买办阶级和军阀的混合政府。商团事件初发生时，广州政府有畏惧的形势，恐引起商民的反对，所以对商团的态度很犹豫，以后中山始下决心用武力解散。此事推动全国。这件事的意义是国民党直接与商团决裂，间接与香港帝国主义决裂，在这短时期中间由内部冲突变为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这证明国民党实行党的决议向革命的路线走。所以广东政府成立以来革命的意义特别大，虽

然商团的买办阶级说广东政府是赤化、是压迫商人的，但实际上广东政府却获得全国民众的同情，尤其是广东的工农群众。广东的工农群众在这次事变中极力拥护中山的主张，竭力帮助国民政府压迫商团，所以这时在北方虽然是直系统治的反动的时代的局面，但北方与南方正相反，南方是革命潮流高涨的时期。

2, 北方的政治情形。在北方直系掌握政权将一年，一方面是直系想巩固政权，极力扩大军备和一切反直系军阀作战，以图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因此，直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在另一方面，反直系的联合战线及奉张和残余的皖系等势力也极力准备作战，在直系统治下，除投降帝国主义，承认赔款以解决临城案外，尚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在直系政府统治下的恢复中俄邦交，此事在直系本身来看，不但不赞成而且是反对的，更说不上正式中俄邦交的关系。但事实上却相反，公然在直系政治统治之下，恢复了中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其理由就是全国革命潮流的高涨，由南方发生直到中部和北部，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竭力主张中俄邦交，并在全国工农学生群众中极力宣传，并且全国工农学生对于恢复中俄邦交事均有积极的表示，促醒北方政府的注意，尤其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全国民众促成中俄恢复邦交的扩大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使政府有新的对付方法，但在另一面，直系反动政府做了许多卖国的事情，受到人民的攻击。因此，卖国政府亦想借此做投机事业取得人民的好感，并可以恢复卖国的信用。这样一来，在事实上可以得着许多的权利，因为苏俄可以抛弃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所以曹、吴决定实现。实际上中俄恢复邦交完全是中国革命潮流促成的。这对于中国革命有什么影响呢？这对于革命意义当然很大，第一使中国人民认识了苏俄是真正的好友；第二更能促成全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

决心，更推动人民作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的发展。因此，我们看见在直系统治最后时期中，全国人民渐渐革命化了，虽然当时直系正在准备与一切非直系派的军阀作战，但因广东政府宣传的影响及全国民众的潮流的压迫，使直系不得不改变政策。

3. 工人运动的情形。第三次大会对工人运动的决议，“二七”以前中国工人初期的运动，因欧战及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削弱，因此中国工人运动取得初期高潮时期，以后帝国主义及军阀渐渐巩固，于是用残暴手段压迫工人运动，所有工会的组织完全被封，因此使工人运动低落下去；同时因为世界工业恐慌影响中国，尤其是纺织业的恐慌，因印度与英国纱的压迫，在当时工人运动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处于恶劣的情形，所以就取退守的政策。这是“二七”以后工人运动的第一期的情形，最初是取退守的政策，但北方的铁路工会运动，还是积极的进行秘密的组织，所以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在北京有第一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的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只采取铁路代表分子的联合。但群众没有参加，这一方面证明工人运动是保守的性质，北方处于秘密状况；另一方面的证明，虽然于反动势力之下，工人运动不能公开，但还是进行秘密的组织，在这时很少看见工人运动是公开的，只在山东胶济铁路发生罢工运动，成立工会不久被军阀封闭。自北方第一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后，各路代表积极活动，于是又引起军阀的注意，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北京铁路总工会被封，张杨被捕。在汉口不仅工会机关破坏，即党的机关亦被封，水口山矿工俱乐部亦被封，在上海有海员、纺纱、南洋烟草公司工人发生罢工，但不久均遭失败，多数工人因此失望。在南方因国民党的组织和广东政府的存在，所以情形不同，南方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是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态度。第一，

五月间在广东开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和海员工人都参加了这国际组织会议。第二，沙面罢工，这次罢工是在海员罢工之后，南方的工人向帝国主义进攻，给帝国主义第二个打击的事实，这正是北方工人受反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工会被封，首领被监禁的时候，而在南方的情形却不相同，所有这些事实都给全国工人极大的影响。这时期就全国工人运动整个的情形来说，在北方虽然在反动之下受压迫，但仍然进行秘密的组织，在南方工人则对帝国主义取进攻的态度，所以此时期整个的工人运动是由守势转到进攻的形式了。

4，农民运动问题。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很大的发展，国民党改组后，实行决议组织农民协会，并且武装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劣绅、土豪，使农民组织保护农民利益。国民党左、右派是什么？右派勾结军阀、劣绅、土豪压迫农民，左派是真正保护农民利益的，打倒军阀、土豪劣绅。

5，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在这时期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已有一年光景。在这一年中间，我们在政治上做了许多鼓吹的工作，在群众中亦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如在北方作了国民党改组的意义和国民党改组后新政纲对于革命的意义宣传，使北方知识分子及一般民众改变从前对国民党厌恶的观念，并且接近国民党和倾向国民党的态度，使国民党的组织由南方推广到北方，全国都有新的革命组织，使全国民众的意识都集中到国民党的组织之下。同时又作了恢复中俄邦交、反对直系政府的大宣传。在南方积极组织工农群众帮助广东政府打倒商团，作直接间接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也是与前不同的地方。我们以前只能作宣传的工作，如组织示威运动和文字的宣传，及到国民党改组后，不仅是作宣传煽动的工作，而且推广国民党的组织，督促广东政府对内推翻帝国主义

的工具买办阶级所组织的商团，对外向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进攻，这时期由宣传工作而转到组织工作，甚至于武装工农，走上实际斗争的道路。

6，党的第四次大会的意义和内容。由上面看来，这时中国的政治情形已渐渐革命化，一方面恢复了中俄邦交，一方面使反直系战争爆发，在南方又发生商团事件，这些事实都是革命的表现。自江浙战争发生后，于是引起直系的反奉战争，而在这时发生北京政变，冯玉祥由直系分裂出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吴佩孚的势力消灭，因此全国民众运动又渐兴起来。这时，全国民众的口号是“召集国民会议”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一来，召集国民会议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畅快地向前发展。所以，在四次大会整个的政治上完全革命化了，因此这次大会的责任显然的都是领导革命向前发展。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责任，这首先要将民族革命的理想弄得真确，即是说要估量民族革命中的各阶级势力和社会各阶级对民族革命的趋势如何，然后才能定出我们在民族革命中的策略，有了革命的正确策略才能完成革命责任。而我们对于民族革命的议决案是怎样？对于民族革命的问题，在第三次大会及扩大会议时对于本问题的议决案都很简单，没有把本问题从各方面加以详细的分析。第三次大会决议只规定召集革命的力量及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去工作，扩大会议只规定产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基本工作，不应与国民党的工作混合，就是说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从民族革命的理论方面加以详细的分析，并正确地订出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过程中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和关系，在第三次大会及第一次扩大会议时，因为客观、主观的条件都不可能订出一个正确的民族革命的策略，即是说没有革命的经验，由扩大会议到第四次大会时，党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得到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所



以这时在民族革命的理论上有正确的根据了。在另一方面说，证明我们的党已有很大的进步了，那么我们对民族革命的议决案之内容，详细情形参看第四次大会本问题的议决案，本问题的议决案如下：

①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说明东方的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说明东方的民族革命与西方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有一共同的目的，都是推倒帝国主义，所以民族革命的成功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即受其影响，因此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参加本地的民族革命。

② 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责任及革命中的特性。民族革命是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所以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各阶级有各阶级的利益，因此就有不同的目的。如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是为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所以带有世界性的特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由民族革命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而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

③ 分析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趋向：第一，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地位及趋向，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商团事件中，已经证实了他们不要革命，而且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的广东政府，甘愿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脉送给帝国主义手中；第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方由官僚资本转到工业资本，他们的主观力量非常薄弱，所以不能积极参加民族革命；第三，农民是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压迫很厉害的，该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如湖南、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就是工人阶级的

同盟军,在事实上表现得很明显。由上面证明,愈是上层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妥协心也愈大,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其次这次议决案又说明工人与学生的联合必反对帝国主义,并说明广东政府的革命意义,由商团、沙面罢工两件事又可以证明广东政府革命化了,同时议决案又说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愈向前发展,而军阀的势力必日趋崩坏,而民族革命的势力必益扩大。

④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政策分左右倾的经过。首先说明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大会,已决定我党应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并应帮助国民党,当时所提出的口号:第一,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第三次大会说明共产党有全体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到劳动群众中去(在一九二三年时)。在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时,只议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中工作,到第三次大会的加入国民党问题,当时是没有人反对,只有一部分同志主张工人运动应在国民党以外去工作,若将工人运动的组织经过国民党,不免有混淆工人阶级的思想。所以第三次大会后我们的同志发生许多幼稚病,右倾的同志忽略了第三次大会的议决(以民族革命运动为中心并应注意发展我们的组织,拥护劳动者的利益及阻止国民党的在革命中妥协的倾向),左倾的同志适得其反,以为共产党有单独的组织 and 政纲,无须同国民党合作。再看右派的错误有几点:第一,既以民族革命做中心即应集中全力到国民党中去工作,不必需要共产党;第二,既加入多阶级性的民族革命性的政党,就应当不主张阶级斗争;第三,既帮助整个的国民党就不应该在国民党内部攻击右派。

⑤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这时我党加入国民党工作已一年了,因此得到许多经验,所以到第四次大会时,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先必须要订出新的策略,就是说这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更密切起来,在组织和思想上均应使其革命化。四次大会的政策:

第一,国民党包含社会各阶级的成份,因此不免有发生阶级妥协的危险,要极力反对阶级的妥协;

第二,国民党虽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工具,但不是民族革命的全部。在宣传上应处处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保护工农的利益,攻击右派阻止中派右倾,如中派右倾亦应反对;

第三,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左派,扩大左派,攻打右派,使群众与右派脱离关系,尤其要反对阶级妥协,并且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

第四,在国民党势力所在的地方,应将本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大的扩充起来,并要使其公开,假如国民党有妨害工农利益的时候,则极力反对之;

第五,我们固然要国民党保护工农利益,同时要使工人自己明白阶级的独立性,并使其明白只有工人自己有强力、有组织才能推广民族革命,就是工人农民有组织地去帮助国民党的力量要大;

第六,使在我们的指导之下的左派国民党思想巩固起来。

以上这些决议是从经验中求出来的,这些政治决议有什么意义呢?在以前是找不着的,这种理论的根据是议决案,这些议决案与国际对中国的政策差不多,这是因为革命发展之结果。这次对于工农运动都有很好的议决案,特别是较前更好,因为在广东已有很好的农民运动的经验,其次为党的组织议决案与民族革命的议决案,这都是第四次大会的特色。

⑥ 第四次大会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就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即是说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也就是革命的起点,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也就是党开始行动的时

期,以前党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在党的本身来说尚有小小困难和党内部时常发生问题,在政治上因理论的缺乏和训练的幼稚,所以党还是发生错误的倾向。在第四次大会,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正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这时党的本身力量如何呢?虽然这时只有一千党员,但是党的政策走到行动的时期了,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⑦ 第四次大会后的政治工作。这时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潮流非常之高,在北京吴佩孚失败、冯玉祥开始握得北京政权,不久又落在张、段之手。但此时召集国民会议的空气很高,给张、段以无形的阻碍,这时要打破反动势力只有促成国民会议,这不仅给帝国主义以打击,而且给军阀一个打击,所以这时召集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组织国民政府为最激动群众的口号,怎样组织广大群众呢?所以党决定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结果做到了。此证明党的政策很对,在此情形之下,不得不引起帝国主义及张、段的恐慌,张、段想取得北京的政权亦非常困难,因为他虽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用欺骗民众的口号,召集善后会议以缓和革命。当时即知国民会议是不能成功的,不过借此组织鼓吹群众,在北方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到会代表有一七〇人。返省后,在各省作了很大的宣传工作,使群众了解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的意义。这时北京政权虽然落在段氏手中,但另一方面国民军取得河南,所以张作霖在军事上还是不能统一北方,民众反对张作霖,在政治上亦不能统一,而此时国民会议空气很高,直到中山死后,才渐次消沉下去。但此时张作霖还是苦心经营巩固自己的势力,同日本勾结,另一方面张、段又用骗人的口号,召集善后会议以和缓革命,中山死

后又借追悼大会宣传，使革命运动又向前去一大步。因为党的政策用得很好，所以革命的发展已有很大的成功。以后革命潮流渐渐低落下去，而在中山未死以前，我党看出这时革命运动很严重，若中山死必要消沉，因此计划到追悼会中做大宣传，所以在未死以前开会决议要中山先写一政治的遗嘱，以作死后鼓动群众，故追悼大会特别有意义。中山死后，在北方发了许多宣传单，给人民以深刻的影响。这时期广东的形势在中山死后帝国主义及陈炯明反攻广东，北方政府亦助陈以饷械，结果广东战胜。所以，中山死后国民革命虽受打击，但革命的基础未有动摇。因一方面工农群众的帮助，广东政府加入反帝国主义及军阀，另一方面我党的政策用得好，使革命潮流高起来，帝国主义不敢马上压迫革命运动。

⑧ 这时工人运动的情况。在北方吴佩孚打倒了，铁路工会复活。二月初，日本纱厂的大罢工，为“二七”以后第一次，是吴氏下台、中山死后革命发展的影响，但因此时经济情形困难，所以只得相当的结果，这完全是党的政策用得好，这时的困难情形在客观上的经济条件上说，工人阶级本身力量很弱的，但因上海胜利，这胜利就是罢工的胜利，结果影响到青岛工人，又发生同样困难情形的罢工，这因政策好，有相当的结果。这时期劳动运动整个的是处于特别情形，政治经济都极恶劣，虽然由保守的形势走到进攻的时期，所以这时罢工全靠策略，所以当上海罢工时，决定将经济的罢工引到民族的政治斗争上来，当时的口号是“不准东洋人打人”，因此引起青岛、天津、汉口等地的罢工援助，遂使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空气增高，大胆与帝国主义争斗，以致引起“五卅”运动。

⑨ “五卅”运动的情形。这时一般的状况，在政治方面，北方张作霖向国民革命进攻，由东三省到天津向河南进攻，要求国民军将河南、直隶让与张作霖，这时国民军的势力很弱，地位极低，不得

不让与张作霖。在广东陈贼虽败了，同时发生杨、刘的问题，他们一方面与陈勾结，一方面与段勾结，阴谋打倒广东政府，所以这时到了全国很危险的时候。当时的政治状况如此，一方面资本家向工人进攻，在二月内上海、青岛的资本家，以挑拨工人罢工的手段来解散工会，故党的政策决定只维持工人已得的胜利，再不进攻。于是资本家却猛烈的进攻，上海枪杀顾正红后又引起罢工，于是资本家的态度更硬，上海工部局及山东张宗昌均助资本家用武力镇压工人。在顾死后中央委员会讨论，党是引起工人和警察与厂主冲突呢？还是自动的使工人消散？如果是让步使工人势力溃散，工人必无形消散；或与厂主警察冲突，即中部、北部的工人运动必然陷于困难地位，所以这时党很忧然，结果决定采用行动的政策，即民族运动的政策，扩大宣传取得社会各阶级的援助与资本家争斗，如宣传不能引起他们的援助，则发散民族运动工人自身的宣言，自动的上工，打破资本家用关门的政策压迫工人。党用何种政策发动群众呢？当时上海工部局向上海资本家进攻，提出四条，如码头捐、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华人越界筑路纳税。所以党决定用此四口号，召集示威运动，结果打死学生，于是策略成功。当时党对于资产阶级的策略计划正确，知道上海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冲突可以鼓动起来。再由整个的情形看，这时北方反动势力很大，广东又有杨、刘的危险，所以党决定在上海鼓动民族革命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上海既有鼓动机会，于是提出“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鼓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工部局的四大提案，引起资产阶级的同情而商人罢市。所以“五卅”运动帝国主义说是共产党利用了各阶级的大成功。而此证明共产党的作用。党的政策是运用得很好的，假如没有共产党的政策决不会有“五卅”运动的发生。党在“五卅”运动中的政策：第一怎样推动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商人罢市。

这时资产阶级说，罢市没有罢工力量大，应先举行总罢工，然后罢市，我们说只要罢市，罢工是不成问题的，这时我们的政策是先鼓动学生激起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商人是非常仇恨帝国主义的，这样一来，于是大资产阶级受学生和小商人的压迫，不得不承认罢市，因为政策运用的周到，就促成了总罢市、总罢工。第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时资产阶级的分子同帝国主义有冲突，但他们怕帝国主义，在另一方面又怕工人，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怎样使他们参加革命，所以我们说中国工厂工人罢工是一种表同情的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此资产阶级起初怕工人，到后来反过来利用工人去反对帝国主义。为什么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呢？因为上海各阶级势力在总商会之下，即是海员工会都在他们势力之下，因此要利用它，一方面揭破他们的假面具，一方面又拉他们参加革命。资产阶级在未参加革命之先是想中立来调和革命，及参加革命也是想利用工人来作这次运动的领袖，结果没有拉着领导地位，及小资产阶级的商会不相信他们，不相信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后来到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要求九条时，大资产阶级反对，所以他们单独提出十三条。这时大资产阶级态度更坏，因此对小资产阶级完全失掉信用。其次我们怎样将“五卅”运动扩大至全国呢？这时要维持革命运动，仅上海一处的总罢工是不能维持很久及胜利的，所以党决定香港、广东总罢工以援助上海的罢工，这时有同志主张香港广东即使举行罢工，也得等打倒杨、刘后再罢工，又主张如香港罢工，于是汉口、天津、青岛亦起来罢工援助上海工人，所以“五卅”运动才能支持许久，即是现在还保持着。后来汉口、天津、青岛等处的罢工，因反动势力的压迫，不久就消沉下去了，到八月间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了困难问题，尤其是经济的问题特别困难，发生危机。因为经济的来源虽有苏联华侨的帮助，同时工人团结的

精神散漫，坚固的组织发生动摇，这时帝国主义极力利用军阀来压迫工人，如张学良到上海开始封闭工商学联合会及职工会。这时中央讨论上海罢工的问题，国际代表亦到会讨论，这时问题究竟怎样？当时多数意见主张运动扩大到北方，有少数同志主张武装暴动，另有一部分意见主张收缩，结果决定继续运动。后来国际训令要保持势力，应由政治争斗转到经济争斗和部分的经济要求，将政治的责任推到北方和南方政府身上，如不这样，会使国民党消沉下去。这种政策对于工人有些什么影响呢？他使工人组织坚固起来，使阶级的认识扩大起来，使群众的争斗更坚决了，这种政策对资产阶级是害怕的，因此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来压迫工人阶级，封闭总工会，由此可以了解党在“五卅”运动中的地位了；

(九) 党的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任务和经过情形：这次会议是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开的。我们要知道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情形，就要先知道这时的一般情形，这时“五卅”运动已经发展，并支持了四个月。不但没有消灭势力，并且运动扩大了。一方面促进帝国主义的让步，允许关税会议；另一方面张作霖的势力大大的发展起来到长江，但不积极的向国民军进攻，因此国民革命军的势力也大发展起来，坚固起来。当“五卅”运动以前，国民军在北方的地位很危险，“五卅”运动发生以后国民军的危险消除，奉张由进攻国民军的政策而取保守的态度，所以是时在北方受大打击，使反奉运动扩大起来，而在南方政府的南部有很大的成功，为革命政府从来所未有的现象，因此使帝国主义大大恐怖起来，于是勾结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谋刺廖先生，这样一来促成国民党的左派。因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争斗过程中，使阶级觉悟更加明显起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阶级势力的伟大和阶级认识的明显非常害怕，因此又形成了国民党右派，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分离，主张阶级调和，由



此可以知道扩大会议的任务了，这次扩大会议的责任是：

1，审查目前运动的趋势及用什么政策支持“五卅”运动。

2，决定对国民党的政策。这时戴季陶在国民党中的主张的最高原则，国民党与共产党分离，我们的政策在组织上、思想上取进攻的政策，所以这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问题。

3，怎样扩大我们的党为群众的党，因为这次的五卅运动有世界的意义。所以这次会的决议是：

① 中国目前的政策与共产党的责任，估量五卅运动的革命意义。先说这次运动的特点：第一，共产党成为真正群众革命的党，并且认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第二，这次运动促成军阀内部起了分化，使一部分军阀走向革命的道路，如冯玉祥接近民众，另一方面使反动军阀更加反动；第三，因广东、香港罢工的影响，广东政府的左派势力巩固起来，并说广东政府的巩固是五卅运动的结果。

② 工人阶级与民族运动，各阶级参加民族革命，在民族革命中工人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说明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起初利用工人阶级，后来与资产阶级冲突时，则其即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压迫工人阶级。

③ 指明数百万的小资产阶级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应格外集中自己的力量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

④ 指明农民与革命关系，中国南部和中部农民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应促成农民政纲。

4，指明军阀与农民政策的关系。此时革命运动又到了困难时期，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战争，又要马上爆发，同时又说明国民军在革命中的意义，说他有新的作用应与全国民众联合起来，民众要

来帮助国民军特别是要打倒张作霖。

5, 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我们应当好好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 而订出好的策略来发展革命。

6, “五卅”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五卅”运动发生, 第三国际领导各国的无产阶级捐款援助上海工人, 在政治上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政府用武力压迫中国工人阶级, 这一方面证明殖民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革命, 已与西方无产阶级有亲密联合, 反过来说, 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 必须要有西方无产阶级起来帮助才能成功, 另一方面证明“五卅”运动给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的稳定有绝大的影响。

7, 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① 当革命潮流高涨时, 要给群众革命的纲领, 并要指出正确的道路来, 提出组织国民政府及夺取政权;

② 根据政治口号去发展工会和巩固工会的组织, 同时应扩大党的组织, 吸收工人中先进分子入党;

③ 在工人运动中应防止以下两种倾向: 第一只顾政治环境, 而忽视本阶级目前的经济要求, 第二是只顾目前的经济要求而忽略了政治环境的争斗;

④ 在以后运动中, 因运动高涨的时候, 就受军阀的压迫, 所以失掉许多先进分子, 因此各处不仅注意工会的组织, 并应在工会中准备武装暴动的技术和成立军事委员会;

⑤ 继续以前对国民党的态度, 巩固左派反对右派, 尤其是要反对戴季陶主义;

⑥ 应在每次运动中扩大党与团的组织, 使其群众化;

⑦ 小资产阶级的学生, 在“五卅”运动中占主要的地位, 应吸收学生先进分子入党;

⑧ 对国民党的议决，应继续以前的合作政策与群众接近，赞成左派反对右派，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整个的，现在仅是与左派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决议呢？因为革命潮流中，资产阶级分化的很明显，同时看见无产阶级的作用，他们都害怕起来，故他们要将国民党握在他们手中，故我们的政策要巩固左派、反对右派。

⑨ 组织问题的议决，主要的意义则是必须把我们党变成群众的党，虽然目前党员增加到三千多人，但还不够，而应更扩大数倍。

⑩ 对工人运动的议决，使全国工人运动革命化。

⑪ 对宣传工作的决议案，应完全站在革命的观点上作公开的宣传，实际上要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引导群众到党中来。由这次扩大会议证明了共产党已站在革命的指导地位了，且强固了党的组织，且开始变成群众的党了。当四次大会时只能说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但现在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组织很坚固了，党的势力较前增加了三倍。

⑫ 反奉战争中我们的实际工作。扩大会议后反奉战争即要爆发，而这次运动后（“五卅”）又起了反军阀战争的性质，与前不大相同，以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向国民革命进攻的策略，工人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决不能取观望态度，主要责任就是实行扩大会议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扩大，使广大群众参加反奉战争，实行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在反奉战争以前，党在各地即有反奉战争的宣传，并且这种运动的组织均与我党有密切关系，因此北方为革命的中心，如在天津举行全国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反奉战争虽然失败，但有很大的成功，在中部和北部给数百万的群众很大的影响，虽然国民军退守南口，但革命势力不会因之消灭。

（十）广东政府的成功。第一，完全消灭广东政府内部反革命

势力；第二，巩固国民党左派及左派的革命政府；第三，广东的势力发展到西南各省，且形成西南革命的中心，能影响全国民众及北方政治，这种伟大的成功完全是“五卅”运动的结果。广东政府的成功对现时革命的意义怎样？第一，广东政府势力巩固，给帝国主义以很大的打击，如香港罢工维持到现在；第二，广东政府在中国的影响，就如苏联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一样，所以广东政府势力发展和巩固都是给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国民军虽失败，但中国的革命潮流仍很高涨，这是广东政府成功之影响，所以广东政府发展对中国革命前途有很大关系。

(十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成功，就是工人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战线的表现，因为这次大会更加确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说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的关系。

(十二)总结论：第一，说明了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第二，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第三，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其次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大会及怎样由政党形成阶级群众的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而又由第三次大会到“五卅”运动以致于国民军失败。

1，自党成立到现在的成功：第一，党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党引导无产阶级由经济的罢工直到政治的争斗，并且在“五卅”运动中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拿西方革命运动的“经验”和工人运动发展史来看，至少经过二百余年的争斗才走到政治争斗，如英国工人运动，现在才由经济争斗走向政治的革命争斗；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年，党就能引导中国工人阶级走到革命的政治争斗，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六年的工作已经超过西欧几百

年革命经验了。第二,对于民族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领导工人阶级,而且领导一般群众作民族解放斗争,“五卅”以前历史上的广大群众运动:第一为义和团,第二为“五四”运动,但这两次运动都没有成为广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仅是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五卅”运动是全国各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广大革命运动,在这次斗争过程中给群众以充分的政治教训,得着许多斗争的经验,不特扩大了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且组织了各社会阶级,在六年前,我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一般群众说我们是海外奇谈,到现在不独不说我们是海外奇谈,并且跟着我们来反对帝国主义了。第三,对于农民的影响,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农民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几年中对农民问题虽然困难,不能普遍将农民组织起来,但在广东、河南、湖南等省已有八十余万农民的组织,不仅领导农民参加民族革命,而且领导农民作了阶级斗争,反对地主、劣绅、土豪等。第四,对于军事运动的影响,现在中国军事势力很重要,过去一切政治的变迁都有关系,军事可以使革命向前,亦可以使革命退后,所以我们的党对于军事运动也有注意,且有好的结果,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虽是一方面是由于客观革命的发展而促成,但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努力及政策用得对的结果。第五,对于中国一般的政治影响,党初成立时一般大学教授及一切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党的机关报没有注意。数年后共产党在政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引导全国民众作了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因此反共产主义的口号扩大,从此可以看出我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工作成绩了。这还不能把我们党的责任完成,当然还要向前发展,虽然领导群众参加政治斗争,但大多数的

农民群众和其他群众未参加革命，但帝国主义的势力仍在增大，我们应扩大工作范围，继续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是党的中心政策，是党的主要政治路线，这直到无产阶级革命时还是如此，我们现在不过开始作这个政治路线工作。固然我们的组织已很扩大，有许多觉悟和正在革命化的分子，团结在我们战线上来，初时亦与国民党发生联合战线关系，但到“五卅”运动以后，党的势力又扩大到各阶级的民众中甚至于军队中，一部分军队参加这次革命的联合战线，总之在无产阶级未成功以前，我们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联合战线，唯一的责任就是扩大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过去联合战线的成功就是“五卅”运动，工农的关系，广东政府巩固及国民军渐渐革命化，因此我们就应继续帮助广东政府与国民军扩大联合战线。

## 2, 我们今后的责任:

扩大与巩固工人阶级的组织，同时应在思想上坚固工人阶级的阶级争斗的意识，因为工人阶级的势力是唯一的革命势力的发展，只有左派势力坚固，才能扩大联合战线，才能坚固工农关系。在政治上目前应帮助国民军，在南方应帮助广东国民政府，其方法就是组织一切民众势力及扩大联合战线：第一，目前在政治上与军阀联盟；第二，各种“社会势力”的联合战线；再其次是应组织农民，对于农民联合战线，才开始去作，应发展农民的组织，这是很困难的工作。从上面可以知道党虽然幼稚，在困难中发展和党的争斗中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多数主义的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多数主义化的党了。

## 自莫斯科给守常<sup>①</sup>同志信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马二先生<sup>②</sup>此时谅已抵包，不知兄已晤见否？伊在此进步甚大，颇可乐观。与伊同行的有俄顾问桑古斯基及刘伯坚同志，刘系马二自己请求其回去者。于髯<sup>③</sup>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颇佳，于先马二起程一星期，想已先见之矣。于与马二接头之主题为国党与国军之关系。此间要人意见：（一）此时国军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季龙计划者）固不需要，即国军与国党之联委（于提者）亦不需要，二者关系之形式即为国民党一二受命之中央委员与冯个人之接头。（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以上三个原则，系根据广东经验，望兄特别注意。初步工作，须处处应用此原则，至将来第二步工作之形式怎样，应看将来具体情形而定。冯要此间（孙、东两大<sup>④</sup>）为之准备工作人员四、五十名，此间要人及弟意见以为此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前去。弟意国军工作人才应注重下列来源：（一）在国军本身中养成大批工作人才。（二）择一部

---

① 即李大钊同志，守常是李大钊同志的号。

② 马二先生即冯玉祥先生。

③ 即于右任。

④ 指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

分在粵工作过的最好分子。这样才不至踏粵覆辙。伯坚颇为冯信任；但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弟颇担心，望兄特别注意。桑顾问为人颇小心而客观，望兄与伊(桑)保持一种密切的接头，伯坚常在桑指导下当可不至损事也。

(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署名：蔡和森)



## 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sup>①</sup>及国际决议<sup>②</sup>。

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直到现在此错误我们实不能宽恕，现在已经很显然的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不能仍然说国际还有错误，应由政治局负担，不然便是文饰自己的错误。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

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重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1)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中央不实行而且相反；(2)五次大会以前的失败完全由于退守，南京如此，广东亦如此，五次大会即指明此点，但大会后仍照此方针，第一个决议即是要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所以完全受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反对一切“过火”的运动。当时，政治局以为小资产阶级动摇，我们孤立了，实则农民已跟我们来了，我们何尝孤立，小资产阶级是全体的动摇吗？还是几个上层的领袖呢？政治局没有看清楚，所以当时政局的呼声便是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3)素来党的指导即未建筑在群众方面，以致中央完全成了普遍的政治团体，非阶级的指导，直到以后，政治局的指导简直与国民党一样，并且还以

---

① 指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Lominadge, Vissarion)的报告。

② 即《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一九二七年七月)。

小资产阶级几个上层领袖的意识为转移，这当然不是国际的错误，我们应承认过去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过去的错误。

自国际训令来，党的上层有一个恐慌，以为这样旧的指导必完全去掉，必有组织上的恐慌，这并不是群众的忧虑而是上层的忧虑，我以为这是不足恐慌的，因为要改变旧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要有政治的路线，组织上则不成问题。我们应将此点向群众解释。最后，我说的是过去党的错误未传达到群众中去，这次的错误要传达到群众中去，使群众都认识此错误，然后党才能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权。

(摘自《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 党的机会主义史

(一九二七年九月)

## (一)党的产生时期

有人说：“中国 C.P. 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理由是：(1)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产生的；(2)开始以来便做出许多错误。

这种理论完全是不对的。

中国 C.P. 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他不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产生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产生的。他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俄国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在国内是欧战期中，中国已相当的工业化，从香港、广州、上海以至北方纷纷开始初期的自动的罢工斗争与组织，开始移向于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 C.P. 便是从这个客观情形之下产生的。所以他不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产物，乃是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他的产生中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背景是很明显的。现在机会主义派欲文饰其自己的罪恶，故不惜污蔑党的产生的历史。

党的初期不是没有错误的；但却是一些偶然的零碎的错误，而不是严重的系统的机会主义，现在列举这一时期的所谓有名的错误如下：

(1)所谓只注重经济争斗忽略政治争斗。这便是说：“最初的党只知做劳动运动而不知做政治运动。”后来一些懂得政治的同志所攻击过去一切做劳动运动的活动分子都是“工团主义”，其实这类错误纵有也是很稀少很偶然的；在党的初期劳动运动中始终未形成一种所谓工团主义。党的初期注重工人经济争斗，借此发展阶级觉悟与组织，这完全是对的。另一方面，不要忘记二七是中国工人第一次严重的政治争斗。

(2)与吴佩孚的关系。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是当时国际代表主持的。彼时纵然一、二同志对吴多少有些幻想，然始终未上大当，几个同志利用交通部的职务，迅速地发展了几条铁路的工作，铲除了交通系工贼在各铁路的势力；同时在文字和口头的宣传上，亦从未散播幻想于群众之中。“二七”之后，工人代表及群众自动的决斗起来，便是对吴没有幻想的表征。这些情形与所谓“与冯合作”“与蒋合作”“与汪合作”对照一下，便知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当时利用吴佩孚的政策并未做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3)所谓第三次大会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当时张国焘蔡和森两同志反对马林及独秀同志：“一切都到国民党内去做……”，对中国C.P.与无产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倾向的一种反响。国焘、和森并不是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第三次大会前，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只有陈公博、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几人及一部分广东与湖北的同志……

（编者注：以下原件残缺）

（载《顺直通讯》第2期 署名：蔡和森）

## 一 机会主义下的中央政治局

五次大会开幕约两星期，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同时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消息亦非正式的传来。和森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变，则直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与广东；同时发动一切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当时鲁易与秋白同志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关系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急务便在建立此中心。

当时实际情形是这样：夏斗寅叛变一起，进攻武昌，距武昌只四十里（抵纸坊），所谓左派首领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民众间亦大起恐怖，纷纷逃亡，即工人纠察队亦有逃亡者。同时谭延闿、唐生智互相放出相反的宣传：唐谓此次两湖事变是由谭延闿勾结他的部下何健起来的，谭谓此次事变是唐主使的，是唐生智的苦肉计，可见C.P.一面在湖南胡闹，一面又相信唐生智之不智……。当时和森根据各方面所得材料（此时和森暂代秘书长），证明以上两种宣传都是故意蒙混耳目的，谭之参加此次阴谋固不待说，夏、许、何是唐的部下，两湖是唐的地盘，哪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可是鲁易当此紧张之时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他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这是与老鲍全然相同的。

和森、立三的提议采用了一半，便是叶挺及中央军校的武力都开去迎击夏斗寅，工人纠察队要求国民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二千支枪，并几千元月费，汪精卫等在口头上答应了。中心问题既然还

是“左派”问题，于是对于夏斗寅的叛变只当作是一件临时的事变去应付。中央政治局的全副精神力量自然只集中于所谓左派关系问题。这便是我们在两湖失败的致命伤。两湖始终是由于放任夏斗寅、许克祥的暴动在肘腋之下长期发展失败的！假使中央政治局一开始便集中全力于剿灭反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巩固两湖根据地，我们决不致遭受后来那样不荣誉不争斗之可耻可羞的大失败。假使当时认为中心问题，是以全力扑灭夏、许及唐、谭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结果也许可使所谓“左派”自动摇而稳定，由离心而向心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改良与左派的关系。因为所谓左派完全是随势转移的；夏斗寅、许克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发展，他们一定要趋向于反革命；我们工农能以自己力量剿灭一切反革命，他们也许中断反革命的倾向。

当然以上所说，都属事后追论。当时和森、立三并未真知著见到如上所说之深切。不过假使当时鲁易能因和森、立三那种本能的偶然的提议，把中央政治局的火线集中于发动自己的势力去扑灭一切反革命和阴谋，两湖是决不会失败的那样迅速和可耻。

在夏斗寅叛变时的紧急会议上，除了决定一些叶挺出军及发动民众势力，扩充纠察队等办法之外，又推鲁易起草一个关于夏斗寅叛变的宣言，在此宣言中，现在可指出两点错误：（1）承认农民运动的过火，但不是中国C.P. 做出来的，乃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便是说中国C.P. 不负此过火的责任；（2）承认C.P. 不仅保卫工农利益，并要保护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之利益，号召这些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不要受夏斗寅的蛊惑欺骗。从这两点看来，可见鲁易也丧失了头脑和原则！

不久湖南许克祥的马日事变证实（但中央特派员李维汉同志及湖南省委始终无报告来），老鲍异常焦急，急欲与平山及国民党

中央所决定的查办代表团(老鲍、平山、彭泽湘、陈公博及唐生智代表二人)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此事是老鲍决定的,鲁易是反对的。结果老鲍借此查办团行至岳州,许克祥来一逮捕与就地枪决之电,六人皆逃回武汉!老鲍这种主张当然是很错误的:(1)查办农运过火是原则上的错误;(2)不想用武力去对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去查办反革命,根本是笑话;(3)“单刀赴会”的故事演不成,结果更丧失了所谓国民政府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鲁易反对是对的;可是鲁易也只会消极的反对,并提不出积极的办法。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上,鲁易与老鲍各自发表长篇的演说。老鲍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甚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2)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甚么也没有;(3)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的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鲁易);(4)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5)C.P.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鲁易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2)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并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3)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未多说理由);(4)C.P.中央应发宣

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动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不仅反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

鲁易之后，和森发表的大意是：“我们听了老鲍和鲁易的演说之后，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和政治路线。在老鲍的演说中，有些动听的办法是可宝贵的，但试拿以与国际决议案相比较则完全与其原则相违背；如国际决议教我们实行土地革命，而老鲍则教我们只要做到减租、减息便是顶好的土地革命！又如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而认现在代表土劣、地主、军阀的国民党中央一点不好的倾向也没有，反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取消民众运动的法令；这样，还有甚么原则？至于鲁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已经不是左派，我们应当推翻他，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至于鲁易忽然提出工农民主独裁制，也与国际决议不相合，是否国际有所改变应请说明，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

秋白同志接着说道：“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在他看来，仿佛鲁易与老鲍之间，一个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一个不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似的。其实老鲍与鲁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只是对于国民政府内资产阶级的成分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点不同，在鲁易及莫斯科的同志们以为中国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业已成功，国民政府内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成分，所以认土地革命可以尽量实行。老鲍则认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还未成功，因国民政府内还保留许多资产阶级成分，所以土地



革命不能彻底实行。我(秋白自谓)也觉五次大会决议关于这一点没有指明,太把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说完全了一点,仿佛此联盟完全成功了,没有资产阶级成分了,这是一个缺点。”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独秀同志在报告中说道:“我昨日与老鲍谈话,老鲍指出湖南农运不是我们的领导,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这样怎得不糟!”这个新发明在不接近群众的中央政治局看来,真是动听。由此农运的“地痞论”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国是;每一个农民运动的通告除了抄写一些国民党咒骂农运训令之外,一定在组织方面要禁止地痞做农协委员,一切农协委员皆应由在业农民、未离开土地的农民来担任。这个也成为天经地义了!

湖南马日(五月廿一)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挥自溃的结果。从五月十八日以来,省委即知道许克祥将响应夏斗寅,中央特派员及省委负责人,先日分析政治,谓将是唐生智整个的叛变,武汉一定已没有了,以为没有办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边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郑州已下,武汉无恙,则又分析政治,以为许克祥不会暴动了;最后知道许克祥确要暴动,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发二百元,次要一百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卅万农民于五月卅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他的理论是:“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武汉政府翻脸,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了武汉。现在武汉政府既然存在,便只有请求国民政府用法律手续来解决!”<sup>①</sup>

郑州下,摇动不堪的、逆迹显著的假左派首领他们都赴郑州开

---

① 关于“马日事变”的情况有不同的记述。李维汉同志写了《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刊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的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党史研究资料》上。

会。此时中央政治局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一次是讨论郑州下后的北伐问题；此时冯玉祥反共态度已较明，独秀同志已悟前此北伐政策之错误；他现在所忧虑的是冯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号召武汉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 C.P. 之日，所以此时独秀同志及老鲍都认“东征”是唯一出路。在此次讨论中，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易、平山则仍主张南伐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当时和森这样说：“现在我有个奇怪不同的意见：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许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长的发展，我们所在地的湖北，自夏斗寅叛变后，已有四十三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农民已达三千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和森提出所拟之湖南、湖北的决议案（已在常委通过）要求政治局讨论追认。关于湖南决议案的大要是：（1）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2）绝对的不要相信和倚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他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即使有所谓合法解决之日，他不过是用法律手段来代替许克祥暴烈手段，即合法的来取消农民运动；（3）自动的没收土地，农民势力到那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土地没收，并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4）在此反许争斗中，应发展农军至五万以上；（5）在最短期间应发展国民党群众至卅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关于湖北是：（1）积极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2）积极利用省政权

(当时在我们之手)、县政权，扩大省防军及工农武力，尽量肃清各县一切敌人；(3)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4)自动没收土地；(5)迅速准备广大群众势力推翻国民党土劣的中央机关，并改组之。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责斥平山就职演说之回避土地革命，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同时指令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否则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鲁易看完两湖议决案之后，表示完全同意，认为与国际来电相合。翌日鲁易提议要求国民政府讨伐朱培德，同时我们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和森根据此意用常委名义发一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的训令于江西省委。后来平山表示反对。

此时中央政治局有点“进攻”的新空气。同时湖北省委根据上述之湖北决议精神开了一全省代表会。在湖北各地做国民党工作的同志，经过中央常委的指示，开始宣传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同时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这些军事同志去时，中央常委出席说明是要准备对付整个的唐生智的反动之到来。于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后来此会开会数次，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迁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须要计划与款项异常之急；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脸。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鲁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

郑州下后，中央政治局另一场会议，独秀同志作了一个乐观的政治报告，大意是：张发奎军队已自动的撤回武汉，唐生智军队亦继续撤回武汉，是共同北伐的计划已被打破，共同解决 C.P. 的危

机业已延缓。鲁易接着指明现在情形并不允许乐观：反革命继续在湖南发展，继续屠杀工农和我们的同志（其时长沙 C.P. 省委整个被杀），冯玉祥在河南反动，朱培德在江西反动，驱逐一切 C.P. 分子和政治工作人员出境；他指明现在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当时和森赞成这个进攻论：“我们中央政治局，从今日起，必须具一种明确的意识：再也不要说甚么让步，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这类的话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再也不要退让而只是进攻。我们应首先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我们要向民众动员起来攻击他，我们要在机关报上动员攻击他，同时我们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当时任弼时同志提议发宣言，于是宣言、政纲皆推鲁易起草。同时鲁易提出两个“惊人”的建议：（1）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汉阳兵工厂工人应特别罢工，表示不解决许克祥不再造枪炮杀自己的人；（2）发一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并提出要求免朱培德职及讨伐朱培德的口号，此两提议虽经多数长久之犹疑与争辩，卒得勉强通过。

可是通过此案的消息传出去之后，真是闻所未闻的骇人听闻！老鲍闻之，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讨伐朱培德的口号呵！”谭平山闻之，臭骂鲁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国情形……于是群相告语，若大祸之将至：“这不是与国民政府决裂么？我们有甚么准备，能这样开玩笑！”“兵工厂罢工来一个屠杀怎样办？”“国民政府、唐生智、朱培德、冯玉祥……一律表示反对，我们有何力量抵得他们一个打击？”“荒唐！”“幼稚！”“发狂！”……如此等等，俨然大祸将至一般。为甚么这样惊慌，这样骇怪呢？因为退让已成习惯，对于国民党和新军阀已养成一种驯顺的心理，现在忽然有违反此心理与习惯的决定，所以

莫不大惊大怪起来。这是证明机会主义入人之深，已使一切上层同志没有阶级的仇恨情绪与感觉；天天坐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屠杀、放逐、压迫我们的同志及工农群众，此处无抵抗，那处也无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层负指导责任的同志的阶级感觉与仇恨都麻木了。反之，对于久相往来的大人物、大领袖之驯顺恭谨的感觉却异常灵敏，所以此时下层群众所感觉奇怪的正是“C.P. 何以此时不反抗许、朱、冯等的屠杀压迫，及国民政府的纵容？”而上层同志所感觉奇怪的完全相反，乃是“为甚么此时我们可反抗国民政府，及汪、谭、朱、冯、唐……等？”

于是下一场会议，要求取消原案（由多数的反对）。此时和森虽还一度坚持，然鲁易自己表示：“现在既然一些职工运动的重要同志都不赞成罢工反抗国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纳大家的意见修改原案。”秋白亦说：“我们进攻是应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而冒然进攻是无益的”。于是立三提议改反抗的示威罢工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同时关于朱培德的口号，亦大加修改。

由以上的记录看来，从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之时起，我们便应以“进攻”、“暴动”、“政变”为中心问题；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地主、土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及国民党左派已公开的向我们进攻，向我们暴动，向我们政变。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在夏斗寅叛变之时，鲁易还认左派关系为我们中心问题，这是与老鲍同样错误。后来否认此左派而主张推翻其中央，这是鲁易的进步；可惜他不能贯彻此主张，公然不讳的承认有“决裂”和“政变”之必要，老鲍反用决裂和政变来反唇相讥，鲁易辄不敢自申其说。郑州下后，鲁易指明时局之严重，第一次明白的提出“进攻”的标语，这是非常之对的！假使鲁易能坚持，不因一时之反对而自缩，结果一定可在中央政治局树立

一种进攻的指导去替代那退让的指导。可是鲁易自己不能坚持，一经反对便自行让步。从此中央政治局遂永远不能超出退让政策的厄运；“进攻”的空气刚一抬头即为西北学说的无形势力所打落。

当鲁易提出罢工原案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现在有一种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企图反对进攻，便是说我们没有准备不能进攻。”他这句话是指老鲍的。其实湖南五百万农民的组织，虽受打击，并未冷却火气，两湖工农势力纵不雄大，也不致一个反抗的罢工都不能做。在此情况之下，还以无准备为借口去阻止进攻的方针之提出，当然是一种西北学说的机会主义。

当郑州未下之前，唐生智的危机并不减于我们。因为他的主要部队都开赴河南，湖南异常空虚，留驻湖南之兵，连湘南、湘西计算，不及四团；而我们湖南农军的枪枝早已超过三千以上，叶挺军队借迎击夏斗寅已扼粤汉路而留驻湘鄂交界，同时湖南有二十县以上（最著者有长沙、浏阳、湘潭、湘乡、宁乡、益阳、茶陵、攸县、湘阴、衡阳、衡山、郴县、祁阳、耒阳、安化、新化、安源、萍乡、醴陵、汝城……）的广大农民群众，不顾省委之溃走及中央特派员取消暴动之命令，他们英勇的坚决的自发自动的暴动起来，唐生智是完全可以推倒的。并且在我们的政变胜利之下即可用民众的势力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而成功我们领导之下的真正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这个可能在当时确是有的。唐生智很懂得这种可能的危险，所以他在当时极力向我们卑词下礼，常常从前方直接打电报于我们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总括一句，他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得多。他为甚么要这样表示呢？便是他怕我们在两湖起暴动，又知道我们有取得两湖之可能，乃故意卑词下礼来缓和我们，使我们相信他不是夏、许叛变之主谋，使

我们相信他有自己回湖南解决许克祥之诚心。果然不错，我们就中了他这种鬼计！

第二期北伐有一点好处，便是将唐生智在两湖的主力军调出三分之二于河南。假若我们有先见之明，乘此时机准备两湖暴动，用自己的势力来巩固两湖根据地，来实行土地革命，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老鲍根本无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之志愿，不必责备他；鲁易徒有此志愿而完全不知利用北伐出发后之形势，消极方面只知反对北伐，积极方面只知要取广东。老鲍无异抛弃两湖想西北，鲁易无异抛弃两湖想广东！广东与西北虽不同，其忽视两湖是一样。

当夏、许叛变时，我们曾说：“这是唐生智的三月廿”。话虽如此说，可是全不知利用“三月廿事变”的经验与教训来对付唐生智。三廿事变的经验是甚么？蒋介石原先本拟与我们完全决裂，后来检查他自己的势力完全使他失望，因为三月廿以后，黄埔军官学校学生整个左倾，反对蒋介石，不服从蒋之命令或调遣；同时其他各军如谭延闿、程潜之湘军，朱培德之滇军，在三月廿都是反蒋的。所以三月廿事变是我们的危机，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危机；蒋于此危机之下只有高唱北伐，找他自己的出路。三月廿事变的教训是什么？是一味退让而不知反攻。假使三月廿以后，我们能发动愤不可遏的工农势力及左派军事势力来对付蒋，蒋是无可如何的。现在拿上面所述的情形来对照唐生智的三月廿，情形是很相象的，性质与程度却更严重了；因为此时两湖发展的工农势力比较广东三月廿时要大十倍以上，同时湖南五百万有组织的农民已实行用自己的势力在那里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因此所有一切国民革命旗帜下面的新军阀都倾向反革命，这些都是性质上程度上更严重的地方。因此唐生智经营他自己的三月廿（实际是五月十八）到

四月十二(实际是七月十五),与蒋介石便有些不同:蒋介石积极经营北伐,唐生智对于第二期北伐的态度是不积极的,他开始很不愿意调出他的主要兵力于河南,他知道这个时候对于他两湖的地盘太危险,蒋介石知道两湖、江西拿不住,故拚命经营东南做他的根据地,唐生智则始终知道要巩固两湖做他的根据地,后来之高唱东征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用。在理我们应当怎样去制胜唐生智的三月廿到四月十二呢?我们只有百倍的利用三月廿事变的教训,乘唐生智兵出河南之后,在两湖举行我们自己的三月廿和四月十二。纵不然,在夏、许叛变之后,我们以暴动对付暴动,以自己的势力巩固两湖,做我们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这样做去未有不胜利的。夏斗寅叛变时中央政治局中有此萌芽之提议,已属迟了一点,郑州下前的两湖决议案更迟了一点,郑州下后的鲁易提议已属太迟。然即此一些偶然的萌芽的迟缓的类似“进攻”之微波,在西北学说的大海是起不了甚么影响和作用的!

## 二 政治局的后一阶段

政治局的后一期,完全表现是一种指导破产的阶段:老鲍于武汉军撤回之后,又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以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致与我们决裂,他再三申言“我们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跑掉。”由此引起政治局对于撤回武汉的唐生智之最后的幻想;以为夏、许之变,唐不是主谋,相信他回湖南或者有几分诚意解除许克祥亦未可知。

“进攻”的微波被打消之后,鲁易亦丧失了方针,仍然复回到所谓左派中心问题,想极力拉拢汪精卫来挽回一般的危局。由此引



起政治局对于汪精卫最后之幻想；以为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首领，唐生智既还需要国民党这块招牌，便不能不屈就汪精卫一些主张，所以拉住汪精卫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于是“东征”与“汪精卫”遂成为后一阶段的送命汤！过去所通过的两湖决议案实行了么？一点也没有实行，现在的两湖似乎更不关重要了，横竖唐生智“还想要吃草”，一时不会和我们翻脸，他既回来，两湖即听他去处理。而且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首领，汪、唐近来关系很好，两湖问题就更可听他两个去处理。

过去所拟左派群众工作实行了么？刚开始团结湘鄂赣及江浙闽左派分子做反汪、反谭、反冯、唐及朱培德之宣传，谭延闿等知道了（因为毛泽东同志等公开宣传），大骂 C.P. 有推翻国民党阴谋，此消息经独秀闻之，大发雷霆，以为这一手来不得。其实此反国民党中央之宣传是经过中央常委秘书厅指示的。

过去一度拟议之发动群众去攻击国民党中央的反动，这工作做到了甚么程度呢？说来也可笑，便是只在“欢迎铁军凯旋”的停工之下，湖北总工会违反修改罢工案的精神，发了一些反抗国民党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和打倒许克祥及朱培德的标语。这些激烈一点的表示是总工会负责同志刘少奇等经过中央秘书厅的同意做出来的。可是这又做错了，得罪了汪精卫！汪精卫见着总工会的宣言，知道这一日实际是罢工反抗他们的；他一见老鲍和独秀流泪切齿的说：“吴稚晖曾警告我，‘你日后上共产党的当时，记得吴某的话’，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即指总工会）何必连络武人来倒我！”所以到七月一日中央在武昌开扩大会议时，独秀的政治报告中犹指此次罢工的“激烈”表示，是开罪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原因。老鲍尤其深恶痛恨这一日的罢工表示。

前此一度拟议提出“进攻的政纲”与国民党公开谈判的事怎样

进行呢？说来更可笑，不仅没有进攻的政纲，即鲁易所拟之最低限度的政纲，也难通过。老鲍坚决的主张在此政纲中：（1）不要提土地革命；（2）不要提武装工农及工人纠察队；（3）此政纲专为适于东征之用，应特别提出一些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条文；（4）把过去一切取缔店员，取缔工人，取缔农民，取缔童子团及取缔一切民众运动的条文都综合上去。

此时不提土地革命的理论是：“现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一齐叛变，左派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谈甚么土地革命，谈更无益。现在只有东征才能跳出此危机。故一切较高的政纲都待打到南京后再说。”从前北伐是唯一出路，现在东征是唯一出路；从前主张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土地革命，现在主张打到南京后再提其他问题。前后照应，一气相承，这是西北学说的精神！

此时的实际情况是：（1）国民党中央公开的袒护许克祥与朱培德；说许是代表全社会反对农运过火的，说朱驱逐 C.P. 及左派的办法完全是对的；（2）冯玉祥仿行朱培德办法，驱逐 C.P. 及政治工作人员出境；（3）朱、冯之举皆先得汪、谭、孙科、徐谦、顾孟馀等之主使与同意；（4）汪精卫等对各处被逐来鄂之左派分子表示，C.P. 问题待七月十五之中央会议正式解决；（5）汪精卫、孙科极力勾结唐生智经营东南，欲完全取消三大政策，和一切民众运动以博东南资产阶级之同情；（6）唐生智部下将领以何键为领袖，公开宣言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 C.P. 东征；国民政府升许克祥为师长，马日政变之湘省政府主席张翼鹏为参谋长，中央军委直接发电拉拢夏斗寅；唐生智回武汉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完全成为唐生智的机关，汪精卫是他的“新欢”小老婆。

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两条出路：或准备暴动，提出一进攻的政纲与所谓左派公开谈判，谈判不遂，即公开宣布左派叛逆革命

的罪恶，将其政府与中央推翻而改组之。或者完全投降，赞成修改或抛弃三大政策，停止工农运动也可以，分共也可以，只要你在南京未打下以前，不驱逐或屠杀 C.P.。在此条件之下，还可合作东征，还可给草与国民政府及唐生智吃。

前一出路，在鲁易初提出进攻及罢工示威之时有此倾向，但不到三日即被打消。在此情况之下，自然只有由鲍罗庭同志领导我们走后一条路。所以此时显然不需要一个进攻的政纲，只需要一个投降的政纲，即不提土地革命，不提工农武装；而只加重取缔工农运动之过火，把武汉政府一切赤色的标帜皆涂黑，由此去博得东南“工商业者”之同情，我们暂时受此委屈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渡过现在的难关，然后再与他们谈别的事情。老鲍的意见完全是这样的。所以此时他所亟亟经营的只是想拉住汪精卫、唐生智来吃他的草，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此案暂时保留到打倒蒋介石后再说；希望他们在各将领间去疏通疏通。可是唐生智直接间接的答复是怎样呢？“对呵！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无奈这些赳赳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所以最好还是 C.P. 顾全大局，自动的解决这个难题！C.P. 须知现在也非常危险，我也拿不住我们部下！”这是甚么意思呢？这是要 C.P. 自动的退出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免得武人动手，因为“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这个意思开始还是暗示，后来汪精卫、唐生智公开的明说，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徵同志立即上辞呈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老鲍对于后一办法表示可以采纳！

于是最后的买卖是很明白的：老鲍与 C.P. 所要的是在东征时期还不要实行分共；汪精卫与唐生智所要的是东征时间还要吃草，还要请苏俄的借款快些汇来。“请你保留分共案到南京取下后再谈

呵！”“请你电催苏联借款迅速全数汇来呵！”这是最后的交易。

老奸巨滑的左派政客与新军阀还要讨些便宜，是很显明的。在我们“东征时间不要实行分共”的语气中，也可看出“实行”是不愿意的，但“议决”分共或许是可接受的；横竖这是个实际问题，他们的议决不过是句空话，他们哪有势力来管理党部和民众团体，在东征时间，他们尤其无此力量，而且他们互相间的冲突还多呢；即使他们现在决议分共，待打到南京情形变换，难道不能再作道理？这种空气，从老鲍起，在政治局中是可感觉的。假使后来国际训令不来，也许引领我们这样去投降，即一切草料给他们吃，让他们议决分共，待打倒南京后情形变易再作道理。

鲁易在他所拟的最低限度的国民革命政纲中仍然提出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惩罚反革命及讨伐广东。这些都是他与老鲍不同的。至于对左派关系及综合过去所决定之限制工农店员要求等具体条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鲁易自从上次受一打击后，再也不提进攻和准备决裂了。他此时的精神，似乎趋向于经常的合法的政治路线：（1）想极力拉住汪精卫为左派中心；（2）想扩大左派武力，以邓演达、张发奎为中心；（3）想在白纸黑字上维持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原则；（4）湖南反革命问题要求国民政府惩办；（5）对于东征未表示反对，但仍提出南取广东。事后追论鲁易始终不失为一个书生；原则是在纸上维持着，实际问题一个也未见到，此时的实际问题是“决裂”、是“暴动”，是以群众的势力没收土地，武装工农，是以群众的势力推翻假左派而建立群众真正的左派和政府；维持原则的政纲之作用不过在用以公开谈判，揭破假左派首领汪精卫等之假面目和藉以与之做正式决裂的口实与号召罢了。此等政纲只有是坚决的准备与汪精卫等决裂才有作用。鲁易既始终要拉住汪为中心，又始终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这是老鲍始终有力制

胜鲁易之点。鲁易的主张始终是矛盾的，老鲍却是始终一贯的，因为他的主张始终是顺从汪等的心理与需要的。始终要拉住汪，是老鲍与鲁易相同的，但鲁易始终愿做汪的头，老鲍始终愿做汪等的尾。结果鲁易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老鲍是“既善顺随，又会揣摩”。

现在再叙述些别的事情：

鲁易所拟扩大左派武力的计划实行了么？没有实行。此计划原本不始于鲁易，在前一期的常务会秘书厅即有此决定，但未实行。邓演达随从第二期北伐出发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之权落于谭延闿、程潜、孙科之手，他们大大缩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经费，并拟遣散教导团或归并于各军，这完全是向邓演达进攻的。我们曾几度计议打破此阴谋，故在郑州将下时即派国焘同志前去河南，与邓商议此事，并谋左派之新团结。然邓演达自讨论土地问题时受谭、唐、程、孙等大众之排斥，不得不离开武汉，随军出发，故他异常消极，且受托罗斯基派俄顾问的影响，倾向于第三党之说，即取消C.P.与国民党左派合并组织第三党。其实也是空话，他只是消极悲观。现在鲁易是想扩大张发奎的势力，此事老鲍坚决反对，因此C.P.中央军部负责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数亦坚决的反对，以为这个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马上就要和我们翻脸，何键马上即会暴动政变。但是鲁易终不死心，竟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卫。

现在再说工农武装。自上海失败之后，“纸老虎”的工人纠察队说迅速发展，虽然五次大会决定军事工作的新方针是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然此新方针从未在五次大会后的中央军部执行。在五次大会时有改称“国民党工农义勇军”说，五次大会后，则以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改编入正式军队之论极占优势。夏斗寅叛变时，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有逃走怯懦之现象，遂愈益确定了这种“改编入正式军队”的方针，此方针亦成为政治局中的国是，

虽然没有正式决议，如此写明，然精神和工作上完全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这种军事工作的新方针，在现在看来显然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并且是违反五次大会决议的。夏斗寅之变，我本决定乘机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二千支及月费若干；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我们也不去积极要求。政治局中常有人替汪等如此原谅：“也难怪他们，武器不是好玩的，现在工农在他们看来如此过火，他们自然怕工农拿着枪便要转来打他们自己呵！”两湖议决案通过之后，湖北省委对于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之事曾有一度计议，但不久“进攻”空气消沉，这种计议亦随之消沉。

情形是向严重方向迅速发展。“进攻”的微波打落之后，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此时可举和森来做例：和森深感于对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两让政策没有出路，又见全国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汉，有一夜与独秀、立三纵谈这种感想，因主张提高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独秀、立三皆以此主张为然，翌日在常委即决定发一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并特别寄一信与上海，内中参加些独秀和立三的意见。在此通告及信的说明中，显然表示一种没有出路的冒险主义、拼命主义的精神，及藉民族争斗来遮掩阶级争斗之理论上的根本错误。（这次常委会有独秀、立三、国焘、和森等四人参加。）此通告及信发出之后，和森自己感觉不正确，因于翌日及第三日连续召集二次扩大的常委会，请政治局全体来参加此问题之讨论及决定，但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独秀说反帝运动是我们的经常工作，何必再三讨论；和森说此通告及信与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政策根本相反，而且

其中的说明我不敢自信是正确的，必须提出于政治局正式讨论。是日下午，秋白来常委，和森对秋白说：此信及通告请你仔细看一下，若不是完全对，便是完全不对的。如若不对，便是一种蒲兰克主义呵（蒲兰克是法国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家，蒲兰克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便是一种另一形式的机会主义）！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此问题时，鲁易指明提高反帝运动是对的，但其说明在理论上完全错误，并且指明不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冒险政策亦是错误的。当时和森自己提议国焘另起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错误，这是当时混乱的表演之一例。

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既然如此混乱，鲍罗庭主义之一贯的领导愈益促进了混乱动摇和犹疑，有一日老鲍出席于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关于中国C.P.之目前任务的主张，大意是说：“中国C.P.目前的任务不要以为只有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工作，例如现在中国有这样广大的失业群众，假若能把这些失业群众组织起来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又如小资产阶级看不见他们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我们能领导工农向他们让步，工农让步之后，他们的痛苦，依然如故，彼时他们便能觉悟到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经济封锁来的。我们能使小资产阶级不怨恨工农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总之现在中国C.P.应从各方面多做些有效的事情，令人看着佩服……”这些教训只有使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和动摇。这些教训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回避土地革命的改良主义。

老鲍在另一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对于土地革命的意见：他公然说明“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照他的解释，土地革命的意义和内容是：（1）减租减息；（2）乡村自治；（3）保护佃农；（4）武装自卫；（5）办农运讲习所，从新养成不幼稚、不过火的农运人材。当

时独秀说：“老鲍这种办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秋白说：“这不是修改国际土地革命意义，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只能如此做。”照老鲍的意思看来，武汉国民政府已算是顶土地革命的了，因为上列五项事情几乎皆已办到，而且在未出发北伐前的广东国民政府即已办到了。老鲍一直到底灌输这种改良主义于政治局，怎得不使我们迷离失所，此时大约国际有电报来调鲁易回去，鲁易已不管事了。老鲍每次都能出席于政治局的会议。

鲁易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国际来电的要点：（1）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2）武装C.P.五万人；（3）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4）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这个电报怎能告知这个逆迹昭著的叛徒！汪精卫知道这个电报之后，谢谢鲁易，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的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C.P.即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之下，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鲁易，大约老鲍也有电致国际，所以国际调他回去。

假左派叛逆的计划是早已确定了的，所犹疑的只是用甚么口实来“分共”，公然抛弃三大政策么？这个太傻。为民众运动的过火么？更揭破了自己的假面具。这对于虚伪的叛徒确是一个难题，使他们不得不犹豫。汪精卫曾拟行一苦肉计，于七月十五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前赴九江，名为与朱培德会商东征，实际让何键发难开刀，自己避免分共和破坏三大政策之恶名。现在好了，谢谢鲁易先生，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使他们于苦肉计外寻得一更好东西，便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消灭国民党的阴谋。

现在严重的情形到了最后一阶段：（1）冯玉祥来电驱鲍，分



共；(2)何键露布讨共檄文，并发讨共通电于全国；(3)叶琪、周烂(唐部下)名为回湘查办许克祥，实际举办十路清乡，积极向农民进攻；(4)唐生智回乡之日公开反共，将马日事变责任完全推于C.P.身上，公开枪决我们二同志；(5)何键等公开要求C.P.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6)何键之卅五军移驻汉口，其势汹汹，企图开刀，这是六月底的情形。

有一日下午(大约是六月廿七)和森从武昌的病假中(五次大会后决定独秀、国焘、维汉三人组织常委，恩来为秘书长，未到前由和森暂代。后因维汉留湘，不知下落，恩来改任军部书记，国焘因事与独秀口角后消极不管事，后又赴河南。因此始终不能成立确定的秘书厅及常委，而独秀又多外面往来之事，立三忙于全总及劳工部；平山忙于农民部；后补秋白为常委又因病常不能到；而且五次大会后，好几位重要首领牢骚满腹，善使性气，秘书厅工作是最难做的。和森新从外国回来，事情又不熟悉，且终日常驻不能他走，故工作异常不周。因此大家皆露骨表示不愿和森再在秘书厅及常委。大约是六月廿四经政治局正式决定邓中夏同志为秘书长，在邓因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国焘同志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工作。和森因病，于翌日告假到毛泽东同志家——在武昌——休息几日。)回到中央秘书厅之住屋。是夜我们中央军部来一紧急报告，说何键有今夜举事之说，各机关皆须戒备。翌晨独秀召集在西门子鲍宅开紧急会议，立三、兆徵因劳动大会缺席，秋白亦未到。恩来、太雷(鄂省委书记)皆报告何键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时解散总工会纠察队将缴卅五军枪械之谣言与马日事变同一把戏；平山报告邓演达已出走，临行希望C.P.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据他(邓)所知，何键一定开刀无疑云。同时太雷提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今日

一定要解决；恩来报告中央军委与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调过武昌入张发奎军，并已与张交涉好，但为避免耳目计，过河时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宣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大家遂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军，同时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他说：“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平山、和森皆赞成此提议。前三日和森在毛泽东家知道唐生智回湘后之公开反动（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农民到毛家来），曾写信致中央常委说：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察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当讨论此问题时，独秀表示犹疑，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讨论结果，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同时省委机关亦移武昌。当即指定和森立即往武昌布置机关，独秀、国焘料理常委及秘书厅事务；恩来、太雷料理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事。和森当即过江布置机关去了。

不意省委及总工会处理纠察队之事，手忙脚乱，未向负责同志说明，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军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同时中央秘书厅未发迁移通知，并未将是日决议告知未列席之中央委员及活动分子，以致大家也莫名其妙。

和森在武昌布置机关妥当后，翌日黄昏独秀、国焘过来，不久秋白亦偕一驼背毛子来。是夜开会于武昌之新机关：（1）国焘提议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2）C.Y.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的中央

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3）秋白有甚长之书面提议，大约系说明湖南农民问题所促进之阶级分化的革命危机，主张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土地；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4）驼背毛子出一答复国际之电稿，内有“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之指导权”之语句。

国焘之提议未注意讨论，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于七月一日召集一活动分子会，或中央扩大会议。

翌日仍回汉口开会于鲍宅，是日才知道这两日中因解散纠察队和中央秘书厅未迅速发迁移通告问题，同志间精神大形混乱，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理由是：“我们是领导左派的，左派首领尚在汉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进行，而我们反离开他们藏到武昌去，成甚么话……”独秀也以为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等接头，于是又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正式决定七月一日开中央扩大会议。

翌日又开会于鲍宅，老鲍出席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说。大意是：（1）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此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鲁易十倍以上的革命；（2）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很有利于我们的，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之可能，例如蒋介石一直到现在并未真正取得群众的领导权，他不过是侥幸成功，机械的用炮火把我们的势力打落下去，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3）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夫（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前的委员

长,反对派首领)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老鲍做这演说时是很精神的。

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则提出一反对老鲍演说的决议,指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前后是一致的。从前季诺维夫的政策是经过俄国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诺维夫个人决定的。老鲍巧得很,反指他们是帮助季诺维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老鲍上面这个演说全是文饰自己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也是他的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归移于季诺维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我们主观力量没成熟”这句话在西北学说的字典上来解释工农运动过火,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农,一言包括,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太不成熟。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典来解释,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社会民主党化,迷信民族资产阶级,回避土地革命,以致不能取得领导权;一言包括,便是三月廿以来的机会主义太成熟了。

最后的破产到了:七月一日武昌的中央扩大会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的总结。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

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中，不过是两月以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

### 三 五人政治局至“八七”会议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鲍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换两湖工作同志，以为大反动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发、项德隆等同志决定去俄，毛泽东等则决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许多活动分子认为是“散伙政策”。同时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

大约国际责斥机会主义，调回老鲍及改组中央之训令已来了许久，老鲍秘不发表，中央移武昌时，驼背毛子所携致国际电稿内有“……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之语，我们莫名其妙。此后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原先我们莫名其妙。

此处老鲍又犯了最后的严重的政治错误：（1）假若老鲍早将国际训令发表，何致七月一日武昌中央扩大会议犹在那里贯彻那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的破产政策；（2）假使老鲍在中央扩大会议时将国际训令发表，我们能于七月一日决定一与假左派决裂的方针；彼时唐生智、汪精卫与我们决裂的阴谋尚未成熟，势力

还未完全集中，我们在豫鄂交界的张兆丰同志（属方振武）之一师二旅劲军还未被解决；张发奎（此时与唐甚冲突）、贺龙、叶挺及军事政治学校之军力皆集中武汉，工农民众冤屈愤慨，正是积久待发；假若此时决定与假左派决裂，便是决定我们在两湖以至江西之暴动，何致待至八月一号才在南昌发作呢？（3）老鲍临行犹给一种“逃跑主义”，“散伙主义”于五人政治局，以为“大反动临头了，中国的一九〇五到了”，以致使此临时政治局开始即全无斗志，怀疑国际训令。所以老鲍不发表国际来电，敷衍国际之罪小，而延误我们的新方针之接受和新政策之执行其罪大！及至七月十三日的前几日，老鲍才提出国际来电以 C.P. 中央名义发表一批评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国际来电是要我们示威的退出），此宣言之末尾还有“希望”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的幻想。然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开会，我们的平山同志等不敢出席，我们的临时政治局也未准备任何群众示威的表示。只有何健的军队上街示威，并至国民党中央会议处欲捕我们吴玉章同志等。

此时临时中央机关又由汉口复移于武昌。和森在汉口出医院后（大约是十六日以后）曾写七次信于中央常委，提议之事有：（1）提议中央开一正式全体会决定新方针；（2）提议武汉三镇举行一大示威运动，反抗“分共经过”之国民党宣言；（3）提议重新号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号召以此为中心，揭破国民党减租之假面具（国民党中央于十七日发表一减租命令）；（4）认我们现在的失败不是一九〇五，认唐、汪政权并未稳定，工农势力并未冷火气，因此主张中央仍应留两湖奋斗，反对迁去九江或上海之逃跑主义；（5）

反对类似“散伙政策”，并自请仍留两湖工作，不愿去海参崴办党校；（6）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作反汪派之鼓动。此时国际代表已到汉口，且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独秀、平山、维汉，又骂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指导人，又向国焘、太雷、维汉（常委）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同时果派去一个毛子直接赴湖南宣布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和立即改组中央。因此常委及一部分上层同志对于和森大起误会，以为和森是“投国际的机”，“想组织左派”，“国际训令来后称好汉”，“摆脱过去共同参加的错误说漂亮话”，“每日一封信唱高调”……。其实上面那些情形是“八七”会之前几日太雷同志报告出来（在常委），和森才知道的。

事后追论：当时常委诸同志见到党的上层的危机（上而国际责罚，下而同志非难），而未见到革命挫败时群众异常惶惑和恐慌的大危机。此危机只有斩钉截铁宣布与执行国际新方针才得挽回。此时常委是站在一种伦理观点上去护党，而不是站在政治观点上去护党，常委只知道接受国际训令处罚中央及首领对于党有危机，而不知不接受国际训令，不宣布新方针，于党及革命的危机更为重大。此时上层首领的利益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是难两全的。和森违背指导团体的共同，独自急进的主张承认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改组中央，接受国际训令，这在通常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鄙的；常委顾全指导团体的共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愿接受国际新方针，这在非阶级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钦佩的，然若在我们的政治上讲，则是非黑白的位置又是不同的。五次大会前，有人咒骂秋白是国际决议到后称好汉，自然现在这种咒骂又移到了和森。然而事实不是如此的：第一、因为和森“每日一信唱高调”都是向中央常委唱的，而未向下层群众鼓动或宣传过；第二、和森个人的思想，因

为在武昌毛泽东家获与由湘逃来之同志及农民谈话（他们甚不滿意于中央及湖南指导人，说不是许克祥杀他们，乃是某某杀他们……）。因而思想上起了变化，又因病在医院，有时间想这些问题；第三、和森与国际代表之关系是在“八七”会议及翌日之新中央会议见过二次；第四、和森于“八七”之前请求派赴湖南参加秋收暴动工作，并得常委之许可，绝无仍留中央称好汉之企图；第五、和森始终不主张旧指导人多留于改组之中央，其理由在“八七”之前的常委会及“八七”会议中皆正式发表过，因为如此，才能使党内外群众耳目一新，因为如此，对于新方针之执行才有充分保障。“八七”会议，和森之所以反对国际代表提出之名单（是与常委决定的），是因为除加一苏兆徽同志及罗亦农同志外，一切皆是旧人，即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同志，初皆未列，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的毛泽东、彭公达同志（彭是马日事变后提议号召卅万农民进攻长沙的）亦未在列，而如和森反在名单内有地位；第六、和森主张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维汉可留中央组织部或秘书厅工作而不必兼常委名义，这些都是斟酌当时实际情形而主张的；第七、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第八、和森请求回湘工作，绝不是企图与泽东等组织甚么左派，只因两湖暴动和森是提议之一人，又彼时湖南工作实须要加人。“八七”之明夜，和森正欲与公达上船回湘，而新中央来一命令停止和森前去，翌日开会正式决定来北方工作，和森于讨论决定之后，即遵照决定北来，一直到现在没有甚么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便是明证；第九、在“八





于暴动是没有决心的。

虽有广东、两湖之失败，然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

国际训令初到时，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为党在组织方面没有出路。亦农同志甚至说：“即使在政治方面有出路，组织方面是无出路的。”又以为党没有家长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疑，非常害怕。现在“八七”以后的事实可以答复这种顾虑和悲观。

“八七”以后，只有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四分五裂，不成东西。我们的党适得其反，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

#### 四 问题与结论

我们的党虽然犯了以上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

“五四”以前，中国虽然有工人，但还没有形成为一阶级，广东、香港虽然有工会，但还没有阶级的自觉，自有中国共产党产生，才有阶级觉悟的工会之组织，才有阶级觉悟罢工之发展，中国工人才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

“五四”以前，中国工人及苦力虽然也曾多次被小资产阶级政党利用来参加过革命斗争，然完全没有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要求，屡次都是徒被利用，一无所得。自从第三国际命令我们加入国民党以来，我们在广东获得广大的工农组织势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一年以后，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C.P.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民国十三年以来，中国革命之旗帜，名义上是国民党孙中山，而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和C.P.，这几年中，名义上虽是做民族革命工作，而实际上发展了最深刻最广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组织势力发展到五百万以上，农民到千几百万以上。百战不停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已经使广东几十万工农群众于革命三次挫败之后，还能奋起建立广东及东江琼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过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以这样幼稚的党领导这样伟大的迅速的争斗，错误是必然难免的。

从三月二十以至贺叶失败的机会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同时从民国十三年加入国民党以至民国十六年七月与国民党决裂，在此三年中，积聚和发展了广大的工农革命势力与经验也是事实。宽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所发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固属不对，同时因为武汉的叛逆和决裂而认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错误更属不对。

托罗斯基国际反对派借口中国革命的失败，攻击第三国际及俄国C.P.中央，他们欲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于俄国C.P.中央，他们以为三月二十应即与国民党决裂，不应帮助北伐和武汉政府……。这些都是反对派借口攻击的政治作用，事实不是如此的。

三月二十事变象我们中央所采之退让态度，甚至停止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但若说这个时候我们便可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也是错误，因为彼时我们的力量还未成熟。我们从三月二十事变以至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这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错误不在国际而在于中国党中央。就事实说，北伐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是异常伟大的。假若我们能运用这种伟大的力量去对付将要叛逆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为其代表），结果我们是可由三大政策一直领导革命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失掉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获得的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所以北伐政策根本是对的。

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根本亦是对的，在此原则之下去帮助与改造武汉政府也是对的。假若我们能坚决的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坚决的实行国际及五次大会的决议，坚决的制胜夏斗寅、唐生智、许克祥的反革命及阴谋，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完全可在我们的势力之下去改组，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后来两湖的失败绝对不是这个原则的责任，而是逃避土地革命的西北学说和阿附小资产阶级的退让政策之责任。

有人以为“八七”以后的暴动政策是国际对付反对派的作用，这种观点是根本不对的。“八七”以后的暴动，是马日事变后湖南工农的需要，是夏斗寅及七月十五事变后湖北工农的需要，四月事变后，江苏、广东工农亦有此需要。

说到组织问题：党内群众的政治讨论，素来是没有的，指导机关内工农成分也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有最革命的工农阶级，和最精华的工农党员群众，他们的倾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质言之，他们在中国革命上起了很伟大的作用，而在领导革命的自己的

党内反没有起丝毫作用。这便是过去机会主义组织方面的来源。所以组织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象暴发户一样的发展：一九二五年以前是不满五百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一九二五年以后却发展至五万人以上的大党。

一九二五年以前，党的指导机关没有工人分子参加，是必然难免的；一九二五年以后，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来源。

从一九二五以至北伐的革命高潮中，已经锻炼出广大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势力，同时更锻炼出无数工农群众的领袖；然而我党的组织全未反映这种伟大的进步，指导机关始终未相当地吸收这些群众的斗争的领袖进去。另一方面，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甚至上级党部不准下级党部自发口号，自发宣言，自定当地斗争之政策，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士兵。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展其创造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动作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要认为大逆不道，采取高压。由此养成“怕群众”的习惯，党内事情怕群众知道，以为如此，将发生异见，动摇指导机关的威信；因此指导机

关也愈怕群众的代表来参加。指导机关与群众的联系很不良，不仅隔断，甚至背道而驰，群众完全离开党，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抛弃群众，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做那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的首长时代的工作。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没有工作，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最后这一现象在直隶是特别明显的。这便形成了组织上的系统的机会主义。彭述之同志不能不算是这一机会主义的代表。

这一机会主义是完全违反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纪律，不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组织方面的显然区别，亦即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区别。可是述之和亦农同志在东方大学所发明的组织教育系统，是全与列宁主义相反，表面上是穿凿附会列宁的口号，实际上是酋长宗法的知识阶级的把戏。

我们要铲除政治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同时亦要铲除组织方面的机会主义系统，我们现在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不是削弱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觉自动与创造精神的，不是弛缓党的纪律和组织。乃是强固党的纪律和组织；铲除那种旧军队式的组织毛病而改造为自觉自动的群众党的组织，铲除那种机械的宗法的纪律而代之以真正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同时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应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组织的重要任务。但这些施行到什么程度什么界限呢？以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动的需

要为界限。超越此界限的极端民主的要求亦是不能容许的。

现在党的改造是整个全盘的改造，而不是什么派别的改造。我们要在国际新方针之下，重新团结党的队伍，强调党的凝结性和统一性，我们所有工农党员群众及好的知识分子党员群众是完全可能团结于此新方针之下，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因为全中国的工农群众莫不有欢迎新方针的，他们的先进分子更不待说。国际新方针初到时，有人以为将有引起党的分裂之危险，其实此危险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主观上我们亦要防止此危险；第一，最好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必须在相当时间停止其指导工作；第二，一切指导机关尽可能由群众选其相信之人负责；第三，过去一切错误和是非尽可能交给群众讨论判断，尽可能发展党内讨论；第四，严防机会主义者企图团结一部分党员阻碍党的改组；第五，严厉防止第三党之企图动摇或分裂党的队伍，更应严厉反对“让小资产阶级和腐化分子到第三党去”之说；第六，绝对相信群众来改造党，不应只相信上级机关或已经为群众所不满的中坚分子来改造党；第七，在此改造时期，上级机关绝对不应袒护群众所不满的少数分子而忽视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群众之意见；第八，在此改造时期不应让少数一二系统的机会主义者有凭借党的机关，压抑群众及其意见之可能，即使群众意见是错误的，也应在其发表之后再予纠正，万不能采取国民党中央“停止”这个“停止”那个的办法；第九，应极力争于全党之改造，而不应组织什么“左”派；第十，反对述之一类人利用“制造派别”、“分工学界限”的罪名来阻挠党的改造；第十一，反对抛弃或开除所谓大批“腐化”的下层群众，即使一部分群众有腐化或消极之表现，亦应去找出所以使之腐化或消极的来源；第十二，除最少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外，一切活动分子皆应尽可能的分配工作，万不应站在一种非

政治的考虑之上，排斥或送出大批活动分子于工作或国境之外。

所以在此改造时期，党的机关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讨论或批评。党员群众所要注意的是：不要笼统的反对知识分子，不要笼统的反对一切过去的负责工作同志；并不是一切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者，也不是一切旧的负责工作同志都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凡属一切不压制群众意见，不妨害党的改造的分子，都应尽可能的利用到工作上来。

党不是要改造成为狭隘的小团体，乃是要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政党。我们并不是要把一切犯过错误的人都送上断头台，我们亦不是要把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都送上断头台，我们只要指导机关打开门户由群众选举，由群众监督，相当的能受群众正确的影响，而不是一味违反群众的意见与趋向。

另一方面，党的改造不是换几个上级机关便了事；更不是由知识分子换成工人，由旧的分子换成新的分子便算了事；根本是要从小的支部起，实行改造过来；根本是要肃清一切政治上和组织上机会主义的遗毒，要改变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之畸形的党内生活、教育、训练以及一切不正确的工作方法。我们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

我们的党，现在是开始到了这样伟大的改造时期，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此伟大的历史使命。

上面这个报告，是上年九月在直隶省委改组会及其他各处活动分子会报告出来的，现在才整理付印。身边无任何文件或材料，全是靠着脑中的记忆，小的错误之处自属难免，大体则自信极其客



观,极其忠实,惟自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之一年半的时间,和森未在国内参加工作,故语焉不详,全部报告如有错误之处望有关同志予以纠正或辩驳,用供发展党内讨论之一助。和森附识(完)

## 北方工作决议案<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

一、政治局听了北方局报告后，对于北方局存在三个月中的工作——如宣传“八七”紧急会议的新政策，发展党的讨论，改组顺直及山东各级党部，实行提拔工农分子于各级指导机关，铲除过去一切回避行动与斗争的机会主义而开始复活北方的工农运动以至企图群众的大暴动等——皆尚能循着新政策的道路前进。

二、从北方局的报告中，愈益证明此次扩大会议所通过党的一般任务的总议决案，不仅适用于南方，同时亦适用于北方。在客观上说，北方旧军阀也如南方新军阀一样，他们的统治是绝对不会稳定，军阀间的战争是永续不停的，且张作霖、张宗昌的统治更是朝不保夕的动摇。阎锡山、冯玉祥便是得了直隶，他们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和国民党其他军阀向北发展的欲望，必会有更大更复杂的战争爆发。农民的破产，工人的痛苦，以及其他贫穷群众之生活恐慌也是永续不停，日甚一日。在主观上说，纵然北方工农始终处在旧军阀之下，不能如南方一样曾经获得公开组织的一个时期，发展了伟大的组织势力和争斗经验，然只须在北方党部真能抛弃过去避免争斗的机会主义，深入群众中去工作，不放松一个日常争斗的时期，那末这种主观上的缺点不是难补救的。而且南方工农运动

---

① 这是蔡和森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文件。

因为在国民党名义之下公开，倒反种了许多倚赖当权阶级和军事投机的坏影响，北方工农正可以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自己的力量，免去这种坏的流毒。

三、北方工作的总方向也如南方一样是要实行群众的土地革命大暴动，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北方党部目前的任务便是要发展工人的日常争斗，组织与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朝着以上所指示的总方向走。

四、叛逆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的影响从来在北方没有充分发展，现在他正勾结冯阎军阀号召什么“北伐”以图欺骗群众，攫取全国政权。所以北方党部必须充分的在工农群众中宣传国民党以及冯阎各派新旧军阀背叛革命残杀工农的罪恶，务必使国民党的影响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幻想，从工农中驱逐出去。务必使工农群众不信任国民党任何派别及冯阎的势力，而只相信自己(工农)的势力，以为北方革命的领导，这是党的第一任务。

五、日常部分的工人经济斗争，在北方党部的主观上几抛弃了二年，而客观上亦已停止了一年。现在必须恢复与发展这种日常经济要求与争斗。在这些日常的争斗中去成立群众的秘密的工会组织。铁路工人、矿工及纱厂工人是北方工人运动的柱石，且过去已有争斗的历史。力图恢复此种产业工人的争斗与组织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城市工人及店员的争斗与组织亦应同时注意。天津是北方工运之中心，天津总工会之工作应极力使之发展强固，北京总工会工作应设法迅速恢复。唐山、张家口、南口、保定、长辛店、太原、石家庄等处皆应恢复总工会之工作。

六、工人阶级是北方革命的领导，农民群众是北方革命的广大群众。发展农民组织势力与领导自发的游击战争，是北方党部

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党应领导一切反抗苛捐杂税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一直向没收一切土地的路线走。党应当领导农会成为乡村中的唯一组织势力，凡有农会的地方即应消灭一切地主豪绅民团以及官厅乡警的势力。农民的秘密结社如红枪会天门会等，党应与之接近而领导其群众向我们的路线走，其首领之反动而与军阀豪绅勾结者应随时解决之。以后尤应正确的运用此次扩大会中所定关于一般暴动的总策略。要紧的是要防止各种军事投机以及回避群众暴动等不正确的倾向。每一次游击战争总要使之群众化、组织化，使之深入乡村，不容易为敌人所消灭。偏重扑城，扑城之后一哄而散，这是农民原始的倾向，应纠正之。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应攻城，在暴动发展和有利的情况之下，攻城是必要的。

七、北方军阀的老巢穴，破坏旧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党的组织必须打入兵士中去，必须用种种方法在兵士中做反对战争，要求改良待遇，破坏军纪，以至鼓起部分的兵变，这种兵变要是能与城乡的工农暴动联合起来更是好的。但不应倚靠与等待兵变为主力。

八、反帝国主义与军阀战争的工作，在北方占很重要的地位。党必须在工农群众中，继续不断的宣传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一切卖国殃民的行为，反对一切军阀战争。党必须发展此种运动为一种广大的群众运动，给军阀以实际的打击。藉此种运动提高群众革命与暴动的情趣。

九、要完成以上任务，党的组织之健全与发展是最重要的。工农分子仍应继续提拔于各指导机关，党的基础应确立在工农成份之上，党内讨论应继续发展，党内民主化应继续扩大，务使党员群众真能积极起来，管理党务，监督指导机关。另一方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知识分子的极端民主化的要求也是不能容许的。如上次北京几个知识分子要求极端民主化，反对直隶省委及党部改

组的胡闹，以致北京党部全被破坏。以后北方党部当从此种错误倾向上予以严重纠正。知识分子应尽可能的派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以测验其革命性。京东及直南各县农民运动发展之处，应迅速强健与发展党的组织，天津、唐山更属重要。

十、三特区目前的任务是要建立并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没收土地的农会运动，隶属土匪群众势力于农会指导之下，夺取军阀武装，抗纳一切税捐，由游击战争进至大暴动。

十一、山西目前任务是即须派一中坚分子携带党的一切新精神前去改组党部，扩大民众运动，向阎锡山取进攻之势，尤其是要发展农民运动，抗租抗税没收土地，解除一切乡团武装，打破阎锡山在乡村的统治（村长制）以至发展到完全推翻阎的统治。

十二、东三省目前任务是急须恢复党的组织，在奉天、长春、大连及各铁路各矿山开始建立工会运动的工作及基础。农民运动亦应开始注意。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在东三省特别重要。

十三、北方上下层干部人才都甚缺少，这是过去不争斗不行动的机会主义遗下来之困难。现在要制胜此困难，只有在不停的争斗中去锻炼出大批干部人才。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党部成为由本地争斗锻炼出来的健全党部，而不是过去仅仅由高级机关委派之党部。

十四、根据北方局和森同志报告：“彭述之同志有宣传第三党部的错误，反对北方局改组直隶省委的企图，最近对于至因暴动的观点，又有军事投机的倾向，而北京几个反对省委市委改组的分子又直接或间接在述之同志影响之下。……”中央特议决彭述之同志立即停职，由中央巡视员和森同志会同直隶省委彻查此案并报告中央核办。领导北京少数知识分子同志胡闹的为首三同志应予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罚。

## 附：北方局关于北方政局 及我党任务之决议案

一、南方革命失败后，北方旧军阀也如南方新军阀一样，愈益入于混战状况。此次奉晋之战，第一证明张阎冯三派军阀绝对不能统一北方，也不能消灭其对手之一方，结果，军阀混战将永远继续——除非工农革命胜利；第二经过此次大战后，北方农民将愈益土匪化，暴动，因为他们不仅在混战中破坏了乡村经济，加重了担负，而战后军阀政府（无论战胜者与战败者）对于他们的掠夺将更严重，革命化以外没有出路。

二、军阀混战之继续不停，便是军阀统治之不能稳定，这乃是军阀制度必然崩溃的过程。这个反面便是证明工农革命势力，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北方局初来直隶之时，便向各级党部宣布北方也如南方一样，已直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应准备工农势力为北方政局变动之主力，一扫前此利用军阀与希望冯玉祥或北伐军北来转变北方政局之机会主义。

三、此次战争爆发之初，北局即决定准备北方整个的土地革命大暴动，在第五号通告中，不仅指明此暴动之性质与目的，尤其指明于暴动前之准备工作，即工农利益日常的部分的斗争工作，只有这些工作纷纷的有组织的发展起来，大暴动才能成熟与胜利。

四、迄到现今，这些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呢？可说还非常之弱，各处地方大都正在准备。另一方面，奉晋的军阀虽然皆在危机之中，但其程度还未到极点，而奉方地位且较初战时为优，所以现在决不是整个大暴动爆发时期。因此本党目前任务不是立即大暴

动，而是继续准备大暴动，复兴工人运动，发展农民运动，同时领导各地农民的小暴动，使之发展向我们的路线和大暴动的计划上来。

五、铁路、矿山、纱厂及城市四种工人是北方工人运动的主力，各铁路之未发欠薪者（如津浦）应立即要求发欠薪，其已发清者（如京绥、京奉）应立即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应激烈的反对监工反对裁员，唐山矿工应立即反对包工制，反对借资生息，要求每星期发薪一次，要求增资减时。山东矿工目前尤应要求保障生命危险和抚恤淹死工人之家属。抚顺本溪湖各处应特别要求改良待遇，反抗日人之虐杀。山西阳泉为矿工最多之地，山西党部必须特别注意。天津、青岛、唐山等处的纱厂工人，应立即反对停工，要求改良饭食宿舍，反抗打骂虐待。这些斗争必须在各地切实鼓动与组织起来，开始口号不必过高，必须首先获得几个小胜利，去兴奋群众斗争的情趣。这是复兴北方工人运动的最要紧的关头。

六、反抗一切战争的负担，抗租抗税，肃清土劣地主民团在乡村的势力，普遍组织与发展农会在乡村中的最高权，同时，深入没收土地及农工兵革命政权的鼓动，这是目前农运一般的方针。山东农运占很重要的地位，山东党部必须充分注意此项工作，已有三千多农民同志应使之成为农会组织人，切实领导此最贫苦的广大群众去斗争，就是对于广大的移民运动也须注意。山西与东三省现应立即发动农民反抗一切战事的担负，坚决拒绝纳租纳税反对征兵。热河、京东应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不纳租与地主”、“不缴一文与官厅”的口号，同时应积极领导小暴动和土匪群众向大暴动方面发展。

七、京东特委目前主要任务，一面是领导与发展小暴动，一面是巩固与发展各县农会组织势力和农军，不容情的彻底的肃清地主民团警察的一切势力，确立农会在乡村中的最高权。关于小暴

动应充分注意下列四事：（1）应选择适应的时机，既不应失时，也不应盲动，总要知己知彼，计划利害；（2）要明了小暴动的目的在发展组织雄厚并集中自己的势力，绝对不可离开“群众”和“组织”的观念，去干那英雄冒险的把戏，尤要尽可能避免自己势力之巨大的损失；（3）对于阎冯别动队绝对不应存幻想，尤其不要被其利用，我们只有利用他们与奉军相持的机会去尽情的打倒乡村中土劣地主民团的势力，发展农会农军的势力，可能时我们应去夺取这些别动队的武装，与对于奉军之夺取没有不同；（4）势力未充分时，不要轻易进攻驻有重兵之城市，但一经进攻之城市，首先夺取一切应得之物（如枪械钱财敌人等），可守则守之，不能守时也应凭城作战节节抵抗，切不可自溃自散。

玉田及特委同志，于旬日内犯了两次重大的错误：第一次是自溃自散，第二次是离开组织与群众去干那英雄式的冒险尝试，这样错误，以后绝对不许再演。

八、在工农群众中应同时宣传阎冯反工农的罪恶，打破一切幻想。此次奉军退出张家口时该地同志立即恢复总工会工作是很对的，但同时又欢迎晋军，这是很大的错误，全未知道我党的新政策，仍然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的表现。

九、西北特别委员会目前主要的任务在发展广大的没收土地的农民运动和农军的势力，以及发展党与团的组织，在最近期间农会应发展到二十万以上，农军四五万以上，党员二万以上。京东亦然。同时西北特委应尽可能的使土匪群众隶属于农会指导之下，成为保卫农会发展和没收土地之武力。其不能由农会改编、企图与军阀勾结之领袖，应随时解决之。土匪群众可加入农会为会员，过去之几千农工兵大同盟会员皆应使之成为农会之组织者，现在应尽可能的指导夺取武装的工作，奉军疲弱的时候，可相机暴动。



晋军不能掌绥远的时候，也应该夺取晋军的武器，占领绥远。

十、对于土匪工作的态度是：尽可能的获得土匪群众之领导权，使之脱离不忠实之首领，隶属于农会之中而改编之。农会是主力，土匪是助力。改编时应加以正式军事教育和土地革命的政治教育。

十一、唐山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提出矿工最低要求去组织他们，发展党和工会秘密小组，很好的准备罢工斗争，此处罢工须有充分的小心的准备，因为此地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戒备的地方。

十二、山西现在是农运的最好时机，我们党部必须积极的普遍的发动与组织乡村的阶级争斗，严厉的打倒地主土劣的势力，解除民团武装，成立并发展农军的组织，确立农会在乡村中的最高权，推翻阎氏在乡村中的统治——所谓村长治，抗租抗税，以至耕者有其田，这种工作做得好，发展得好，便可由此领导起山西暴动。

十三、满蒙交涉仍在进行，张作霖在这个战争危机中，完全出卖满蒙于帝国主义是毫无疑义的，这亦是现在鼓动群众工作之一，此工作在东三省尤特别重要，东三省应使此运动发展起来激烈起来，使之与反抗战争的抗租抗税的农民运动相衔接。

十四、山东在最近期中，须充分准备恢复铁路、矿山、纱厂的工作，至相当程度，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会组织，领导土匪群众和各地小暴动向我们的道路走。抗租抗税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工作是山东能否暴动之前提。

十五、关于口号与国民党政策，中央现在已有所改变，前此所谓仍然要国民党招牌的政策，现已决绝的抛弃了。前此之民选革命政府（北方局通告第五号，誊写人误写人民革命政府）口号，现在改为“农工兵平民政府”，革命委员会即名“工农革命委员会”，工农

军总名为“工农革命军”，各处皆须照此更正。

十六、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与斗争之下，职工运动仍然是极秘密的，工会机关之设立与工会小组之发展，皆应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工会宣传品除工人群众外现在无关所谓城市市民公开之必要，这次北京总工会与铁路总机关之严重破坏，便是因为宣传在城市中太公开以及秘密工作未做好的结果。

十七、在此严重状况之下，党的秘密工作和组织非常之重要。在此严重状况之下，党内生活不能容许极端“民主化”。北局来此之后，将北方过去流行的机械的纪律铲除，同时北京几个少数知识分子便发生极端民主化和不守纪律的恶倾向，这便是此次北京市委被破坏的主因。北局现在严重警告各级党部同志，以后如有上项倾向的同志胡闹时，决不宽容的执行纪律。

十八、铁总北来后最好的成绩是京绥路工作之恢复，可是这次忽遭破坏。铁总目前任务不仅要恢复铁总工作，尤其要充分注意京奉、津浦二路工作，迅速的恢复起来。东三省铁路工作异常重要，铁总即须指派一特派员前去负指导工作之责。

十一月五日

(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 致中央的信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常委及政治局：

以下报告分为四项：(一)直隶最近工作状况；(二)北方局过去工作之总结；(三)×××同志问题(略)；(四)其他(略)

## (一)直隶最近工作状况

森是十二月十八日到津的，翌日与省委常委开会，他们报告我们去沪月余中，只是忙于建立新机关，一切工作皆停顿，并说各处同志反对，省委须迅速改组，故是日即决定改组。同时下层同志确是要求改组。追索省委工作停顿，原因不外下列几事：(1)内部不一致，因对×××不满而消极；(2)北京党案发生及玉田攻城主义失败之后以为无事可作，×××大唱其悲观论；(3)省委初改组工作一月群众是兴奋的，省委也颇积极，后见省委消极，他们则更消极悲观；(4)群众最不满意于省委之专门建设机关及过于秘密的秘密工作，×××主张开会不得过三人，时间不得过……的搬移，犹要先住一天高价的大旅馆并雇用汽车装作赶官上任之排场，群众更不满意；(5)活动分子找不着负责人，他们甚至欲到南北电车道准备去捉省委；(6)始终忽视小的部分的斗争；(7)忽视旧的工会会员及党员之招回，×××一直到最后都说乃于旧的金钱主义

化的工会外找新的直隶工作没有办法；(8)常务委员于方舟、杨春霖在攻城主义之下被捕并被杀。在以上情形之下，不改组是不可能的，此次改组情形，详见省委报告及《顺直通讯》第三期之记事。此次改组虽然还是上层的，然是直接从下层支部(天津如此)举出代表参加的。用改组在工人同志中做了一个很大的宣传，因此回党者不少，例如第一区在初次改组只有五人，此次改组之前有二十余人，经过此次宣传中，恢复到九十一人，皆过去做过斗争的分子。改组之后，天津工人部分的小的斗争业已开始领导了一部分，如津浦路此次的小胜利，便完全在党的支部领导之下做起来的，其他裕之、北洋二纱厂则因支部还不健全，故年终的小斗争是工人自动的起来的，我们只有同志个人的参加。唐山矿工年终并有两次小斗争，一是C.Y.领导的，一是工人自动的，因为各矿支部也未健全，现在天津唐山在组织上的重要任务是要建立并健全支部之作用。各处同志皆不知道支部工作怎样做，是普遍之缺点，省委最近在唐山办了一种短期训练班，选择五矿及铁路工人同志中四十余人(C.Y.占三分之一)分为四班训练，主要的是使他们知道做支部的经常工作及怎样组织部分的日常斗争。此事昨日才毕，故森方才回津，现拟在津办同样之短期训练班。唐山在训练班之时开了一个代表大会，改组市委，委员九人，一知识分子。常委五人，四工人(三矿工、一铁路)，一知识分子。现在唐山工人活动分子已有相当训练，并且很兴奋，以后任务是要建立很好的工矿支部，支分部和小组，以后唐山工作是不难发展的。天津总工会于昨日开代表大会，详情由×××同志带来报告。唐山现拟迅速恢复五矿工会及铁路工会的基本组织，详情由×××同志前来报告。以上是两大工业区党及工运状况。京东在攻城主义失败之后，省委未急去指导恢复，以致农会活动分子多各散五方，党则更没有几个人了。详

情见农运决议案及京东工作决议。省委改组后，在唐山召集京东各县活动分子会，到十六人，农民同志占七人。在此会议中，指出过去一切错误，并规划了发展恢复党部及农运的具体方针。同时成立一京东临时农民总会，出一小油印报，并派人往各处发展农运，待有相当成绩，再开一农民代表大会，现在派人前往各县改组党及发展与恢复(玉田遵化等县)农会组织。保定府各县，最近巡视员回来之后，已决定一保北工作方针，并派二负责同志前去改组党部，发展工作。现在直南至大名磁州一带在战线之下，还无办法，但已写信前去叫活动分子前来津浦各县党及乡村中工作，省委巡视员即将前去。京绥路北段已找得最好的工人同志×××前去改组负责，工作方针前已寄上，现只须恢复南口一带的工作。石家庄一带已派×××××同志前去恢复工作。北京重新登记了四百多人，学生占二百多，其余系工农，现在正在开市委代表会，工作方针见北京工作决议。全直隶共四道，口北、大名、保定、三道皆系战区，京北各县已有八县派人(本地人)前去组织农运。以上系各地情形之大概。总之，过去全直隶没有工作，没有党，更没有工会，纵然玉田各县有农运，但系个人工作，在性质上与土匪的农运无大区别。所谓“党”，从省委到支部，只有一个名称，即未成组织，亦未有经常工作。第一次改组之后，虽稍稍矫正一些，但不久仍然返本回原，现在才开始从各方面企图挽转过来。至于详细情形，可面讯××二同志。对外宣传：唐山《红旗》已出五期，天津总工会出一《天津工人》，京东农总出一《京东农民》，玉田决定出一农民画报。

## (二)北方局过去工作之总结

……(略一大段——关于顺直省委改组问题)

北方局一向忙于改组，对于其他工作怎样呢？我们到北京之翌日，即决定召集一全省农民活动分子会和工运活动分子会，但因无钱，始终不能实行，对于职工运动的恢复，只决定：（1）首先恢复京绥路，因此路还有基础，南口还找得七十个同志，南口以北还有许多有能力的同志；（2）丰台至唐山的京奉路，极力恢复组织，（丰台还有四十人）促起斗争；（3）发展京津的城市工人运动，京总的工作日有起色，同时天津总工会由×××负责，各方面才渐渐找得线索，以前是一点也没有了；（4）注意唐山工作的恢复，原先本想派××同志去，后××为省委书记，乃改派××前去，现在唐山二百多党员及六百多工会会员，是××同志去后渐渐恢复的。对于农民运动则特注意于玉田遵化，故派荷波及×××同志带着新方针前去改组党部和农运。十月十六日荷波由玉田返北京，报告玉田于双十节曾举行一万人以上的示威运动，公开宣传没收土地，荷波亲自参加示威大会，于是北方局决定从北京选择一批同志前去玉田遵化做党与农会的组织教育工作，并军事训练工作，结果得三个军事人才（黄埔生）派去玉田工作。当时北方局通知省委的计划是此三人轮流到每一村的农会主办军事训练班，再由此训练班分发到各乡去普遍的训练农民，此三人是十月十八日去的（后二日又派去三学生同志），其实此日玉田农民已发生暴动，我们在北京不知道（荷波回来只三日），省委在天津也不知道。至于工农日常要求，北方局在第三号通告中即已列举一些具体的口号，要各级党部藉着反满蒙案去提出工农切身利益的口号，去组织工农群众，发展工农组织。关于双十节的第四号通告，特别指明要遵照第三号通告的口号去发动工农起来要求自己的利益，双十节前二日，和森又来天津，督促省委发动与组织此种部分的斗争，是夜和森在省委做了一报告，前一段是关于广东消息的估量，说明前两日报上

所载贺叶消息非常之好，近日又非常之坏，如果失败属实，一定是前方同志继续机会主义的结果，因据所知，说明前方负责同志有继续错误之可能，说明从报纸上由南昌至汕头看不出土地革命的旗帜，只看到一些维持汕头秩序和向商会征收几万元军费的文明办法；中段说明奉晋之战我们应取使两方失败的态度，用阶级战争来反对军阀战争。如果奉方迅速溃退，我们应乘机到北方宣布土地革命，夺取武装；末段说明土地革命的大暴动是北方工作的总方针，现在是向此方针积极准备，主要的是迅速发动部分的日常的小斗争，已恢复与发展工农的组织势力，宣传暴动之必要，并指出如果现在只向工人宣叫暴动，则如前次高叫待国民军来没有区别。在此讨论中，××对于暴动特别表示急进，主张多带军事性质，和森的答复中指明我们的暴动主要的是群众的性质，并且此种大暴动不是从天上可落下来的，是要发动与组织日常的有利的斗争，推动群众向此大暴动方向走，最后×××口头承认不是一声唤可起来，“当然”要去发动小斗争。此时天津总工会恰好在恒元纱厂中有新发展，组织青年工人到八、九十人之多，业已发生反对不良饭食的问题，八、九二日开会二次，决定于双十节大打饭碗，以至罢工，此斗争据××同志告我是准备好了的，双十节午饭时一定发动，我是双十节上午返北京的，并以此情形告知北京市委，促其迅发动北京的小斗争。前此几日北京已做了反对满蒙案的传单运动，将第三号通告中各种口号皆发出，共发了万余标语和传单，我当时在市委批评此次传单运动之弱点：（1）未领导工农群众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只是一部分勇敢的共产党员做传单运动；（2）哄动了一城军阀和军警，民众却是不知道，因为军警在黑夜中已把全城传单标语撕毁了；（3）此次虽然表示同志的勇敢，但另一方面还是表现未了解第三号通告的意义，只是表示自己上街上

散了一次传单，对党尽了义务，却未遵照第三号通告的指示，去艰苦的组织工农群众，提出自己的要求起来斗争，当时市委根据此批评发了一个通告。奉晋之战初起，奉方全无准备，北京摇动，奉拟退出关外，此时安福系国民党互相勾结，并向东交民巷要求帮助，拟于奉退时由王士珍等组织治安维持会占领北京，欢迎段祺瑞进京，他们唯一忧虑的只是 C. P. 乘机暴动，其时南口、丰台、西直门及城内工人情绪皆甚兴奋，所以不及等待荷波之回，即开会讨论时局问题，在此讨论中，对于暴动问题，发现几种意见：（1）认暴动是应立即的军事的；（2）认大暴动起后一切组织工作和小斗争才好做；（3）认我们即无军势，当然以农民为主体，因为职工运动直隶已没有了；（4）市委负责人再三声述，上年五月间×××同志由武汉返后，立即准备暴动，欢迎北伐军之错误，便是把一切经常的组织工作及斗争工作皆停止，全体同志皆加入暴动队，练习军事技术，以至闹得莫名其妙，白白停止一个多月的工作。因为以上种种意见，故在北局第五号通告中特别指明暴动的性质是群众的土地革命的，而不是军事冒险；指明暴动的准备工作是要在暴动之前发动群众纷纷起来为切身的利益而斗争；指明暴动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指明暴动是党领导而不是把党及工会一切经常组织与工作都停止而加入到暴动队内去。唯最后一点说得不清楚是一错误。当我们写此通告时，只见到《中央通讯》第二期，南方暴动的经验及抛弃国民党政策和改正土地问题口号等我们都不知道。故为遵守中央政策起见：（1）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之外，加上一面土地革命的大红旗；（2）于“没收一切大地主军阀官僚土地分给农民与兵士”（最近中央对于东三省决议案亦有此口号，决不可断章取义，指为只没收大地主）之外，加一“农民起来没收地主”（五号之通告中有此口号，中央何以未见？）；（3）五号通告原稿及写给顺直省委的



信，用“暴动起来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后来仍改为“民选革命政府”。

奉军集中高碑店后，北局即令市委以全力注意工农小斗争之组织，并限于一周以内，至少西郊应组织反对一切军事担负的斗争，城内应组织邮差，反对裁员。同时派××同志赴南口，组织京绥路工人向路局提出加薪要求，（此时欠薪已发清）在此期间曾有三次信致省委催促天津、唐山部分的斗争已发动。

……十月廿一或廿二（记不清）党案即爆发……所有北局市委、军委、铁总、京总各机关及住屋无不被破获。

破获后，××和森乃留京恢复组织，找出×××××几同志出来负责。廿三日接省委来信才知玉田于十八日发生暴动。我们即准备去北京找×××××同志来津，在津开一北局全体会议，决定对于时局和工作的方针。十月三十日北局与省委开会，法同志参加，和森提出所拟之第六号通告，××首先表示反对，就说暴动是顺直省委首先建议的，现在不应因奉张一时之胜利取消暴动；他认第六号通告是取消暴动。最后争点集中于玉田暴动失败之批评，他认上次玉田失败原因是未占领县城，建立革命政府；又认现今须立即反攻县城。和森在二次辩论中皆反对他的攻城主义，极力说明现在不能再冒险反攻县城，说明上次错误不在不占领县城，设立革命委员会，而在不应当自溃，不应该不深入乡村打击地主土劣和解决民团。在此争辩中，因赞成××的空气甚浓厚，故未举手表决，和森只好攻击冒险的倾向及攻城主义的倾向，以及只知高叫暴动忽略日常小斗争的倾向之处。语气改缓和些，即将此通告付印发出，×××从上海回后，犹向群众攻击北局第六号通告是取消暴动的。

（上略一大段）……于是北局乃决定派××赴热河。当时决定

的工作方针：（1）四人分二路赴热河，各邀集好的旧同志数人，集中于玉泉×××家，开会议，报告党的新方针，成立热河临时省委；（2）在玉泉、建平、赤峰、西林各处组织县委或特委；（3）召集旧的农工兵同盟会会员，尽量组织农民协会；（4）土匪群众尽量加入农民协会；（5）“没收一切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为主要口号，同时抗租抗税，反对一切军事负担；（6）发展小争斗，准备大暴动。后见×××××等皆幼稚，乃决定派×××同志前去，再召集××开会一次，大体如上列之决定。今附上××报告，以资审查。同时附上北局第三号通告，第四号通告及第五号通告，请细审查是否有玩弄暴动之事。

北局前后工作方针，在口头上及文字上前后是一气的，第六号通告是最后的结束，与和森所拟之北方工作议案是无甚出入的。

（下略）

和 森

一月二十八日

（载《中央通讯》第三十期）

##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我今天发言，尽四十分钟时间，于万不得已时，再请求大会延长发言时间。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及任务。关于目前阶段估量，在国际代表同志报告里，在秋白同志报告里，在国焘同志报告里以及忠发同志报告里，大概有三种不同的估量的样子，现在要把问题首先弄清楚，我的意思有两方面：第一要问什么是革命高潮？革命高潮有什么条件？第二要问什么是革命低潮？革命低潮有什么条件？我以为革命高潮有四个条件。第一有全国普遍性，比如“五卅”运动，“五卅”在上海爆发，即影响到长江流域而两湖四川、珠江流域而广州香港及北方各省而京津满洲里，所以“五卅”运动是革命高潮，因它是全国的普遍性的非局部的，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一个条件。第二有相当持久性，就是说不是运动今天起来，明天就会打倒，或者上星期起来，下星期就打倒，象“五卅”运动坚持三月之久，不是三天或一礼拜的运动，以地域来说，非是这里起来，那里被打倒，非是某一地的单独运动，比如“五卅”在上海起来，香港即发生总罢工，天津组织总工会，一直影响到满洲里，在长江流域运动更加普遍，运动爆发非三两天的事，持久到三月之久，非是上海打倒，香港起来，非是香港打倒，北方起来，而是有相当的联续和持久性，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二个条件。第三运动发动

于大的城市，而且是城市工人的领导，非是单独爆发于乡村。比如“五卅”时上海起来，于是广州、香港、武汉、青岛以至天津，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最稠密人口的城市亦起来，不仅有乡村运动，主要的城市成为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三个条件。第四我们力量在阶级关系上可以对敌人维持优势，使敌人不得不取相当让步，比如“五卅”运动是取得相当胜利，虽然帝国主义有大炮，有陆战队，可以继续屠杀，但是我们广大群众，有广大群众的力量，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不能进攻，我们对敌维持优势，这是革命高潮第四个条件。（同时又可引俄国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二月与十月以至法国一七八九和一八四八诸大革命来证明其具有这些条件）现在拿上面四个条件：有全国普遍性，有相当持久性，运动发动于主要大城市和我们力量对敌维持优势，来观察现在中国局势（注意：这种仅是说拿上面条件来观察现在的局势，而不是要机械的用这些条件去推测将来的高潮。）是不是革命的高潮呢？就是说是不是存在有上面的形势呢？即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近各处澎湃的农民运动而论，是不是革命高潮呢？这显然还不是很的。第一，没有全国普遍性。如果广州暴动胜利，那一定是全国性，那一定南方各省农民运动更强大有力，那一定有“五卅”的形势，那一定有北伐的形势。第二，没有持久性，广州暴动胜利只维持三天之久，没有如“五卅”运动维持三月，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第三，没有各大城市发动，虽然广州是大城市，但只有广州，无别的城市之继起，无别的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城市起来。第四，在势力与关系上，我们没有对着敌人维持相当优势，可迫得敌人失败或让步，广州失败后，全国反动力量一致团结向我们进攻，虽然这次暴动取得相当结果，是不可否认的，从上面所说来看，“八七”以来不能说是一直高潮，只是旧的高潮趋于结束的过程；另一方面看，即不是

高潮，是不是低潮呢？从武汉政变和国民党决裂到现在，是不是革命潮流低落呢？这里首先要问什么是革命低潮？有什么条件是低潮？看中央十一月会议决议说，革命低潮的条件在于1. 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2. 改良政策之得以实现。就是说统治阶级，南京国民党新军阀的政府能解决社会矛盾、阶级冲突。3. 革命群众的分裂和失败。就是说群众失败，工人离开、农民离开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如已离开我们，要它再起来，是困难事情。有些条件，是革命潮流低落的表现。在秋白同志报告中对低潮条件中曾指出：

1. 广州暴动失败非全国失败，非最后一次失败；
2. 广州暴动之后，不但农民未离开，工人未离开我们，且相当的跑到我们这边来；
3. 广州暴动取得新的军事经验；
4. 广州暴动失败后，非仅全未脱离暂时经济恐慌，且长期经济恐慌，不能用改良方法来和缓革命。

上面所指的不是什么新的，与中央十一月会议所指低潮三个条件，内容无大变化，拿这些条件来看现在状况，是不是革命低潮呢？据中央政治问题和秋白的分析结论说，仍是“一直高涨”这种分析，我觉得不妥，是没有明确的观点。为什么中央政治局和秋白同志有这种分析呢？这种分析是从不间断革命的理论来的，什么是不间断革命论和其对党的影响，以后再说，其实中央十一月会议所指出的三个条件和秋白所指出的四个条件，只能用以论证中国革命向前进展和高潮有再来之可能，而不能用以论证现在是一直高涨，从这种分析，论证革命不会停止且继续前进，用这种分析去反对取消派的观点是对的，这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假使以此为一直高涨之论证，是非科学的，非列宁主义的。我

以为应如国际代表同志所说，现在革命形势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这样分析，是非常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对于革命潮流估计大意是如此。

再说革命潮流一直高涨与直接革命。从“八七”到现在，中央政治局维持革命一直高潮的分析。这种分析是非列宁主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间断革命论的分析，是在“八七”后大毛子那米拿则同志发明的，“八七”以来党所采用的。我所说当然非反对那米拿则同志个人，他个人于“八七”以来很有功绩，但他所发明的不断（革命）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这种理论可从中央的文件中看到。“八七”以来中央采用这种理论，没有摇动过，这次中央报告仅是一线的。在秋白的报告中到处找得出这种理论，现在仅举一个文件为例：在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中，都见不断论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否认有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只认为有单个资产者，没有整个阶级，十一月决议上有一段说：“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间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制度的历史的改革意义上，是最幼稚的，最薄弱的，最无能为的”。是“历史上未成熟的流产的胎儿——中国资产阶级，他一定不能组织自己的政党，自然也就谈不到什么确定的有原则的政纲”，这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只是胎儿，且是未成熟的流产，根本否认有资产阶级的存在。第二个特点，否认中国资产阶级有反革命的作用，否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的，自上海武汉政变以来，在上海、长沙、武汉、广东的屠杀，在其他各地的屠杀，试问一问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是有一点成绩？广州暴动失败后杀了多少人？马日事变又杀了多少人？各地革命运动受反动势力何等的打击？这是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点成绩？而那米拿则同志抹杀一切说毫无一点成绩。其次只说反动营垒内的分裂崩溃，而没有团结集合的可能。我们看四月和七月政变以

来，反动势力的范围缩小抑是扩大？在未反动前，我们未失败前，反帝国主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维持着对敌相当优势，后来不仅小资产阶级跑开了，即兵士、小商人亦走到反动营垒去了。如果反动势力范围缩小，那它的团结范围也要缩小，事实上不是这样，反动势力的范围的确是扩大，不是缩小。第三个特点，农民的观点，中央十一月决议上说：“现在中国所有各省农民的怒潮的高涨，就是这中国革命不断性的最好证明”。这就是不断论的革命的社会基础。不断革命论社会基础，建筑在农民不断暴动的观点上，这种理论，非那米拿则个人的，而是领导和指挥全党，连我们也包括在内。这种理论支配着“八七”以来党的政策路线和党的组织路线。这种理论一系统下去，因而估量中国革命有一直高潮说法，这样所得的结论，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辩证法的？不是的。因为革命潮流不是按照一个直线进行的。结论的根性适违反辩证法的，这样分析将使我们找不出斗争的要点，找不出每个转变时期策略运用的基点，那时应进攻，那时应退守，都无一定了。这种理论下来是唯心论，唯心论的分析在秋白口头报告中即表现出来。如同说假使估量现在革命潮流在两个高潮之间，结果会走到怀疑上去，会这样怀疑：高潮几时来？是不是没有高潮呢？象这样说法表现唯心倾向，他以为如不估量革命是一直高潮，会有右倾危险。这是不对的。右倾危险，取消主义的各种倾向，非是主观的维持高潮，或“一直高潮”论所能挽救的，右倾危险非唯心论的分析所能预防的。事实上几几相反，因维持这种分析，这种估量，反使党的领导摇动，非发生机会主义危险，即要发生盲动主义危险，使全党同志不知怎退守，不知策略运用，这样可使党消灭，使革命再遭几次大的失败。对于这点是应唤起大会特别注意的。

第三是要说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问题。自然有了刚刚所说的那些革命不间断的理论,革命是一直向上高涨,各地的农民暴动是继续不断的发动,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一般直接革命形势的证据。秋白同志的意见,自然会认定是一直高涨的革命了。但反对这种意见的人,例如国焘同志,他是完全否认一切真革命形势的。因此,大会对这问题,应该有正确的决定。我想要决定这个问题,应该首先问到,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不有一定的范围?这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仅指地方的部分的而言?是应该建筑在农民的暴动基础上,还是要建筑在全部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基础上呢?这些很简单明了的问题我想是谁也可以答复的。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还有他发展的特性,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回复到极右的道路上去。的确,我们看到了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向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各地的农民斗争及情绪的高涨,和敌人方面的士兵开始部分的跑到我们这边来,这许多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有些地方的确维持着直接革命的形势,有些人完全以盲动主义去否认这些斗争高涨的形势,当然是不对的。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的。而秋白同志他却说有的,这就是他的“唯心论”所分析而得的结果。自然我们如果说完全没有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对的,是要走到极右倾的道途上去,但是绝对不能认为是全部的直接革命形势,因为如果是这认法,我们就只有是立即暴动,我们就不能不走到盲动主义上去了。

现在要求讨论秋白同志书面的及口头报告中的阶级关系分析是不是对的。我可以说秋白同志的分析方法,完全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不断论的分析,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是看见敌人



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有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这种观点的分析,是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非辩证法的分析。这种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八七”以后,支配了全党,我自己当然也在其内。我以为大会应该与这种不正确的非马克思、非列宁、非辩证法的分析方法作奋斗的。中国的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本来不是马克思的话,可是他的意义,在估计作战的胜败时,实含有马克思的观点。我们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我们一定要能够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我们也应该估计我们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不啻帮助了敌人来消灭自己。我们在秋白的报告中,只看到敌人如何薄弱,如何不能稳定,如何的他们改良主义不可能等等。我们从没有看到他说到敌人攻下了北京以后,阶级关系的对比会怎么样?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变又会怎么样?在洛阳事件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会怎么样?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变又会怎么样?关于这些大的事变方面,总的趋势估计方面,秋白在他的口头报告,或书面报告中的确回避了,抛弃了。我们在秋白的报告中,只得到一个很普通的简单公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是成了事实,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中间的矛盾,他们当然不能够统一中国”。这种普通简单的公式,谁也不会否认他的,可是我们要问问敌我的对比究竟是怎样?反革命势力的团结是向强的方面抑是向弱的方面?我们应该采用的新策略是些什么?这里就实在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这里实在不能使我们很有保证不再走到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途上去,要保证不再走到歧途上去,就只有更明白的指示出来争斗的总形势,仅仅一点简单的公式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秋白又没有指明我们自己的强点和弱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什么?在他的报告中最回避最忽略的就是大工业区域大城市

的真实情形，完全没有说到。在这里当然要承认党在“八七”后，我们有伟大的成功，取得了农民群众的领导，取得了许多农民成分的党人。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城市不能与农村发展作对比，城市方面，除广东外，其余可以说都消沉下去了。这些重要问题，秋白都把他丢掉了。试问忽略这些，怎能了解目前的中心任务？怎能决定我们现在的策略？虽然，秋白也说过要注重群众，但完全没有说明此问题的严重的实际状况和意义。这样，必然要使同志不能明白国际决议中所谓夺取千百万群众的重要。现在的问题不只是照着国际决议唤几声夺取千百万群众的口号就够了。

说到党的任务。刚才我们已把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说过了。在这里我要首先提出两个问题来要求答复：第一，是暴动策略的路线是不是要根本取消？这问题是要请国焘同志答复的。（国焘说：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第二，要问怎样去暴动？暴动的意义现在是怎样呢？是不是象秋白同志所说的暴动是夺取群众的方法？这当然不是的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暴动意义是应更进一步的了。我们现在说的“暴动”是要最后的打倒敌人，推翻敌人的统治，使统治阶级再也爬不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到底以后要怎样暴动呢？是不是继续做不准备的暴动？只限于农民的暴动，盲动主义的暴动，命令式的暴动？不是的。然而这种不正确的暴动倾向，这种盲动主义的危机现在难道完全没有了么？不！还正在发展。秋白说：“盲动主义的危机现在已经减了，请布哈林同志放心”！这是不对的，我的意见与他相反：我以为大会应与这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严厉的奋斗。关于这点，以下讲到党的倾向时再说。

说到群众运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规定一个大概方向就够了，也不仅拿国际决议案之所指就够了。而且要在策略上组织

上和工作方法上很具体的讨论出系统的路线，国焘在谈话会上说到所谓少数运动，立三、秋白反对所谓合法运动，（国焘是不承认这个名词的）关于此问题隐隐的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但皆未把他们的路线充分发表出来。其实这问题是很重要的，不仅是一个夺取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且包含不同的政治倾向的问题在内，我自己尚没有固定的意见，因为时间所限，说滑头一点，到将来第二次第三次说话时再来讲吧。（大家笑起来）

现在来说第二类问题，即过去的教训。这一点，布哈林、国焘、秋白都说得很多。秋白与国焘同志所说，我是有点不同意的。关于过去理论方面的教训，他们算是说了一个大概，我现在说一说当时的事实，即机会主义在武汉时代之一般的经过。首先我要声明的，我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我今天是向大会以“机会主义者”的负责资格来说明机会主义的一般经过，而且偏重于武汉时期，在此以前的错误只附带说明一二。秋白以为机会主义是从第三次大会发生的，因为第三次大会为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倾向，就是一主张加入国民党，一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事实不完全如是，因为第一，自从西湖会议（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后，经过很坚决的反对李汉俊、陈公博、施存统等的不加入国民党的观念，到三次大会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已经不成争论的问题；所争论的是关于C.P.政治面目和劳动运动的独立性。当时孙中山对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当时我们要问一切劳动运动，是不是也归国民党？我们对各种政治问题，可不可以单独发表宣言？依马林，这都是可以归国民党的。独秀及秋白同意于马林的，我和国焘反对得很坚决，因为当时的劳动运动，都是

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认为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张。马林、独秀等在解释此策略的理由时，确是很右，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和C.P.之存在是很悲观的。我们听了以后，益发加紧反对，秋白以为是先有左的倾向以至引起右的倾向，这与事实是相反的。第三次大会闭幕时，还有一个废督裁兵，开国民会议的问题，我主张用C.P.名义单独发宣言，马林开始还不甚赞成，可见当时的争论与争独立的批评和存在问题有密切关系。自然，两种倾向都有错误都是很幼稚的，特别是我的左稚病，当时我说的话最多，偏于认定资产阶级革命作用是怎样薄弱的，是怎样没有力量的，这当然是错误的了。可是另一方面如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些原则上的错误。不过这也还谈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我们举一例子，象“五卅”运动时期后，我们党的政策，的确是正确的，的确能够动员群众，的确能够推动革命的发展，的确能够建立了党的领导。所以我对于秋白的话，说机会主义是从第三次大会一直贯下来的不能同意。独立批评是我们联合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关于这问题，后来中央又与鲍罗廷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我们中央的机关报《向导》从第一期到“五卅”时期，对国民党都持一种独立的批评态度，不过有时太偏于狭隘的独立性了。在商团事件时对汪精卫、胡汉民等的犹疑态度批评得很厉害，当然这些批评有些是不对的，譬如反对孙中山北上是很错误的。可是自北伐以后，革命愈发展，机会主义也随着发展，批评态度也放弃了，独立也渐渐的放弃了，甚么都要顾及到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那时是鲍的错误，中央是对的。那时孙中山、胡汉民等为了党国作用的问题，利用右派来反对我们，最后他却以国际联席会议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高机关，要求中国C.P.一切决议及

第三国际一切训令文件都须先经过此委员会，在此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管理之下——这个性质就是国民党管理C.P.而我们丧失独立与自由。当时中央是完全反对这种意见，与鲍冲突的。老鲍初来中国时，是继续越飞马林的路线的。这一点秋白同志也是记错了的。再是关于保留产业工人的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的错误，在当时还不是甚么机会主义，到现在来找线索也或许可以说是机会主义。国际为了这个问题，派了伍庭康来开五月的扩大会，在五月扩大会议上，修正三次大会的决议案，决定保留产业工人，在国民党中央则注重政治宣传而组织工作次之。这都是修改三次大会决议的。对于团体的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一九二六年底国际还未解决此问题，当时 правда<sup>①</sup>报上是有文章反对的，但我们是赞成的。总括一句，这些以前的错误还未成系统。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三月廿号事变前后起来的。

现在说到武汉错误的经过。就是说当时机会主义是什么？机会主义的政策是什么？机会主义在各方所发生的理论是什么？

第一要说明北伐政策和西北学说。北伐进展到了武汉的时候，就发生继续北伐，或到东南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形式上，是一个北伐或东征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个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根本策略问题。对蒋问题，在广东区与中央是不同的。广东是主张倒蒋，中央是犹疑的。当时这问题的主要支配者是老鲍，老鲍主张反蒋，是老早就坚决的，而且他是土地革命的最先主张者，在当时他的确是左倾的领袖，从三月廿日以后的时候，只有他了解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中国党在那时是没有一个人懂得的。但最先觉得不能实行土地革命的，也是老鲍，当时中心问题在倒蒋，他到

---

① 真理报。

了武汉后，深觉得倚以倒蒋的力量——唐生智之不可靠，以为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即要与唐决裂，于是才发生所谓西北学说。他看到资产阶级的叛变，他看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加强，他所以主张北伐将冯玉祥接出来，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西北是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地方，土地革命俟打下北京再实行。西北学说并不是他的一个观点空洞的抽象的学说。乃是一种机会主义实际政策的大系统。北伐问题是在五次大会前一句讨论与决定的。讨论时有四派意见。一是鲁易的南征意见，这是平山及国焘同志所同意的，后二人之主张是偏重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的。二是鲍罗廷、独秀、述之的北伐意见，即打下北京再说土地革命。三是秋白的由南京而北伐的意见，就是经过南京再北伐。四是我的意见，我也主张北伐的，但要有四个条件：一，是要国民党在两湖及其他领域下实行土地革命；二，是改革国民革命军，取得兵士群众的领导，夺去将军们的军权；三，是改革财政将财政负担移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及某几种必要的没收与管理；四，巩固后方的各省，肃清后方的反动派，尤其巩固两湖。后来曾宣布迁都南京，可是南京已失守了，所以仍是实行北伐。西北学说来说，第一，实际政策是回避土地革命北伐；第二，是对反帝国主义和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实际就是整个的让步政策，这也是在五次大会前决定的。我记得在五次大会前日，在老鲍家召集一个会议，以鲁易共同的名义提出一个决议，就是决定向帝国主义退让，内容是，取缔一切所谓过火的群众运动。老鲍向我们作了一个报告，说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好，不象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恰好当着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不能联合起来压迫革命。中国的国际情形，则完全不同。他引了列宁向德国缔结条约的事证，说明向帝国主义让步之必要。当时向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我们可以说是对的，但错在他的解释和具体的方法。他的理论的解

释是反对工农运动的过火，尤其是码头工人，运输工人。他说他们敲外国人的竹杠敲得太厉害，平素只是几角钱，现在就敲几十块，因此外商跑了，帝国主义就马上借口来干涉。他说我们要向这些商人让步，这不是向帝国主义让步，向商人让步是必要的。这里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把帝国主义与商人分开了，这就根本忘掉了帝国主义与外国商人的本质。他说敲竹杠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是流氓的利益，要维持工人阶级的利益即革命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取消流氓的利益。我们现在来想想，这是多么错误的！他又说到，店员太过火了，他曾举了例子，说酒席馆中杀一个鸡，店员要把肉分去，这也是流氓的利益，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复次指示湖南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过火，因为当时湖南的革命群众曾自动的起来没收洋油公司，赶走一切的外国商人和许多直接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当时汪精卫、谭延闿、陈公博尤其是顾孟馀都大骂起来，反对湖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他们深怕帝国主义就要借口用大炮来扫射。老鲍也跟着他们来反对，也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在此决议上决定停止一切直接反帝的群众行动，以后一切外交问题皆须听国民政府及其中央的命令，群众不得有所行动，这便是所谓国民党的党权和领导权。此决议通过之当日，即派夏曦回湖南去（不参加五次大会）取缔一切过火的运动，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要听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和指挥，这是西北学说——即机会主义的大系统，这一大系统是在五次大会之前成就和开始实行了的。

现在很简略的报告五次大会的经过：

鲁易在五次大会中攻击西北学说，可是大会群众完全不知这是什么一回事，因为这些学说和实际的争执只有几个毛子和中央的负责人知道一点。五次大会闭幕后，鲁易在政治局提出的第一个政治决议案是有名的对小资产阶级、国民党诸问题的决议案，这

一决议实际是完全西北学说对小资产阶级让步政策的。这一决议扩大到对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家属”的让步，扩大到取缔城市工会的专政倾向（指逮捕反革命及工会武装等）。由此两让政策（对帝和对小资）遂成为中央政治局之天罗地网，完全支配以后三个月中的机会主义溃退生命！五次大会形式上接受国际决议——土地革命，现在第一个议案便不是讨论怎样实行土地革命，而是决定怎样向地主阶级“革命军人”和所谓小资产阶级让步。

五次大会闭幕不到二星期，五月十八夏斗寅在鄂叛变，许克祥在湘叛变。此时老鲍的办法是同谭平山等亲自赴湘查办过火。鲁易呢，没有提出办法。政治局中，我与立三、国焘，胡乱提出这办法，主张立即调动与集中我们武力于湘鄂路，迎头痛击夏斗寅，同时发动武汉民众势力，扩大纠察队武装，起来肃清反革命，并准备夺取两湖。此主张实行了一部分，把夏斗寅打退了。鲁易在此时为党作了一宣言，里面说：现在农民运动的过火是湖南农民自做出来的错误，不是中国C.P.做的；中国C.P.不仅保护工业利益，而且保护小资及中等阶级的利益，号召中等阶级不要听夏斗寅的煽惑。这是党内承认农民运动过火的第一个文件，把退让的范围扩大到了中等阶级！

其次说两湖问题与东征。两湖问题老鲍与鲁易是同样忽视的，因为他们二人“革命根据地”的对象都不在两湖，而在西北或广东，所以一个始终要北伐，一个始终要南伐。当时我在中央常委代理秘书长，曾经写了两个关于两湖的决议，主张组织与发展群众暴动扑灭两湖反革命，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两湖问题，农民自己动手没收土地，发展我们的武装势力，及广大的下层国民党组织，准备实行改组与推翻土豪劣绅包办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所以当时对于马日事变是激烈的主张积极的反攻，而反对湘省委及中央特派



员李维汉同志合法的溃散主义的<sup>①</sup>，因此遂与国际代表组织了湖南暴动之特委。可是后来毛子听了些非正式的报告，以为我们在湘的势力完全没有了，于是一文也不肯拿出来。恩来与鲁易大闹一顿，即取消此特委。于是反攻政策遂成为白纸黑字！

郑州打下之后，中央政治局又来讨论北伐与东征问题。此时冯玉祥高唱宁汉合作共同北伐，并且反共态度已明，老鲍与独秀都已深悟前北伐主张之失策。所以此次讨论分三派意见：独秀、立三、秋白主张东征，鲁易、平山仍主张南伐。我对于以上两主张都反对，以为放任两湖反革命不解决，而高唱南伐是不可能的；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伐来伐去，我们得不着什么，现在我们做一出路，在肃清两湖反革命，巩固两湖为我们自己根据地。这是讨论东征问题的经过。

复次说政治局的后一阶段，即鲁易提议进攻的经过。郑州下后，张发奎、唐生智自动回军武汉，独秀很欢乐，以为冯玉祥所唱之共同北伐计划已被打破。当时鲁易作一相反的报告，指明反革命四面进攻的危机，现在只有反攻才有出路，于是提出武汉总罢工，表示反对国民政府庇护反革命，要求枪毙许克祥，讨伐朱培德等。当时我为鲁易的演说所激，曾热烈赞成此反攻政策，并提议扩大其意义，即积极集中两湖势力，以下层群众力量实行推翻国民党中央，同时准备与之作一公开谈判，揭破其假面具，当时多数反对，鲁易强迫付表决，勉强通过，可是通过之后，自老鲍以至工运负责同志皆认为荒唐，以为总罢工即要惹起大屠杀，下层会议，原案全被推翻。自此之后，鲁易便只有把国际密电送给汪精卫去看了！

以上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之一般经过。机会主义来源是与

---

<sup>①</sup> 此参见本书第78页注<sup>①</sup>。

阶级关系，尤其指导机关内之成分有密切关系的。党内不仅有小资产成分，在工运初起时，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左的分子也曾跑到这一方面来。武汉机会主义之不能挽救与党的组织有很大关系；假若有相当的民主化，假若指导机关不完全与党员群众隔离，假若其中有工农分子参加政策之决定，我想当时机会主义决不致一任其如此发展即不可挽救！当时仅只C.Y.中央有点反抗的声音，而不能听到下层党部群众的反抗。后来有人以为C.Y.中央的反抗是偶然的，实际不然，因为他们每天所接触的不是汪精卫等而是最革命的青工童子团，所以他们革命的直觉未被麻木。

现在说到“八七”后盲动主义问题。“八七”暴动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是在执行和估量时局方面犯了很大错误。盲动主义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而主观的原因即在于中央不断革命不断高潮之错误的估量与理论。不断论轻视敌人力量，只看见敌人之弱点而忽视其强点，夸张自己的强处而忽视自己的弱处，由此必然要产生盲动主义。“八七”后第一个政治任务决议上即是如此，以为凡是客观上可以暴动的地方都应立即暴动，而不顾主观条件之如何，湖北秋暴的小册子中，可充分表现命令暴动，定期暴动之写真，下级干部因主观力量和准备缺少，而延期暴动者皆受“机会主义”之责罚。广州暴动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当然不是盲动。可是其一般之政治上的准备也是不充分的，如上海各处都未准备几分钟的同情罢工。暴动的观念，自中央以至地方都是不清楚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才稍明白，才定出条件。中央先发现盲动主义并先起来纠正错误也是事实。可是因为中央整个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不断高潮的估量始终没有改变，所以对于盲动，虽然有部分的零碎的纠正，而一般盲动主义的倾向和助长此倾向理论与精神，始终不能挽转过来，即中央本身亦是如此。如秋白书面报告的精神和估量时局的结论——

直高涨，仍然要使党不能脱离盲动主义的路线。

最后要说党内倾向问题。我们现在可向大会公开宣布“八七”以来我们很快的制胜了机会主义，这不是说“八七”后机会主义已完全没有了，将来也没有此危险了，但是我们却是制胜了，机会主义要想再抬头，我们纵然还无充分保证，可是至少也不是容易的了。

现在摆在大会前的危险主要的是盲动主义。我不同意秋白意见，他以为现在盲动主义已减少了，不成问题了，“布哈林可放心”这句话值得大会严重的注意呀！大会固然不应放松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尤不应放松左的盲动主义。怎样能制胜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呢？第一，要肃清一切国民党的余毒和传染，即命令群众，党权万能等。第二，就要肃清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不断高潮的分析方法。我们不应以为不断革命是一个名词，无关重要，这个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我们的党是很危险的，这种观念，这种分析方法，已普及全党，至少也是普及全党之干部，不铲除这种不正确的理论不能肃清盲动主义。我提议大会要铲除过去一切不好的遗传，尤其要打倒不断革命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署名，二十九号）

##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 农民土地问题时的发言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

我很简单说几句，第一，土地关系。土地关系的最后趋势没有指出来，报告中只从静的方面分析，没有从动的斗争方面说。静的分析是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多，结果垄断土地中国情形与俄国不同，从静的分析确是如此。土地关系随经济关系而变更，应大略的指出趋势。土地集中，集中到地主手里，集中非资本集中，历史上事实是如此。我们要问现在是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停顿？没有向前发展的因素，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影响乡村的土地关系，使土地关系起变化，走向一定趋势，这趋势即资本集中现象，事实已有过，但发展不多且慢，趋势已有，如垦殖公司、牧畜公司、南通大棉花场都是资本集中的表现；另一方面军阀收买土地数量甚广，成大公司性质。第二，豪绅阶级问题。土地问题决议案说到豪绅资产阶级，又有资产阶级地主，是不是豪绅地主成独立的阶级呢？秋白分析中又分成两个阶级：豪绅阶级和地主阶级，我以为豪绅不能成单独阶级，因豪绅是地主在乡村的政权代表，农民运动开始反土豪劣绅是要夺取地主政权，农民打坏民团起而夺取地主政权，农民反对地主为的要夺取政权，打民团能得到分配土地，二者都是土地革命现象不能分割。第三，乡村雇农与手工业工人问题。我以为乡村雇农与手工业工人应取一个看待，不能分开，在乡村主要力量是乡村无产

阶级——雇农和手工业工人，雇农数量不大，手工业工人数量则甚多，这个数目非乡村无产阶级之外的，而是在其内的。雇农和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应使联合甚至成一个组织。第四，富农地主问题。整个斗争分二方面：一方面反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反地主和军阀。从整个战线看，整个富农他似可维持中立，但另方必须见到其危险，即土地革命急剧进行，他有迅速反动的可能。第五，游击斗争方面，这个问题在策略上主要的问题首先要问游击斗争方式是不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主要方式，不但在南方，北方亦如此，以事实看，无论那地农民运动起来很快的转到武装斗争方面，阶级斗争一激烈，一定向这方面走，现应分几方面来看：

(1) 游击斗争与过去零碎斗争方式已改变，零碎斗争易被敌人分段击破；(2) 游击斗争得到的是什么？从前说大一点游击斗争得到割据局面，现在切实说得到建立红军，得到使敌人军队瓦解，这不仅在组织农民武装和建立红军而已，现在的问题在游击队斗争的出路怎样？过去认割据局面有可能，现在认为成问题，我以为这是有几方面关系，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与军阀统治有关，再游击斗争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看我们本身与敌人阶级力量的比重怎样，如果游击斗争有广大群众发动，那末夺取城市可以干的，比如东江海陆丰斗争大家所知道的，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反动势力的压迫，虽然说反动统治不稳定，所以取得城市保持永久存在是困难的，如国焘同志刚才所说的关于扩大农民革命的宣传方面是对的，使农民知道没有城市工人起来做中心，则农民斗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不推翻，农民斗争的胜利亦是不可能的，如果割据有广大群众能发展是要得的。这里讲到土地分配和政权问题，我不同意国焘的意见，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

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在没有全国工农政权建立或几省的建立,国有土地是不能的,因而禁止土地买卖的问题现在无提出之必要。

(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署名,二十九号)

#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 职工运动问题时的发言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同志们!

1, 我对于职工运动决议案草案大体是同意的。这次大会上指出党的策略上盲动倾向的危险, 同时在职工运动中指出委派制、强迫罢工等的危险, 这些危险是使党与工人群众隔离, 群众的斗争情绪亦日益减低的主要原因。我们更应指出这些不好倾向的来源及经过等, 使一般同志了解, 在目前这些不好的倾向的危险仍未解除, 还应迅速的坚决的挽救过来, 对于决议案的前八段, 我觉得对于过去缺点一项说得很少, 应增多上去。

2, 过去对职工运动的目前状况和将来趋势, 无整个观念, 在工作上感觉到很大痛苦。我们在国内总是估量反工会力量过少, 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发展的可能, 以前是这样想, 现在认为不对。格勒尔同志很明白指出中国改良主义有特殊的中国形式, 虽不能同西欧改良主义一样的有影响有力量, 但是在一部分落后工人中, 有相当的作用。如上海的八大工会, 不能简单看是一个空机关, 没有一个群众, 这样看是不对的, 同时在现在秘密条件下, 我们与群众接近困难, 现在情形不比从前, 国民党对群众的欺骗, 给以小惠, 是有可能受影响的。国民党收第一批工头, 在群众中活动, 这些我们应当注意的。

3, 新的组织方法, 我以前有的怀疑, 对一个工厂有几个系统组织, 使群众弄清楚, 现在细想认为大体对的。在秘密状况之下, 工厂委员会可以适用的, 能取得广大的下层群众, 当然组织工厂委员会不是机械的。用一切机会用各种方式, 来运用工厂委员会, 取得群众, 现在问题是在同时是不是马上组织工会的工厂支部, 我以为不必是马上组织工会支部, 因为组织秘密工会支部不是短期间可以成功的, 事实上不能马上组织起来。必然的在斗争过程中, 取得群众中的中坚分子团结起来, 同时把工人中先进分子吸收到工会支部中, 这是秘密工会支部的基础, 只有这样才能在组织上建立赤色工会的系统。

至于关于过去委派制等错误, 估量是与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有关的。有的说这倾向在党的开始时, 在党的历史上即有的, 我以为这样说法是不正确的, 机会主义是在“五卅”斗争中发生的, 同时委派制等亦在机会主义发生后形成的, 在党的机会主义时期, 什么委派制, 命令主义特别表现厉害。“八七”以后流行的盲动倾向, 忽视城市工作, 增加个人恐怖的手段, 这是与盲动主义有关系的。

(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署名, 二十九号)



## 关于顺直问题的口头报告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

**附注：**此项报告用常委会记录整理后到本刊付印前交和森同志修改，和森并未修改，又另作一书面报告，但书面报告与当时口头有很多的差别，故将口头报告一并发表。

我对少奇报告大体同意。在我未报告之先须先声明的：今天的报告不是答辩的性质，因为答辩可以掩蔽过去的错误，得不到真正的工作出路。我的报告分三部分：1，北方工作的总结；2，我在北方工作的错误及提出的具体办法；3，以后北方工作的问题。

(1)北方局是去年九月到北京，到津而京。此时北方的状况，天津仅仅一工人且尚找不到。北京比较好一点。外埠更无组织。京绥路工人××反了党，重要的是王藻文。原因是于他们以为北方党是知识分子把持了。北方铁路工作整个停止了两年，工运北方不起来，农运亦没有。同时还有党的纠纷，同志反对省委，省委与他们的关系非常之坏。反对省委之事实还是述之未到以前就开始。北局去时秋白与我们讨论，要北局去调查。并告诉我们述之不作书记，我同荷波去后即分发出去调查，荷波调查天津唐山等工人。当时唐山曾有同志以菜刀杀负责人的事实，负责人非常腐化，不能而且阻止工人斗争，唐山还有闹经济问题的事实。京东农运是几个同志领导起来的，有三百群众，但京东无党的领导。山东情

形昆弟去巡视后报告说，山东党有了五个月无工作，群众要求斗争，济南工作失败后从未恢复，此时我们决定派人到京绥路去找反省委的人王藻文与张抵升，张未找着，王找着了。藻文作了一报告：当南口退出后冯玉祥要他去当交通队长未去，党令他离开也未接受。后阎锡山到被捕，七月放出，找到一部分同志，并找到了省委。时述之已到，述之、为人等商后答复他说：京绥已另派了人去。当时省委对西北的工作方针不正确，失业问题党是不能管。因此省委与王藻文决裂了。王回后作了一个反党的大宣传，此时荷波等与他谈后，他表示既中央到来，他愿停止反党宣传并完全听党指挥。北方局以为还是可以恢复王藻文的工作——到天津作一部分工作。同时认为省委的处置亦不对。其次说到第一次改组问题。当时同志均反对省委，荷波调查了一些材料。天津仅胡茂公可以作一点工作。省委对学生运动是在天津办一学校，找不到学生于是命令北京派了十个C.Y.同志入学，工运省委亦未作。述之报告武汉中央的政策太左了，并说革命已到地下去了。第一方面他表示第三党必然发展，于是省委都动摇了。秘书某因此而请求退党。另一方面在北京也得到一些材料，述之在张有第三派的组织，钱都用在机关上，因此北局开会决定要改组，事实上北局开会时述之等即表示不能即改组，后要他们到京开北局会议也不到，在北局开会时，荷波即主张完全改组，我及昆弟则以为述之仍应在省委只不作书记，伯庄则调山东，为人则参加满洲临委。不过荷波仍主张对述之问题根本解决。会之次日省委即来一信说省委自动开一扩大会，大家即以为是省委避免改组。因此决定仍是开改组会，并决定就是在省委召集的会中改组。后北局又开了一次会，有京津的活动分子参加，省委同志均参加，会中首先提出改组问题，述之主张自下而上改组，最后仍决定改组。对纠纷问题，北局会议判断省委错误要

多些，自然同志也有错误。最后并批评省委政策的错误，决定改组及人才之分配，此次会中详细讨论了“八七”会议的决议案，述之对几个主要问题仍表示其有错误。改组会的成分是就省委召集的扩大会代表而由北局加了几人，述之宣布开会时仍说是扩大会。荷波才上去报告是改组会，于是当时另推荷波作主席。我作了一详细报告，并对省委批评，最后提出一决议案。会先即决定要找工人出头负责，北局更是找暴徒出头负责的观念，事先即决定朱景堂参加省委，后因述之在会中表现不好改以他担任书记，改组结果举出了十三人的省委。知识分子仅七人，改组会中对各种工作方针有大致的讨论，北局初到，各种情形都不清楚，于是北方局曾议决召集一个工人活动分子一个农民活动分子讨论后才起草工农运决议，省委的先恢复党后恢复工运的意见北局是批驳了。改组会决定铁路工作首先要注意恢复京绥，因为五大铁路仅京绥可找到线索，可以找到几十个活动分子，南口还有几十个同志，且能开会。京奉要注意整顿党的支部，慢慢的发动斗争。时京浦路有一斗争，即派昆弟去京浦路要注意恢复。对农运仍无材料，不能作一整个决议，仅对京东农运有决议，指示京东农运无组织基础，决定马上改组，扩大农协的组织与宣传提高农民阶级的意识，大的方向不出“八七”会议的决定。京东农运决议未写出。现在谈到政治的错误。省委改组后即举行北京、唐山的改组，次京东改组，京东改组建立了一个二农一智的常委，并对过去也有批评，并借双十节号召了一个百多人的群众大会，提出没收一切土地赞助贺、叶的口号。北京市委改组时决定要吸收工人同志参加指导工作，选举结果是一工人同志当书记（原是南口书记），并举出了几个新的分子，改组后发生了战争的问题，盲动主义自北方始，当时统治阶级动摇是实，但未估计到主观的力量，于是决定了暴动的政策，发出了通告，十一月才停止了

这个盲动主义的通告。当时省委的暴动精神也是非常厉害的，以为一切要走到暴动。现在我说玉田暴动，荷波去巡视时即有一个布置，曾派人去开军事训练班。玉田暴动结果是失败了，不久北京又有一个破获，十一月北局发出了第六号纠正盲动主义的通告，时述之还主张要继续暴动，我反对，结果是意见勉强通过，时毛子去北方告诉开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此时北局未接到中央的文件和通知，此时北京遭了破获，北京破获是由于党内纠纷，来源于改组会，有几个不满于改组会，于是派荷波去召集一会解释，结果到会的人均被捕，破获问题于述之更有嫌疑的，但当时未解决。还须调查，我动身来参加十一月扩大会之前一日接到中央纠正盲动主义的信，但未洗出。后中央接到北局之第六号通告，并同意此通告。扩大会议时中央曾决我任书记，当时我的确有一个极端民主化的精神，故不主张改组省委，恩来与我谈时要我去斟酌是否有改组之必要。至述之问题我在扩大会无报告，但告知了秋白，秋白又告毛子，毛子要我注意调查述之问题，恩来亦要我调查，我去后即调述之来中央，述之走的次日才接到中央对述之问题的决议，但他已走无办法了。当时省委仍不了解盲动主义的错误，省委仍主张继续暴动，要于方舟去京东号召第二次暴动，结果京东完全坍台，省委同志消极，述之先我而回，一月之先，此时述之在该处完全是玩小把戏，王仲一消极，钱也用了很多，述之回后又恢复从前状态，完全秘密起来，下级同志甚至有到电车站等省委之事实，于是下级同志反对省委，反对中当然有许多错误，但主要的是正确的，我回后开第一次省委会议，景堂同志提出改组，仲一等同意，皆以为不改组无办法，省委成立之第一月，工运有点工作，第二月即无甚工作，京东坍台，外县很少地方也没有曲线的关系，因此不能不改组。此时北京京绥都未恢复，完全在天津、唐山、京东三区要求之

下来改组的,本原定巡视后再改组,后觉太迟,又改马上改组,以至会期异常××未充分准备,我此时因上述的事实,得出了一个结论,以为这些现象还是机会主义未肃清的结果,于是以为非找出旧的分子回来工作不可,如不与这些人观念改过来负责工作是无法发展的,因此改组会主要精神:1,反机会主义,2,恢复党的组织,3,改变工作方法。当我去时带了一些钱去,此时京东、北京等处需要一个大的救济,救济工作是由景堂同志负责,救济给于被捕及旧的失业同志,当时大多数主张普遍的救济(失业的亦然),当时我以为普遍救济不可能,原则也不对,因此决议原则上只救济被难者而不是失业者,后景堂即发现许多困难,他主张召集失业及出狱的同志开会说明普遍救济之不可能,当时我的意见是要说明党不是救济机关,并说明济难会的组织原则及经济来源与困难。这些信现在看来完全是一个极端民主化精神的错误,我主观上以为党应是工人自己的,每个工人同志都要来担负改造党,不应消极,决定的方针是如此,在实行中则不同了,将救济与工作混在一起,决议已是极端民主化了,但他们去执行中更加重了错误,改组会中的错误大致如少奇潭秋的报告:1,无政治决议案,原来本是推定四人起草政治决议案,结果是我个人来起草,于是开会时这个决议草案未出来,仅在会中申明接受中央十一月扩大会的政治决议,不必另有一决议,这自然是错误。2,极端民主化,这是有我个人的来源,我是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但另一方面也有北京的客观的来源,因此组织决议案整个精神,是极端民主化的。虽然决议案中也有些好处,但是处于附庸的地位无作用了。在批评方面,纪律方面也是走到极端民主化上面去了,即较好的秘密工作方面也有这个不正确的错误精神。3,反机会主义问题,由反机会主义变了另一种错误,当时的确是否认了过去一切,完全是消极的反机会主

义，未在群众中提高省委的职权与信仰。从职工运动决议所指出的有些是对的，但亦有一大的缺点，即是对于过去的批评未能十分恰当。农运决议也不是一个好的决议。当时反机会主义是对的，但当时未能对机会主义下一正确的定义，这是能力的问题。其次反机会主义对人的问题的确在文字中有个人的意气。5，改组会的组织问题是要恢复旧的，这是唯一的方针，述之以为旧的一个也要不得，我总觉得这种说法不正确，我以为这不是工人同志本身的错误，而是机会主义的问题，我当时以为除了号召旧的同志回来无第二条出路，我与述之的主张是两个极端，当时相当的恢复旧的是对的，但可惜太极端了，主要的还是一个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我当时的确有一个对机会主义的道学的观念，改组会的纪律发生了一个军事纪律问题，会中对述之却讨论得很久，一致主张枪毙，甚至有人说我偏护述之，这次改组会的成分是要吸收产业工人来参加，要消灭派别叛徒，当时唐山京东两派联合反对省委，当时群众要求旧省委一个也不要，我则以为如此工作作不通，后决定所有有力量的同志都集中于省委，原我不主张仲一留，后也决留了，其次关于王藻文的问题，他在党的历史有七八年了，他历来都是与党冲突的。当萧子暉时代即发现有三新同志告密的事实，于是萧即疑为王藻文所干，后派世炎去调查，王并无嫌疑，当时负责人总不信任藻文，但工会总是举他为委员长，当时工会与党的关系始终弄不好，后王仲一去后，才与他将关系弄好，同时他们有几个证据，证明王藻文是忠实的：一是冯演说欺骗工人时他曾上台当面作反冯的演说，二是王藻文始终不接受对冯让步的政策，三是冯委他去当交通队长，党亦如此主张，他不去。根据这些材料证明他是忠实的，而归结于是过去机会主义的问题，机会主义的党不相信工人，他在天津两月的工作也不算很坏，而且他的确是在工人中事

实上的领袖，能力也比较强，因此改组结果以他为书记，改组后两礼拜的确有一点新的气象，精神是兴奋的，时逢过年的斗争，此时经济问题发生了，我带去的二千五百元特费，山西去了一千一百元，他处也分配了一些济难费，我带去的党费开会后仅存数百元，会后草索的改组了天津总工会，改组后一礼拜，经济即没有了，改组会之前一日，接中央的信，要由下而上的改组，改组会暂不开，事实上已召集，且由下而上不可能，故仍开了，后又接中央信说，调述之不是中央原意，后又接中央信要我归中央，改组后我到了唐山，当前茂公在时有一二百人组织，茂公到省委又塌台，我去开训练班，开三天后才解决。我在唐山住一礼拜之久，回津才看到中央调我的信，本应即赴沪，因我当时以顺直才改组不久的关系，故省委派藻文、仲一来中央。中央与他们开了多次会，认为改组会是应当的，对述之问题仍未作结论，此时闹经济问题的事实即表现出来了。此时我才知道在闹经济问题，过去我还不知道，藻文走的前一天在天津爆发了，因为第二区的经济问题李德贵才指出王藻文时常说大家作工吃饭不成问题，后王德振又说些事实，省委当日即给藻文一个批评，并作了一个决议，以后禁止藻文单独给钱与同志，单独议决某同志应有生活费，经济问题的根本是由于秘书处决议，工人很苦的开会，应给以工资津贴，当时大家都给藻文以批评，藻文即大发其气，他也有个理论，以为是同志苦应该津贴，而且用得不多，过去机会主义时代用得不多，后藻文勉强来中央，经济问题仍继续着闹，同志仍反对李德贵，于是决发一告同志书，后绍峰以为不必，因不是整个问题，于是告同志书没有发，召集了一会议解释，此后他们不公开在会中反对李德贵了。当时将此问题看得很严重，现在看来是一个错误，当时觉大部分同志还是好的，未将此坏的现象正确的估量出来，后藻文等回去仅带了数百元，只用到二

三礼拜，于是消极的现象发生了，不两天又接到中央经济自己解决的通知。仲一、藻文皆大不满，以为中央不要顺直，不同意省委的改组，我当即解释不是如此。其次我个人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我明白的说，我自己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错误，表现于极端民主化，我的确不满于改组之迟缓，即在十一月扩大会我即正式提出，同时我以为当时有一个左派的萌芽，立三即以为我这种意见即是认中央为右派，同时当时我的确认为派别问题很严重，不满于述之、亦农等，因此我在反述之的机会主义中带有个人的意气，对中央不要述之离开，以为中央是动摇了，因而不满于中央。但同时我个人也不坚信我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央曾有一信，要我停止左派的宣传，我当时作了一个报告，要中央对我的工作等作一个结论。藻文等回后，我即到中央，后述之问题解决，我又到北方，到津即看到天津布满了消极的空气，我即找原因，有许多同志以为是钱的关系，我当即反对此说，并从政治上找原因，仲一以为蒋不能有一个成功，我当时以为北伐能否成功还是问题，主要的是复兴工农运动。中央曾有一告同志书，接到了两次，第一次的与第二次的不同，（按第一次的是不完全的样子）第一次到同志皆不满，但我仍阻止不发去，第二次到我即认为中央指示很正确，尤其是极端民主化之提出，并根据中央指示作一计划，（此计划现尚未来）同时决定迅速的将告同志书发下去，我到津后，在第一次会中未大发言，后看十五号通告，并找同志谈，他们对继续暴动政策非常不满，于是次日开会即纠正十五号通告，讨论中藻文不发言，我要他发言，他即发了一大批牢骚，发表一些意见，他说的与少奇报告的相同，当时我亦同意了藻文的意见，后即定连同反帝问题起一决议案。此时我发现同志三种倾向：一是大干，以为群众幻想我们与群众相反，还有一种消极。一种以为国民党比张作霖压迫还厉害，我即指出这三



种现象，并于通告中指国民党之内幕及揭穿其假面具，这与对国民党的决议又有不同处。还有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仍是未接到新的工作方法。少奇去时有一个打吗啡针的倾向，同志则有一个经济问题，以为无经济影响了工作。少奇对此也是动摇的。少奇当时以为北方反机会主义是好的，但无工作的方法，还有一些小的问题，这些小的问题只要工作起来是不成问题的。少奇、仲一都主张将省委分散，后同志反对省委，又有人提出改组之议，主张改组还有一原因是要将责任卸于中央，我即明白反对，反对卸责的观念，最后我说这问题要中央解决。中央亦以为不能马上改组。我们过去是未将过去的错误估量清楚，王仲一曾说，六次大会不开，工作无办法。我即反对其意见。我来上海后曾向弼时说中央对顺直政治上要特别注意，以上是事实大体如此。

(2)现在说我个人的错误：1，最根本的是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来源于小资急进主义。2，组织方面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纠正到另一极端去了，使群众更不相信党了，还有号召恢复老同志一点也有错误。3，工作方法教育等都无甚成绩，并未将同志政治的认识提高起来，我的确是如少奇所说缺乏常识，故对同志的许多错误未注意纠正，反对机会主义和教育也做的不好，对一般的教育亦无甚成绩。4，个人个性对许多问题非常简单化，对不严重的问题不大注意，这也是由于极端民主化的缺点，以致许多地方作了群众的尾巴，现在才可以对有些同志下断语说他们是群众中之落后的。5，缺少经验与常识。其次说到历史上整个的错误，主要的有下列几点：1，过去党内部即造成党与工人阶级的对立，造成工人反党的严重现象。2，政治上的错误，客观上是叛离了工人阶级为冯玉祥而骗工人，冯退时将很能干的同志为冯作交通队给同志以冯的幻想。3，极端民主化这个坏处不比机会主义好，一样的破坏党与革命。上

述三点是过去主要的历史错误。

(3)以后工作的方针：省委扩大会的政治决议大体是对的，不过暴动问题尚不及大会之明显，北方党是错误最多工作最没有的党，工人现在还无甚组织，客观上是很顺利于我们夺取群众的，但过去我们主观上有许多缺点，现在组织上省委各方面都还是很好。其次工运分子，铁路工作是忽视了，我们去后也无多成绩，少奇对工运问题提出的几点要中央帮助，我以为是对的。现在的省委要其独立工作是困难的，现在各种工作方针大会已指出，不成问题，反工运问题有组织的加入黄色工会的办法不妥，农运中争领导权问题要特别注意。组织上要纠正过去机会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残余，要纠正一切个人意气与派别等错误，要将大会组织精神用于北方，现不是又要来一个极端，旧的好的仍然要，直隶工作是可以起来的。中央应注意北方工作，夺取本阶级的群众。

(4)其次说到个人责任问题，一切责任应当通通是我负了，应该将我的错误公布出来，我做指导工作的确不够，能力经验都不够。为党工作前途及完成第六次会的责任起见，我自己提出请求开除我的中央政治局的资格。

(载《中央通讯》第1期 署名：蔡和森)

## 对顺直问题的书面报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此报告不带辩护性质，仅在简单说明过去工作经过及个人在工作中之错误。

北方局时期——上年九月至十一月，北方局主任为荷波同志，和森、昆弟皆为其中之一员，北方局到时，情形大约如下：

- 一、工运已停止年余；
- 二、党只有上层机关而无群众工作；
- 三、与群众关系非常恶劣，党完全是在群众以外，被工人群众所厌恶；
- 四、指导机关与党员，尤其与工人同志的关系非常之劣，工学界限特别深；
- 五、东大式的纪律甚行于北方；
- 六、天津京绥路，唐山工人同志及一般所谓“本地”同志皆反对省委。

北方局到后考察以上种种情形，认为是机会主义在北方之严重的状况，决定改组省委，此为第一次之改组(九月底)。新省委人选：朱锦棠(书记)、于方舟(组织)、彭述之(宣传)、王仲一(工运)、杨春霖(农民)。此外北京、唐山、玉田等处随之改组。十月中旬玉田有自发的农民暴动，同时北方局对于时局估量不正确，有盲动主义的暴动计划之发出不到二星期事实已证明此计划之幻想，北方

局即有第五号通告(见中央通讯)改正此计划。

十月底，北京因党内纠纷发生大破坏，不久玉田因第二次攻城，京东工作一蹶不振。

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取消北方局，根据北方局第五号通告及和森的报告做了一个北方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央决定开除述之省委工作，加以查办，国际代表于森起程时叫去说：“你到津的第一任务，首在调开述之离津”。

第二次改组时期——本年一月至三月，中央原先拟定森以中央特派员兼顺直书记，森以为不可，后仍以巡视员名义再去北方，到津时为十二月底，此时顺直党情形如下：

- 一、京东因二次攻城完全失败，于方舟杨春霖皆死于二次攻城之役；
- 二、省委因北方之大破坏及京东之失败异常消极；
- 三、天津、唐山、京东党员群众对省委不满要求立即改组；
- 四、常委五人，于杨二人已死，述之开除工作，只留朱王二人，朱王亦主立即改组；
- 五、外县关系，保定以南，张家口以北，因战事还未恢复，只京东几县与省委有关系。

因以上种种情形，省委与森乃决定立即二次改组，以天津、唐山、京东三个主要区域的代表为基础(其时北京未恢复)。这是第二次改组的来由，二次省委十二人，工人八，农民一，余为知识分子之久于群众工作者。常委如下：

- 王藻文(京绥路工人)，  
胡茂公，  
李德贵(天津纱厂工人)，

王德忠(唐山矿工),

王仲一,

张箴言(京东农运领袖),

王某(京东农民)。

第二次改组,天津恢复旧的工人同志百余人,开始建立四个纱厂支部,二个铁路支部,纱厂及铁路开始有几次小的部分斗争,被认为工作可渐复兴之象征。

### 指导改组会中的错误

改组会所努力的是反机会主义,恢复党的基础,确定工农群众工作的方针。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组织问题,党内问题四决议,而缺少一个总的政治任务的决议案,当时以为只须接受中央十一月扩大会关于北方工作方针,无须照样重写一遍。

森在此改组会及决议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由反机会主义而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此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虽然在组织决议案上亦曾指出应当防止,但整个决议案的精神是代表此错误倾向的。

### 中央的纠正及森之态度

改组后,森往巡视唐山等处,并在彼开一训练班,回后见中央发信,主停止省委改组,叫森赴沪与述之对质,又有须停止宣传之语;同时党报召集代表会,要顺直去四人。然省委认述之问题不是和森个人的问题,省委改组之经过须得省委本身向中央作详细报告,请求中央审查,于是乃派王藻文、胡茂公、赵臣三人偕同张昆弟及前书记朱锦堂来沪,并决定等森几星期办完训练班然后走。

当时和森对中央的详细书面报告其结论要点大概如下：

- 一、述之问题请根据各种报告和事实解决，森有错误请加反坐；
- 二、省委改组系根据种种不得已之原因，批准与否请中央详细审查决定；
- 三、改组会各种决议如有错误请中央详细审查纠正，如大体全不正确则请中央另作正式决议，这些写成的东西不过供给一部分材料而已；
- 四、森遵命回沪，但因训练班未完不得不迟行二星期，顺直代表到后中央如认为仍须森到案对质，则请立即电示便可前来；
- 五、森无左派宣传，请中央审查森在北方之一切言论行动，如确有派别企图，森愿接受任何处罚。

以上为森当时态度，因为当时我自己对于改组及各决议案之是否正确，自己不能判明，只有听中央之审查与纠正。

顺直代表到沪结果，中央认改组会的精神是对的，改组省委为正当，新省委成分亦相当健全可以工作，但改组会的各决议案中犯了许多错误应当纠正，于是发布第二封告顺直同志书，所谓顺直问题至此解决，省委接受中央指示纠正改组会各种错误并从新拟定工作计划（见《顺直通信》第六期）。和森乃于二月中旬遵中央命停止巡视工作离津来沪。中央召集会议宣布顺直一切问题上次已与顺直代表完全解决，和森今日到会并非对质，只需将巡视工作作一总报告而已，森对北方工作负责之期至此终了。

拟赴库伦经过天津时期——森在沪住了一月，又遵中央及国际代表命经由库伦赴六次大会，故四月中旬又到天津（并无巡视使命）停留至五月初因赴库伦路不通，仍折回沪，此时顺直情形

如下：

- 一、省委十五号通告有盲动趋向(少奇提出此，少奇二月底到津，自后省委在指导方面受其帮助)；
- 二、对北伐无确定态度(其时中央亦未定态度)，同志感觉蒋阎到后党无出路；
- 三、省委中有几个不赞成少奇盲动主张，下层同志感觉政策不合而愈消极；
- 四、经济困难，大家皆叫工作无办法；
- 五、省委因经济困难受同志批评，有请中央立即派员改组卸责之趋向并托森来沪转呈中央。

其时济案初起，少奇暴动倾向甚重，森乃为省委另草一政治决议以纠正十五号通告及同志各种不正确倾向。

森回沪之前夜(五月四日)与少奇深谈一次，问其对顺直工作之意见，他的结论大概如众相同，即“现在党的基础是相当有了，这些工人同志纵然有些毛病如骄傲以及间或闹闹经济问题，然他们的确还是群众的领袖，工作一起来这些小毛病不大成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经济太困难了，假若钱多工作是容易起来的”。

此外少奇还主张立即改组省委及省委只留三人其余皆分散于各地。

关于立即改组省委之主张含有卸责和迁就保南同志反对省委乃合法之意，当时和森以六次代表大会在即，主张六次大会后再改组，和森回沪即将省委要求立即改组报告中央，中央亦认为应待六次大会后才再改组。

以上为森道经天津时之情形。森所知悉之顺直情形至此终结。

至于“闹经济问题”亦应补述一二。此问题亦为顺直之老问

题。雇佣劳动化本来全党都有此毛病，而以在顺直为特甚。以前曾因此问题闹成许多纠纷及形成党与群众及工会之最恶劣的关系。以前大肆处罚，无形开除的工人同志，以及党紧关着门怕接见工人同志的种种现状，大约都是由此问题发生的。此问题发生的原因，系以前机会主义时期雇佣方法之所致，工人同志与党及工作的关系完全建立在雇佣上。改组时曾在组织问题议案中再三说明党员与党的经济关系及济难会之性质，以纠正过去之错误观念。改组时由朱锦堂同志负责担任济难会工作，对于被难者出狱者作了一次救济。当时朱同志主张对于失业者普遍救济，森曾反对，后乃改变为由区委召集每区被救济同志自己决定办法，至于改组后，森所知道的闹经济问题共有二次：一为天津第一区胶皮支部发生此问题；一为天总几个负责同志发生此问题。后经王德忠告发系王藻文同志有滥许津贴之事，当时省委会议即给王以批评，并通过一次决议禁止津贴及个人滥许。不久又专为此事作成一告同志书（仲一起草）严厉批评雇佣劳动之流毒，后因黄少峰同志认此问题仅只一二处有此现象，不应发此普遍告同志书，遂中止发出。乃改开一活动分子会议，与闹问题者一批评和警告；不久又将一区负责同志（书记）处罚开除其书记工作。此为森负责时所亲知之事。

总结：

一、北方局时期有盲动主义错误，但在十一月会议前即短期终止；

二、第二次改组时森在指导工作上所犯的主要错误系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不过未坚持与继续此错误倾向；



三、改组会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责任和森完全应当负担并愿接受任何处罚。

十一月二十六日

(载《中央通讯》第1期 署名：蔡和森)

## 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 立三路线的讨论”的发言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我只有两句话。现在我们党有危机。立三来莫之后，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之中，仍旧反抗国际路线，运用种种手段，来继续自己的路线。下层群众已经起来反对领导，开始赞助国际路线。我们的指导机关做什么呢？他企图说下层的代表是小团体，是右倾，来抑制下层代表。他是不是小团体呢？不是的。这是下层的代表，群众干部的代表，几千几万群众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贫农的代表——他们反对不正确的领导。

谁是真正的小团体？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同志。李剑如是莫斯科的学生之中的小团体的代表，和托洛斯基派联合，而现在剑如做了中国红军第六军政治委员。

最好的同志都被赶到党外去。最近从少共国际回去的同志，中央不给他们工作。好同志被开除，说他们是小团体。

立三同志，你应当坚决的和两面派的手段斗争呵！这是我们的敌人呵！而新起下层代表不是小团体，这是群众的代表，他们批评上级的错误路线。他们是救党于危机之中的唯一动力。党的老辈——我是一个——已经不能做新的运动了。他们有过各种左的右的等等错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已经落后。

如果还有人企图抑制新生的干部，我认为事态是异常严重呵！

应当对於这种企图大大的打击。

最后立三同志要在实际工作上证明，不但在口头上来说。他应当去掉自己错误的根，这些根在中国是有的，这样来执行国际路线。现在我们党内两面派的手段是特别危险。对左对右的调和亦是。对调和主义要打击。我在过去对于党亦是用过两面派的手段的，亦做过无原则的斗争的。然而我不但要口头上承认，而且在将来中国实际斗争之中证明这种无原则的小团体斗争是绝对的停止了。我希望立三真正诚意的说出他所知道的中国的小团体。来帮助国际了解这个问题而彻底消灭小团体的现象。

(载《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署名：蔡和森)

## 编 后 记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蔡和森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我们在编选公开发行的《蔡和森文集》的同时，搜集整理了这十二篇文章，作为内部发行。其中《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是个记录稿，我们曾与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件核对过。《党的机会主义史》，至今尚未找到全文，只能将搜集到的部分收在书中。这本书所收选的文章，编者作过必要的技术整理，对于著述内容未作任何增删改动。

这本书是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编选的。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梁大为、王凌云、袁钟秀、范春荣等同志。

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中央档案馆及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